

安妮
著

安妮 投资 生涯 路

改写人生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 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help.net>

0102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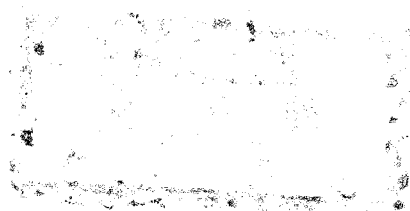


201023490

安妮
著

安妮投资生涯路

——
改写人生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妮投资生涯路: 改写人生/安妮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63-1652-8

I. 安… II. 安…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084 号

安妮投资生涯路——改写人生

作者: 安 妮

责任编辑: 袁 敏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76 千

印张: 9

插页: 4

印数: 40001-50000

版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5 次印刷

ISBN 7-5063-1652-8/I·1640

定价: 1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16岁的安妮



▼ 26岁的安妮

人生 轨迹



▲ 46岁的安妮



▲ 36岁的安妮



▲ 当插队知青的安妮



▲ 在电视台当编辑的安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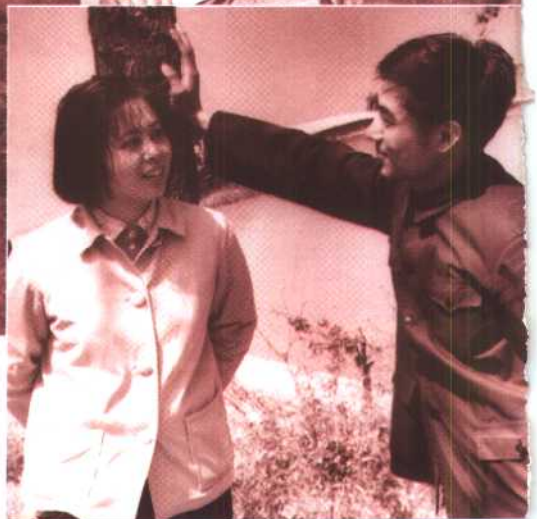
▼ 刚做母亲的安妮



平凡女人



▲ 在工厂当会计的安妮



► 谈恋爱的安妮



▼ 群英荟萃

▲ 安妮公司工作人员



重
写
人
生

▼ 安妮投资专业研讨会



▲ 带领高级会员参观
走访上市公司



► 安妮演讲



▼ 参观美国上市公司

▲ 安妮演讲场内一角

重写人生



▲ 向广东美雅上市公司赠书



目 录

引言：人生的定位	1
一 我的第一桶金	10
二 终于成了“有产阶级”	20
三 亏损 50 %	29
四 抽签表的故事	37
五 从希望到失望	48
六 首次代人操盘	58
七 牛市大逃亡	68
八 向 B 股、港股进军	78
九 被资产重组的宝安农民	86
十 漫漫熊市从头越	97
十一 四大利好强刺激	108
十二 无股一身轻	119
十三 操作室的诞生	129

◎ 安妮投资生涯路

DK66/34

十四	火爆的国债期货	138
十五	期货市场大练兵	147
十六	咨询公司新开张	158
十七	函授与面授	166
十八	牛市的伟力	173
十九	发展，发展，再发展	182
二十	“五朵金花”	190
二十一	来自北京的声音	198
二十二	高位套牢 低位换股	206
二十三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213
二十四	马背上的“牛仔”	223
二十五	九七香港回归	231
二十六	机构操盘研讨会	240
二十七	我和非非	247
二十八	安妮旗下群英荟萃	259
二十九	资产重组的先锋	268
三十	从证券市场到投资管理	275
	后 记	283

引言：人生的定位

在人生的历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找准自己的定位很不容易，但又十分重要。

定位是人生的开始，也是人生的选择。选对了，事半功倍；选错了，不光一事无成，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有些人并非能力不强、社会关系不佳或工作不认真，恰恰相反，他们本来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获得灿烂的成功，但只因为选错了方向，结果越努力输得越惨。

改革开放以前，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很难自由地去选择某个职业、某种行业，一切都是“服从分配听指挥”，捧上了铁饭碗就等于定了终身，没有改变的余地。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被确定为“实践”，而非某某人的指示。一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解放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运动轰轰烈烈地席卷中国大地。这时人们才开始逐渐地对自己的人生定位进行反思，有一部分人首先摔掉了“铁饭碗”，罢吃皇粮，走上了自谋生路的历程。我就是在此历史大潮下背井离乡，开始走上“改写人生”的坎坷之路。

我出身在江苏太湖之滨一个医生的家庭，爷爷和父亲都是基督教徒，均由教会培育他们上学和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一次次被批斗，上班下班挂着大铁牌子从医院走到家中，铁牌上赫然写着：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并用红墨水打上叉叉，路人避之不及。铁牌上的粗铅丝经常深深地陷入他的脖颈，留下深深的印痕。一个夏日的中午，乘路上没有行人，我忍不住踮起脚把父亲脖子上的大铁牌取下来，扔在地上，吓得我父亲连连摇手，马上弯腰拾起重新挂在脖子上，继续埋头弯腰在路上行走。我一边尾随一边发恨，又跺脚又抹泪，心里觉得父亲真像一头忍辱负重戴着轭把的老黄牛，为什么不知道反抗！！哪怕是悄悄的反抗。

回到家中，父亲把我拉到身旁，眼眶里掉下两颗黄豆大的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容，他哭着说：不挂铁牌，他们要打我……

这个“他们”当然是指工宣队，工宣队不光监管我的父亲，还监管我的生活，要我定期到他们那里汇报思想，并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父母亲划清界限。一连串的批斗和劳动改造最终将我父亲迫害致死，

临死前他甚至不敢转院出去治疗。他颤抖着说：转院治疗他们又会批斗我的……黑色的恐怖一直笼罩到他生命的终结。父亲的老实、忍耐、胆小在我心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我这一辈子决不能像父亲那样活得委曲求全，死得不明不白。我要堂堂正正挺直腰板做人！

我上的中学前身也是教会学校，取名“辅仁学校”，解放后改名为无锡市二中，在江南是极为有名的，曾培养出一批批文化和经济界名人。原中宣部部长王忍之，文化学者钱钟书，科学家钱钟韩，经济学家薛宝鼎，音乐学家杨荫柳等等均为该校毕业生。

我的先生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彼此跨越好几个年级，他的年龄比我大五岁，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我俩在插队落户时就彼此吸引。1974年他在苏北插队时调至县委宣传部工作，后被错打成“五·一六分子”（一年后给予平反）。当时他只想凭借文学这一工具抒发自己孤愤的情怀和强烈的人生感悟，以便找到宣泄和慰藉。

1971年冬季，他风尘仆仆从无锡绕道东台找到我插队的苏北东台县梁垛大队（该大队离县城十八公里），想要我对他的新作提出一些批评修改意见。当时我已写成了一部长篇纪事长诗《一位女知青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位姓钱的女编辑找我联络，说准备出书，大家互相正好切磋探讨，那时懂文学、搞文学的同道者实在太少了！

我记得那天我正在大队参加社员大会，广播喇叭突然叫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喊：四队的女知青请立即回家，有人找！当时在大队部开会的几十名知青眼光刷地一下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人找，准是我的号。我未插队前就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下乡前家里整天一批又一批的客人，有年轻人，也有成年人，甚至还有老年人，他们都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结识的。在悠悠岁月中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学校里，永远有一群男同学对我表示特殊的好感，下乡后，他们甚至还一个个跑来看我。这次来的会是谁呢？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急跳。

走到知青组木窗泥墙的茅屋前，我才看到姐姐从厨房里跑出来向我招手，在她身后站着我现在的先生，（那时还只能叫笔友），他穿着一身的确良卡其中山装笑眯眯地望着我。

他是一位沉默、内向的男生，当时已有二十五岁，而我正好二十芳龄。我们所有的接触都非常严肃，正经，只谈文学，不说其它。即便以后谈起了恋爱，我们也从来没有手挽手逛过马路，肩并肩看过电影，所有的谈情说爱几乎都是在文学的世界里遨游，并且常常夹杂着清苦的中药味，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连爱情都变得那样“清真”。

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了一年，那时他已从苏北调到江苏南京的《江苏文艺》编辑部，任诗歌散文编辑。这时候他的生活面临一次抉择，要么在南京定居，那儿有他旧时的女友，要么调到无锡，与我成家。

不久，他的处女作诗歌《春风常驻十里滩》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那时我父亲还没逝世，他首先发现了，把报纸

引言：人生的定位 ②

拿回来给我看，并感叹道：这个人若不能做我的女婿，我也情愿认他作儿子。我知道父母都很喜欢他，但我那时根本没想到婚嫁，觉得自己实在太年轻。父亲也常对我说：一个女孩子应该先立业后成家，有了工作，有了安身立命的依靠才能谈恋爱。这句话我是充分接受的，所以我对他的等待视而不见，每次当他问我：我留南京还是调无锡？我总是没好气地冲他嚷：这关我什么事！平心而论，如果从他的前途考虑，我知道，他应该留南京，因为在那儿他可以进行专业创作，如果回无锡也许只能当个工人罢了。而他是那样醉心于文学，有时可以一口气写十几个小时，一连创作十天半个月。

在我没有表态之前，他的调动迟迟未办，他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我不忍再看他拖下去，终于寄了一封回绝他的信。他收到信后连日呕吐大病一场，后来从南京带着几箱豆油、几筐香肠和皮蛋（当时都是最紧张的需凭票供应的商品）送到我家，让我好好休养，并说：我以后不能来看你了，你要自己保重。说完，脸色蜡黄地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大哭一场。他的调动迟迟未办，我想我在人生路上没有知己了，至少在文学创作上没有笔友了。恰恰这时我父亲开始病重，三个月急救无效，一命归天。那时的我才二十二岁，因为照看父亲同时染上肝炎，虽然病退回城，但已一病不起。我觉得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如此灰暗和狭窄，除了治病只有吃药，还有什么作为可言？许多医生都对我说：小姑娘，认命吧，不要再想这想那的了。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这时候，他又悄然而至，再也不向我提求亲之事，只是每天来给我捣中药、煲中药，把中药递到我手中前总要亲口尝一下是否还烫嘴，默默地伺候我。我多半是自顾自睡觉，并不睬他，而他也就默不做声地在一旁一陪就是一天，晚上才赶去开夜车写稿。

有一次我忍不住了，问他：你调动的事办得如何？

他点点头，说：正在办，调无锡。

我一听，全明白了，他在执意等我。“你需要有人照顾”，他补充了一句。看来，生米煮成了熟饭，我已无法再拒绝。

为了调回无锡，他的档案寄了四次退回四次，但最后终于办成了。他也果真到无锡的一家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配料工人。当时，编辑部的同仁都为他惋惜，同时又热烈祝福我们两位文学青年永结同好。

我们是在 1978 年结婚的，经过四年的治疗我的病终于痊愈，吃了四年的中药，中药渣如果凑在一起可以装一船，所以说我们的恋爱是在中药的苦味中浸泡成长的。

结婚后，我开始去一家工厂做会计，从零售会计、记账会计一直做到成本会计。由于不满足于企业枯燥无味的业务，我又参加市内广播电视局的招聘，以优异的成绩在三千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电视台文艺部的一名编辑。当时考进广播电视局的有三十多人，而录取在文艺部的仅我一个，插队落户时搞文艺创作的经历这次帮了大忙。其时，我已出版过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及评论多种，并成为江苏省作

家协会会员，全国散文协会会员。

记者、编辑的职业似乎十分风光，前途看起来一帆风顺，其实不然。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激烈，我走到哪里都容易成为“争议人物”。其时我先生已从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准备去海南创业办公司。

临走前，他与我彻夜讨论，去还是不去？当时，我坚决支持他去。如果不去，留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或其它文化部门当个干事之类的，其前途是可以估想的，但如果下海办公司前景无法估量，不管是好还是坏，正是这个未知数，才让我怦然心动。

我和我先生的个性中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喜欢不确定性，如果人生都在意料之中，都被计算好，什么时候发达，什么时候倒霉，什么时候老死，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毅然一致选择了风险性极大的目标——下海！文人下海在当时还是很时髦的，但成功的例子却不多。

先生下海之后，我的灵魂就像俄国的诗人莱蒙托夫在短诗《帆》里面所写的：“它不安地祈祷着什么，又不安地等待着什么……”我虽然在电视台干得并不赖，已经拍了几个电视剧，当上了电视剧导演，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等等，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却无法平静地安于现状，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已不具备新的挑战意义，因为电视台的一切业务都是集体创作和合作的结晶，个人的努力更多地依赖于团体的协助，我觉得自己还有精力可以干一番更宏伟的事业。于是，调动工作至北京

⑥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中华文学基金会，并接受委托到广州开辟办事处。

原本，我可以在先生开办的公司内任职，那时他的公司风风火火，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但我意识到夫妇俩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实在是犯大忌的，互相关系不好处理，员工们也会有种种想法。而且，在广东沿海发生的许多家庭纠纷都使我明白，对一个女人而言，最有风险的投资便是男人！女人如果不投资在自己的能力、学识、人际关系诸方面，把所有的希望和回报都押在丈夫身上，她最后得到的不光是虚无还有失败。中国的女人都喜欢为丈夫，为孩子全身心地付出。我以前也曾经这么熬过来，结婚后支持丈夫继续创作，自己怀孕养孩子停止了文学上的探索，生孩子后又支持丈夫去北京读书，独自承担家务，抚养孩子，靠自学考试才得到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毕业证书，但这种付出和回报其实是不相等的。

“因为你没有自己，所以也只能让人忘记你！”

在我离开电视台时，一位报社的女友曾经这么告诫我，而到了海南特区的所见所闻更使我相信选择自己，投资自己，才是最明智的。在现代社会中女性以自尊、自爱、自立才能赢得最稳健的回报。既然已南下，我想就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经营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编织自己新的人生。

主意打定之后，我要求中华文学基金会将我的工作单独安排。1990年我被任命为广州办事处负责人。

在广州期间，我遇到了中国的第一批“股评家”，那时他们都是央行的官员，在东京证券交易所考察后来广州授课。我

引言：人生的定位 ②

虽然未亲聆听课，但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深感到有一种新生而神秘的东西正在向我逼近——那就是中国的股票与股票市场！

潜伏在我血液和灵魂中的渴望冒险和拼搏的因子悄悄地萌动起来，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希冀和冲动。1991年5月我告别广州，抱着考察股票市场的念头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深圳，迈出了“改写人生”的关键一步。

一、我的第一桶金

在资本市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桶金，而且都是终身难忘的。许多人希望我将自己的“第一桶金”写出来与读者分享，我想这对于众多跋涉在投资之路上的远行者是会有借鉴意义的。思考再三，我终于决定提起笔，将这人生宝贵而难忘的“第一桶金”，也是我在资本市场的“初恋”，毫无保留地献给养育和培养了我几十年的社会和同胞。

我南下深圳进入资本市场是在 1991 年，当时凭着一种直觉感到新兴的股市充满了机会与诱惑，其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将比贸易与实业大得多，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原本是搞文学和新闻工作的弱女子而言，下商海不如下股海，当企业家不如当投资家，这是我一来深圳就抱定的宗旨。

打定主意之后我豪迈地对友人说：我到深圳不会去找工作，而要等工作来找我！深圳人当然以为我说这种话是心高气傲的吹牛，因为那时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内地精英分子如潮水般涌入深圳寻找机会和求职，而能如愿以偿的几乎为零。用一句股市中的俗语：中签率实在太低了！

为了进入这一行当我做了充分的准备：重新学习外语，重新学习经济学全套课程，将中外股市理论书籍搜索过来认真拜读。说来可怜，当时除了从香港买到一两本有关资本市场的理论书籍之外，国内有关这方面的读物几乎是空白，这也就使我们后来萌发了出版《股市通宝》第一套四本丛书的冲动。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较为优秀的股市理论书籍是美国彼得·林奇所著的《漫步华尔街》，这已经是1993年初的事了，而且就是这本书也是我死皮赖脸从一位朋友手中转买过来的。在此之前所能接触到的其它书籍几乎全是技术分析理论书籍，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技术分析派。

就这样，从1991年6月份来到深圳之后我在股市外徘徊了整整一年。这一年多时间我去过好多次证券部竟从来没有买卖过一张股票。一是囊中羞涩，当时除了吃饭口袋中空空如也；二是缺乏经验，不知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沿用一句朱镕基总理的话）；三是行情一直十分清淡，股价逐日走低，许多老股民都说“套得很深”，我想此时我既没能力又无资格去当“解放军”。

时间一晃到了1992年的9月份，大机会终于来了！证券

◎ 安妮投资生涯路

部门口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人头，街上的人个个都在议论股市，我在深圳惟一认识的女友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导我：现在可以买股票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在国庆节前的新闻联播里以喜气洋洋的口吻说：深圳和上海的股市出现了以往少见的涨幅，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充满了信心，云云。我是每晚非常认真看新闻的人，看到这条消息之后一整夜没睡好。我惟一的念头是：党中央吹响了号角，明天我无论如何要去排队买股票，我要成为股民！

可惜当时是9月30日，开市要在国庆节后。我只有憋足一股劲——等待又等待，而且随着日子的飞跃，这种心情一天比一天迫切，仿佛失去这机会就要酿成我终身遗憾似的。光着急没用，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该买哪一只股票？

1992年的9月，深圳的股票仅六只，而且大都为房地产。从001到006，几乎每个股民都倒背如流，不像现在股票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根本记不清号码。当时的发展股已在20元以上，对我这个口袋瘪瘪的小股民来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其它如万科、金田、安达均在10元以上，当时最便宜的就数宝安，仅九元左右，对像我这样的“万元户”是最有吸引力的。当时我犯了许多新股民入市时最容易犯的毛病——拣最便宜的股票买入，一是觉得价位低，跌不到哪里去也就不危险；二是觉得所花钱不多，与自己的财力相当；三是认定人家肯定也会跟我一样想，以较少的钱买较多的股票。总之，低价股是散户的最好选择！这不仅是由散户的心理因素决定的，更是散户的经济

基础决定的，所以钱未出手散户其实已经站在了对自己不利的败方。大户和机构选股靠质地，凭理性，价位只是其次的因素，这样他们买入之后才可能较长时间地持有，最后形成这些绩优股持续地上涨。而散户选择的股票往往是“垃圾股”，“乌合之众”，众人追捧时无理性地飞涨，一旦树倒猢猻散，其股价可以一落千丈。我选择宝安股后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国庆节后开市第一天，早晨八点钟我便匆匆地赶到当时的深圳国投基金证券部，本以为自己去得够早，到了那儿一看，已是人山人海。当时的深圳仅五、六家证券部，每一家门面都十分狭窄，比米铺大不了多少。从我新开的股东代码号来看，深圳开户人数估计已超过二十万。二十万股民拥挤在五、六家证券部门口，那场面确实蔚为壮观，加上整足了劲的节后效应，不少人都怀揣着几张存折，抱着非买不可的决心去排队。

证券部尚未开张，人群像海浪般地一次又一次涌动，而每次涌动总是像大浪淘沙般地把老弱病残和妇孺之辈挤了出来，引起一阵阵吵骂。我耐着性子一次次地被推出队伍，又一次次地拼命加塞，只知道头晕脑花，两眼发黑。中午，离我还有五、六个人的时候，闭市时间已到，铁栅栏门无情地轰然倒下，把我和我当股民的一腔热情关在了门外。

下午烈日当头，人群里发出难闻的汗味和狐臭，熏得我一阵阵地头晕目眩，我再也受不住了，心想倒不如明日一早再来排队，于是望着阳光下亢奋的队伍怅然而去。

第二天起得更早，一去那里人却更多，原因是昨日排队买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到股票的人今天都发达了，宝安股的股价也从九元直升到 10 元以上。还有什么比股票更好赚钱的？一夜之间深圳人似乎全醒悟过来了，股票的赚钱效应如无情的秋风扫荡落叶，把当时只有六十万常住人口的深圳市一下子唤醒了。这天的结果在意料之中：我又没能买上股票，而宝安股的股价已上了 12 元！

国庆节后的第三天，我下定决心，咬碎牙也要买到股票。由于几天的排队、气愤、焦虑，这一念头已越来越强烈，我甚至产生一种天真的幻觉：会不会在我排队轮上的时候，股票已全部卖完？一位排在我后面的老股民笑着说：这个顾虑没道理，股票市场有人买也总有人卖，有聪明人也有傻子，就像世界上有女人必有男人一样，你别害怕！听他这么说了之后我稍稍地安心，并且懊悔自己为什么国庆节后的第一天不叫那些农民工排个队，当时至多花上一百块钱，那么现在一股已赚了三块了！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舍不得铜板赢不了大钱，这也算资本市场给我上的第一课，因为我马上明白了为什么前两天我根本不可能排上队，因为那些大户掏钱雇佣的农民工早就把前十名占了，谁要请他们买股票，谁就必须掏一张百元大钞。这些农民工大都为乡党，一个人买完又一个挤上去。因而包括羸弱之我辈休想靠近窗前！每次收市之后，这些农民工数数口袋里被汗濡湿得可以挤出水来的钞票志得意满而归，不知他们有没有想到，那些叫他们排在前面一买几万股的大户赚的是他们的十倍甚至万倍？真是有多少智商赚多少钱，有多大的资本发多大的财，这个世界十分公平。

我的第一桶金 ⑤

也许是股价升得太高了，也许是我想当股民的心太迫切了，也许是农民工看见我每天挤不到窗前已有恻隐之心，总之，在大汗淋漓排到第三天的十一时二十分我终于买到了 700 股宝安股票！价格为每股 13.70 元，总金额一万左右。老天有眼！如果再挤不上去我这天又白排了。看着中午关门后许多愤然不肯离去骂骂咧咧的排队者，我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了证券部。

等我下午再到证券部看行情时，我的心如一只吊桶一下子掉到了深井里。宝安股和其它许多股票一样在下午开市后往上短暂地窜了一下便直线下跌，人群里连连发出呀呀的喷叫声，排队买进的那一队呼啦一下子消失了，许多人反戈一击站进卖出的一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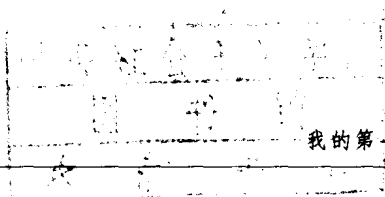
卖出的队伍越来越长，卖位的黄牛价已从 100 元猛涨到 200 元，是股价跌幅的几十倍，好多股民苦笑着搔头：炒股票不如做黄牛，卖位是包赚不赔的好生意。刚才还在埋怨股民比他们赚得多的农民工此刻万众一心地“霸”住了窗口的位置，使许多本来不想卖股票的人也呼啦一下拥上去，争取把刚买到一分钟的股票统统卖掉。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这一天宝安股从最高位跌了一元七角左右，我排了三天队好不容易买到的股票立即套牢了！——这就是当股民的代价。也许许多投资者都有类似我这样的经历，叫人哭笑不得又充满寓意的经历。

剩下的日子漫无边际而又痛苦，仅有的 10000 元钱被套住了，十一月份过去了，十二月份又来临了，股市一片萧条肃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杀，毫无起色。我一次次地到证券部去期望股价能稍微上来一点，哪怕亏一点点，我也要坚决斩仓出来，以后决不能轻易买股票了，我狠狠地告诫自己。然而，股市像泄了气的皮球，怎么拍打也不肯起来，投资者心灰意懒，证券部窗口的小姐与先生除了甩扑克已找不到“第二职业”。深圳是个移民城市，一近元旦众人归家心切，到底是持股过年还是持币过年，报纸上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注意到这些写股市文章的人被称为“股评家”，他们的口气权威而又严肃，像上帝在告诫自己的子民，不可以触犯天条。也就是说：不能在股市里干傻事。（虽然以后发现股评家干的傻事比股民还多，但当时我确实对他们充满敬畏之意，把这些文章看了又看，甚至有的还剪贴起来。当然，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正因为老一辈的股评家做的傻事比谁都多，所以他们仍然是最聪明的，确实值得敬畏。）记得当时这些文章都充满了对股民的抚慰，好像信徒得了病就会有教士给他洒一点圣水一样，鼓励投资者不要害怕严冬，并且充满信心地说：管理层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从那时候起股评家就承担了牧师和心理医生的职能。当时我看了这些文章真的很相信，我想：我们伟大英明的党既然让我们试验开辟股票市场，让我们大胆搞改革开放，哪有不付出代价的道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终于决定持股不抛，一股不卖，回家过年。本来准备乘飞机的，这会儿没钱只能乘火车了。

这段时间碰到那些经常去证券部的老股民，我非常虔诚地



我的第一桶金 ◎

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我的宝安已套了三元钱，总计亏损达2000元，跌幅20%，该怎么办？有位四十岁左右戴眼镜的先生对我说的话让我记忆犹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没有尝过套牢滋味的人就不算股民。哪个人没有套牢过呢？如果你实在忍不住就卖掉一半留一半吧，这样升上去还有股票，跌下来你已走了一半，总算都可以交待。

当时我对这位先生的智慧十分认同，以后当我自己也成为股评家，看到有些人股票套了20%的时候，我便这么如法炮制开导他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最大最深者莫过于“中庸”二字，做股票当然离不开这一宗旨，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总是在走最少磨擦，最小风险的中间道路，这样往往失败和成功的概率几乎相等，也就犯不了大错，但同样成不了大事。所以有时候我又会悟到：中庸之道对于初涉股市者实属良方，但老于此道者对此却不屑一顾。证券市场计较的就是决策准确，看得准，敢下大注，否则又何来索罗斯与巴菲特呢？当然这是后话，当时对我辈初入股海者，这位先生的话还是不无启迪的。我所以没有照此办理实在是因为资本太小，如果斩仓一半恐怕过年回来已无勇气开仓了。

熬到春节后回深圳，正逢邓小平同志南巡，银根已有明显松动，经济已有回暖迹象，我们久盼回升的股市却仍纹丝不动，好几次我都已经冲动地走到柜台前想把这700股宝安如贾宝玉的一头青丝斩了而去，但忍了又忍，终于不舍得。也许是新股民的这种恋股情结帮了我的大忙，从2月底开始股市终于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跃跃欲动，鹏翅将飞了。

证券部里的人又开始多起来，许多回家过年的人带了现金来抄底。这个时候我除了细数每天证券部里增加的人头外，还仔细阅读每天的买卖清单（那时候每天清单均公布在墙上）。我终于发现，有一些机构的账户每天在大笔买进，而且只买不卖。我把这个发现兴奋而神秘地告诉女友，原来她早已发现，只是不动声色罢了。她一本正经地劝告我：你应该赶快去借钱，大牛市要来了！本来这句话不能给你说的，既然你已看出来，那就算是我免费送你一条良计吧。

我极诧异地看着她：何必要保密？大家不都是赚市场的钱吗？如此小器还算朋友？

女友正色告我：任何信息都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从她那里我第一次明白了信息的含金量，咨询确实没有免费的道理。我因为她的提醒没有卖掉宝安，反而赚了第一桶金。这位女友后来听说出国了，我再也没机会见到她，惟有深深感谢。

听了女友的话我离开深圳想方设法去筹钱，等我回来，宝安股人气急升，居然已升到20元以上。晚上从外地回到深圳，来不及吃饭，我欣喜若狂地奔到证券部门口，大家因为牛市的到来久聚不散，三五成群地议论着，许多常在那儿呆着的人看到我以后的第一句话就问：“你抛了没？”我摇摇头，他们全都像注视珍稀动物一样地扭头看着我，“哇”地叫了起来。有人

插了我一拳：真有你的，发了哎！

“怎么，难道你们都抛了吗？”一套数月的难兄难弟们一条声地说：不抛多好啊！

有位上海小老乡苦着脸说：现在才发现手里股票越来越少，股价越涨越高，心里真难受！

他们纷纷向我诉苦：宝安股他们才赚了一元，最多的才两元。有位潮州大姐去掉手续费没赚跑出来，第二天就涨了八角多。而我呢，已赚了整整七元钱！700 股宝安现已值 15000 元，我出去跑了没几天就赚了 5000 元，这在以前的单位得干两三年，简直不可思议。

剩下来的问题十分沉重，这 5000 元的利润我是否应落袋为安，赶快拿回来？想了又想，我觉得这诱惑太大了，甚至让我彻夜未眠。如果赚钱的代价是晚上不睡觉，那应该赶快卖掉，以减轻心理压力——这样决定以后，我睡得很香，第二天痛痛快快地卖掉了宝安，拎回了我在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桶金——人民币 5000 元。

事隔不久，我在 25 元的价位上又把宝安买了回来，人有时候往往会做这样的蠢事，但事后又证明我并不蠢，因为 25 元的宝安升到 32 元，我又赚了七元。虽然它最高时曾升到 35 元，但那已经没有我的份了。既然在证券市场上已拎到第一桶金，那么接踵而来的将有第二桶第三桶，但也会有一桶桶金不间断地赔出去，这应该是另一个内容——我赔掉的第一桶金的故事了。

二、终于成了“有产阶级”

从1993年春节小试牛刀之后，真可谓“极目八荒，壮志未酬”。当时的我还寄居在别人的出租屋里，每天来往一次证券部要两个小时以上，途中屡屡被小偷扒窃，苦不堪言。

好在春节时从老家敛来一些钱，再加上把以前购买的国库券统统变现，有了十二三万元本钱，在拥挤不堪的证券部里也算得上一名“小资产阶级”，那心态自然与有深圳户口、深圳住房的本地人不同，因为每天中午收市后还要来往奔波搞饭吃，费时又费钱，居无定所，食无定规。我痛切地感到：要在资本市场长期地干下去，要想在深圳生存，非得拥有自己的房产不可！否则，每个月一两千元的租金就叫人发怵，更何来“原始积累”？我一边忍耐，一边暗暗发誓要在股市上赚回自己的住房，在深圳有自己的一方屋檐。这一点可能每个初来深圳

终于成了“有产阶级”◎

的人都有切身体会。

广东人有句口头禅：心想事成。到广东后我最相信的莫过于这句话了。在内地时，听到许多片面的宣传说，广东人捞钱，要钱不要命，金钱至上等等，好像成了新大陆的“经济动物”。到了广东这么几年我才深深明白，为什么广东人在经济大潮中能胜券在握？除了政策的宽松之外，恐怕最要紧的便是他们坚韧不拔，为理想，为事业，当然也为金钱拼搏的信心与努力了。这与其它地方百姓中盛行的“清谈”、“闲聊”、“评头论足”相比显得更加脚踏实地。你很少听到某位广东人在议论人家的不足或短处，他们都兢兢业业地埋头于自己的那份工作，说起来的都是人家的长处，没有妒忌只有赶超。在证券部时我就认识了几位土生土长的“广东大姐”，她们看到我每天这样辛苦地从偏远的布心村赶到市内来炒股票，总是钦佩地说：“心想事成，你以后一定能成功的！”以后我每遇到困难，都会想到“心想事成”这句格言。

其实，那时的我原始积累少得可怜，我甚至舍不得掏钱买矿泉水，只是用塑料瓶子装一些茶水带在身边喝，所以总有人问：“你的矿泉水怎么是黄的？”

听到这句话，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是啊，捧着好端端的铁饭碗，放着国家干部不当，跑到暑热难当的深圳来炒什么股票，我的路有没有走错？时间长了，问此问题的人也少了，我自己心里也释然了许多。深圳人是从不查问你的过去的，广东大姐们见我的股票炒得比她们好，从来不计较我的矿泉水是什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么颜色，相反她们每天竞相为我备好矿泉水，目的只为了向我问一些对股票和行情的看法。其实从那时起我已自觉地担当起了所谓“股评家”的角色了。中午、晚上也经常有股民请我吃饭，要求很简单：希望聊一聊“股市”。

我这样一个在深圳没有背景，口袋里又没多少人民币的弱女子，深知只有靠自己的努力与才华闯开一条道路，别无选择。现在我的身份既非作家，又非记者，更不是导演，只是一介小小的股民。我和别人一样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我觉得平等而又充实，再没有以前那种自负和清高的感觉。

这时候的我特别刻苦与用功。当时没有电脑分析软件，白天在太阳底下仰着脖子，能看到的只是跳跃着的行情，没有盘后分析，没有技术指标，一切都十分原始，因为许多证券部场地太小，都把电脑屏幕放在大街上让人观看。长久地在阳光下看电脑屏幕，我的额头上、双颊晒出了很深的黑斑，难怪我回家过年时人家都说我成了“老太婆”。脸难看是其次，行情无法及时分析却成了大难题，我必须迅速地切入市场，成为专家。这一念头十分强烈，说干就干，惟一的办法是手工绘图，人工计算各项技术指标的参数。

跑遍了深圳的文化用品店，终于在“博雅文具店”买到了绘图需要的图纸。每天收市之后，乘着公共汽车一头大汗地赶回家，第一件事便是画 K 线图。作计算，KDJ 线、MACD、RSI、OBV 等等技术的数据都是用一台 30 元钱购买的小小的计算器算出来的。从 1992 年开始这些图表横跨了近三年时间，

终于成了“有产阶级”◎

对每个具体的指标我都积累了自己的心得，记下了买进卖出的参数，这为我在 1995 年写作《股票技术与运用》一书时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 and 特殊心得。

所以，从介入股市一开始，我就是地地道道的技术派。当时懂技术分析的人寥寥无几，有心得的人更是稀少。我们首先投入故而也首先得益，在以后的操作当中成为极有威力的“神秘武器”。

把第一次购买的宝安股票获利了结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该用老家带来的这笔钱买什么股票。当时，哪个证券部也没有研究机构，更没有跑上市公司的习惯，小道消息倒是开始流行，也许是我首次运用较多的资金投入股市的缘故罢，再加上第一次买宝安套牢的教训，这一次我特别慎重，特别小心。想了几个晚上，我与几个上海来的朋友商量：我们是不是去走访一下金田公司？那时，金田的股价还不太高，仅在宝安之上，但在其它五只股票之下。深圳的房地产已炒得火热，金田的地产每天在电视台大做广告，我觉得它的收益肯定不错。几位股友都很犹豫，疑惑地问：他们会接待我们吗？我们的身份行不行？

我从国外的书中看到国外的基金经理或大额投资人都经常到上市公司参观、访问，或打电话询问，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大胆地拨通金田的电话，说明到访的要求。对方非常谨慎地问：“你们是谁？有什么公司？”我大大咧咧地说：“等我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们来了再讲，好吗？”于是不容分说地挂上了电话。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金田的财务主管，这样的造访也许是第一次，他十分认真恳切地接待我们这群来自四面八方的投资者，并且极有信心地告诉我们：完成年度计划不成问题！

有了这句话壮胆，下午我毫不犹豫地用全部资金买入了二万股金田，价格在 12.80 元左右。然后就准备等候 1991 年的金田分红，给我这位新股民带来“丰厚”的回报了。

剩下的事很简单，每天到证券部去看金田的走势，以至连证券部的保安员都知道我是“金田”迷，其它个股一概不关我的事。

说也怪，许多股票都涨起来了，但金田就是趴着不动。在我最着急的时候，有位四十多岁的老股民对我说：“别急，趴下来有多长，升起来就有多高！看着吧，你的金田准会赚大钱的！”这位男子最早炒过原始股，所以证券部的人都很敬佩他。开始我不相信，但是突然有一天，离收市还有半小时，大量的买单十万股、二十万股地买入金田，一下子让它上窜了两元多，我高兴得直跺脚，仿佛为它打气，而它也果然不负众望，以最高价收市。第二天，第三天金田股天天暴涨，转眼已过了十七大关，我屈指一数，每股已涨了五元，那些跟我一起去金田公司的上海朋友已经出货，现在他们天天看见我就催促：“获利了结，入袋为安啊！”

我的信心动摇了，这时我已忘掉了买房子的誓言，极想把那短短半个月就赚来的 10 万元钱兑现，我每天脚步轻飘地回

终于成了“有产阶级”◎

到家里，让我睡不着吃不好最困扰我的便是：明天要不要把金田抛掉？

我好不容易找到当初那位鼓励我持有金田的老股民，他看了我画的金田的图表，三根大阳线，最后一根阳线上方已有上阴线，便极有把握地说：我看你可以抛掉，等以后掉下来再捡。

听了他的话，第五天我做好了抛售的准备。那天我早早地跑到证券部卖出的窗口，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但买进的窗口就多一些。我排在第五个，当我填好了 18.80 元的卖单正要递上去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叫：“股票跳水了！”这一声惊叫使许多人来不及反应，我看到屏幕上已是绿色一片，金田一下子跌去了 0.90 元，刚才还在买进的人群唰一下都排到了卖出的窗口，比解放战争国民党的军队反戈一击还快。我还来不及反应，卖出单已被小姐从柜台里扔出来：“这个单卖不出去的！”那时候证券部的柜台小姐个个都像公主一般，她可以恶言恶语地冲撞你，你是没有还嘴余地的。我还想去重新填单，卖出的人群一拥而上早把我挤到了一边，这时等我再想卖出，金田股份下面居然出现了赫然的“0”字，表明没有买方，我痛悔没有听那位老股民的话，失去了赚取 10 万元的机会，现在又只能死等了！但愿不是“等死”，我在心中祈祷。

这天所以出现股票大跌，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深圳的一家人行主办的报纸刊出一篇《大暑大寒》文章，欲叫股市不要这么火爆，结果投资者望风而逃，那时股市窄小，小额投资者越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多，越容易出现暴涨暴跌，其实那篇文章早晨在报摊上我也瞄了一眼，只是没有在意，没想到中国初期股市上政策及舆论干预的力量这么大，不得不防！

这次轮到上海的股友跟我寻开心了，他们已是“入袋为安”，而我几乎“鸡飞蛋打”，那几天的股市跌的很多，金田也不例外，像直升飞机般上去，又像直升飞机般下来，我的10万元快还给证券部了。

吃了这么一堑，我才长了一智，原来股票是虚拟资本，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泡沫，我的“居者有其屋”何时能够实现？

邓小平同志南巡对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声强烈的号角，对股市的促动也不是一篇文章就能概括的。越来越多的外围资金涌入市，股价又重新摇摇晃晃地升了上去。

吃过一次苦，这次我非常小心，做功课也更加周到。我不光做金田股的图表，深圳方面有一只股票我就老老实实在地做一只股票，我想自己要把本事学到手，到时才不会遇事慌乱。一篇文章便能使股市大跌，其实股市本身已严重超买，否则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抛盘。那时，也曾想去炒作上海股，无奈深圳只有国投一个点可以开户，起点资金为一百万，这对我这种“小资产阶级”而言当然不用幻想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空争峙，金田又到达了18.80元的价格，这时对我最大的诱惑就是：平仓。为了使自己不再重蹈复辙，我开始每天一千股，一千股地抛售金田，两万股金田我抛了一个月，从18.80元一直抛到22.30元，平均价为21.50元，

终于成了“有产阶级”◎

我释然地松了一口气，凭这两万股金田我赚回了 20 万元，而这钱要在深圳市区内买房的话还远远不够。

当时深圳的房地产也被逐步炒热，布吉国都地产一个楼花由五万元炒至八万元甚至 10 万元，市内高层的楼价到了八千元一平方米以上，多层也至少要五六千元，权衡再三我只能到效区即宝安或龙岗地区买一套住宅，因为当时户口没有迁移到深圳，非深圳特区人士还不能购市内房。

在踏看过龙岗和宝安的地形及地产之后我决定购买宝安地区的商住房，一是因为宝安为原县政府所在地，市政建设及治安较为理想；二是宝安离机场及去香港的轮渡码头都非常近，便于经常出差；三是宝安的住宅虽然比龙岗贵，但小区建设、文教卫生和商业网点较为发达，所以毅然掏出 22 万元买了距南头关口仅百米之遥的商品房。一关之隔，每平方米至少相差一千元，对于我辈刚刚积聚起原始资本的“小资产阶级”而言，总算圆了自己的“安家梦”。

买完房以后我甚至没有装修就决定搬家！

房管委的先生说：“虽是现楼，但水电还不正常，现在还没有一家住户搬进去。”

我笑着对他说：“那我就是这第一家罢！”

搬进去以后果真既不能看电视，（天线装置不灵），又经常停水停电，暑热难当的深圳，停水停电等于身处原始社会。为了喝水和洗衣服我不得不每次花一角钱跑到路边的小店里去打水。老板娘倒是很高兴，这小生意利润太大了，而我不得不拎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着沉重的塑料桶从一楼爬到六楼，使我回想起插队的日子。晚上尤其难忍，没有电的日子里摆上一副象棋，就着月光独自对弈，似乎在下盲棋。这时心静如水，听着墙外打工仔、打工妹的嘈杂人声，不远处屠宰场杀猪时凌厉的惨叫，楼下小饭店乒乒乓乓的炒锅声，像身处闹市的僧人，坐禅入定，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我来自何处？我在这儿干什么？这大千世界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我只是宇宙中微小如蚁的一个生命，时光隧道中渺若游丝的一刹，缤纷社会中的一个过客，地球在匆匆忙忙地转动而我紧紧地尾随，在黑黝黝的新村里，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度过一个个无眠之夜，思考我的现在和未来，筹划我的投资生涯。这时的我百感交集，外表是那样坚强，内心是那么荏弱，陌生的躯壳令我自己都怀疑自己的存在，一夜的恍惚总使人痴迷，直到第二天醒来，阳光洒满了屋子，我又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屋外由静至动的嘈杂声渐渐逼近，仿佛和昨天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打量着这所用我自己的心智去资本市场上赚回来的第一所房子，不无自豪地想：不管怎么说，从居者有其屋的角度想，我终于成了“有产阶级”啦！

三、亏损 50%

牛市的炽热往往使人忘掉自己的分量，飘飘然、昏昏然，不知股市还有熊市一说，更忘了谁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

由于顺利地在股市上拎回了第一桶、第二桶金，我对自己越来越自信，对市场越来越掉以轻心。危险的陷阱正在逼近，而我却浑然不知。

牛市行情演变至 1992 年 7 月份时，股民的心情正和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天空一样，炽烈无比。此时的深圳发生了一场仓库的大爆炸，炸死炸伤人员相当多，为了救火，连几位公安局领导人也殉职身亡。火灾之后股市非但不跌，行情反而更旺，股民们纷纷拍手称好，认为这是“越烧越旺”的征兆。我也很兴奋，觉得这么大的利空都不能把股市怎么样，当然应该一路大胆持仓。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在6月份我买了一万股深达声，这只股票是与深振业一起上市的，有几年的滚存利润。6月份大胆购入的理由是它已决定十送五，当时准备十送十的振业股价从40元炒到了60多元，而我买入的达声仅32元一股，到了7月份还在40元以下徘徊，我想这只股票怎么说也应到40元以上罢？小盘、绩优、含权，什么好处它都有，真可谓万千宠爱在一身，叫人如何不恋它？！

当时跟我一样冲动地买入达声的人还不少，买入之后它曾经上冲到40元附近，但我已有“大牛市赚大钱”的概念，一股不赚上10元钱似乎就不过瘾。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深圳市决定第二次大规模发行抽签表，这玩意儿现在的新股民可能还不懂。其实就是因为市场规模小，股票不多，僧多粥少，管理层决定发行1000元一张的抽签表，如果中签的话方能认购新股，每张可认购一千股新股是要另外付钱的，至于购买抽签表本身的1000元钱那就不管中签不中签全都一视同仁地充公了。地方政府单凭这一条可获得五个亿以上的额外收入。

由于新股令人垂涎的超额利润，（市场人士估计每一千股新股可赚取三至五倍，甚至更多，）所以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纷纷抛售老股套取现金准备投入8.10新股大抽签（此次发行新股的时间为1992年8月10日）。全国各地的群众闻讯而动，开始向深圳进军。火车票、飞机票提前被炒高三至五倍，这些会在下一章中描述。

二级市场一下子变得门庭冷落，即便有投资者涉足也是只

出货不进货，市场像泄了气的皮球日益疲软。指数逐级盘下，个股面目全非，正应了一句古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虽然是正常的自然法则，但在股市初期新股常常被认作洪水猛兽，当成二级市场最大的利空。

为了迎接新股的到来，老股不得不做出牺牲下一台阶，而我一介新股民对此中三昧还未来得及悟出子丑寅卯，深达声的股价已从买入的 32 元跌至 24 元、18 元，几乎天天要蹭去一层皮，割掉一块肉。无声的亏损吞噬了我的心。

在深达声跌至 24 元之时，我曾有过踌躇。一起从北京单位过来的陈宁一再敦促我割肉了事。可惜在牛市中长大的我尚没学会斩仓，更没有止损这一概念。我坚决地摇头，一次又一次放弃卖出的念头，决定抱残守缺：既然已有宝安股套牢半年过后又赚大钱的经验，何必要耿耿于怀今天这样小的亏损呢？

所以说，在股市中一开始就赚钱，尤其是赚大钱的人往往要吃大亏；相反在熊市中进入股市亏大钱的人，只要大难不死，认真总结教训，来年必有厚报。对于我而言，技术面、基本面已是说得头头是道，但就是缺乏失败、打穿（注）、亏本这些宝贵的教训，市场逼迫我付出学费，来补这必不可少的一课。

抱着天天下跌的深达声熬到七月底，32 元买来的股票已跌去了一半市值，当初的 32 万元自然也已贬到了 16 万元。我不明白这股市的杀伤力何以这么大？

有老股民，也有老资格的股评家告诫我：休说你的深达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声，以前我们的深发展不也是从 86 元的天价一直跌到 14 元吗？这股票要跌没有道理可讲！

我屈指一算，以前的深发展从 86 元跌到 14 元，跌幅高达 84%，如果我的深达声也重蹈复辙，岂不要跌到五元多？唉！现在看看是脚底板，也许以后看看还是天花板呢。一句老股民的话提醒了我，深达声啊深达声，此时不斩更待何时？！

咬咬牙，我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为了保住最后的子弹，就在 16 元的价位上把一万股深达声统统卖了出去！当时我觉得这股票好难成交，一百股，二百股，被人当作垃圾货捡了一天才卖完。卖完后我的心不是轻松了，反而更沉重，我脸上满是苦笑。亏损一半，即 50%，这一打击实在过于残忍。

岂料，我扔出的 16 元就是地板价！转眼已是 8 月，随着 8.10 认购抽签表的日子临近，市场的抛压突然减轻，想卖的早就卖了，不想卖的此时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股价一天天活跃起来，最后在 8.10 之前三天连拉三根大阳线，而我的深达声又反弹到 20 元以上，与我当时卖出的价格相比，至少少卖了五六万。

我元气大伤，左一耳光，右一耳光，被股市的报复打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该卖的时候不卖，不该卖的时候又全部出手了；该做的事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我又偏偏大胆去干了。自责、愧疚、懊悔交织在一起，使我久久不敢正视镜子中的自己。经过深达声一役，我一下子瘦了好几斤。

倒不是怕这些钱以后赚不回来，我深信有市场便有机会，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钱。但如果不能从失败中吸取刻骨铭心的教训，你以后自然会赔得比这次还多、还重、还惨！

这一教训对我来讲虽然是第一次，我却深深地希望它是最后一次。以后的操作中我务求稳健、小心，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总结我这次错误的根源是太看重个股的分红题材，而忽略了大盘对个股的影响，我和许多新股民一样幼稚地认为只要有分红派息，这些股票就必涨无疑。殊不知当时的股票非常少，受到大盘同起同落的影响，投资者选股的理念尚未树立，羊群效应十分明显，所以任何个股的利好都挡不住市场波动对股民的心理影响。我应该在发行新股前冷静地离场，而不应该执迷不悟死死等待。

时过境迁，六、七年前的教训到今天也许要反过来看。由于目前深沪两地市场规模渐大，股票众多，所以总有些个股逆大势而动，不可一概而论。真理与谬误往往只相差一步，昨天的真理在今天也许是错误，一个地方的真理到了另一个地方或许也会失灵，这又需要我们不断去总结，不断去挖掘。我对于自己的经验教训随着时间与空间变化也是不断深化、更新的。自从在深达声上亏损后，我对个股题材的分析总是更多地把它放在整个市场行情的大背景上进行，这样才可以避免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问题。

谈到深达声的亏损，使我记起深圳的一位英语教师，他们夫妇俩也是在 60 元的高位买了深振业，当时流传该股有十送

❶ 安妮投资生涯路

十的分红方案。买入之后当然命运跟我一样——深套其中。该股股价从 56 元一直下滑至 30 元附近，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他们，他们说：“只有死抱不放一条路了。”说这话时真有视死如归之勇气。对于工薪阶层来讲，亏损 50% 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实，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当时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们俩不无慷慨地说：“这一千股振业我们不解套，就留给儿子、孙子去解套吧！”

愚勇可嘉！我不知他们现在已解套否？因为深振业以后再也未上过 60 元，但是如果不断地参加这几年的分红派息也许还是能打个平手，但是他们仅有的 50000 元丧失了多少投资机会，这里的损失不是更大吗？

远的不说，就拿我买卖深达声来说吧。我凭借在股市中深达声斩仓出来的 16 万元血本在 8.10 以后的新股认购中迅速地赚回了 16 万元，还因此获得了许多一级市场上操作的经验，这一过程所带来的乐趣与反思是远远大于金钱的盈利的。

对于有能力翻本的人而言，最要紧的是抓住机会，其次才是本钱；而对于无能力翻本的人而言，最要紧的是本钱，其次才是机会；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自信！

难怪年轻人在哪儿输得精光都会信心百倍地站起来，而老年人一旦赌亏，自杀、发疯、颓废的较多。同样是赤手空拳，山穷水尽，年轻人有青春做本钱，而老年人来日无多，在时间上已输了一着。

我既非青春，又非老年，而是年近四十的中年人。四十岁

的女人在资本市场从头干起，在许多人眼中已是太迟了。可我觉得：不迟。新兴的资本市场最多的便是机会！在欧美，成熟的股市中一年也许仅有几次机会，而在我们的市场上，每年、每月，机会大把。我在《中国证券报》上连续几年撰写《XX年盈利大机会》的文章，弄得一些老朋友见面就问：安妮，你的机会怎么这样多？

其实，不是我的机会多，机会对每个人都均等，不同的是有的人看重本钱，输不得，赢不起，而有的人看重机会，拿得起，放得下。我们这一代人经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当过工人农民，迟来的改革对于我们这些青春已逝的中年人来说显得格外可贵，所以这种紧迫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

炒深达声亏了 50%，即 16 万，当初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虽则我失去了最初的半桶金，但我拎回来的却是整座金山——学会了在资本市场捕捉机会。从深达声以后，我的买卖单其亏损额再也没有超过 50% 的。深达声一役是我在投资市场上的转折点，这一仗打下来，使我从一名普通的股民向专业投资者演化，因为此刻我才明白了止损的重要性。

在国外，一些投资大师把自己的止损位定在亏损 70% 或 10% 左右，在期货和外汇市场，这种止损就像铁的纪律一样，以致有人叫出了“止损等于致胜”的口号。我并不同意这一口号，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大势或个股如果出现趋势的改变，尤其在高位拉出连续的阴线之后，作为职业投资者就应该小心，注意货币与筹码的比例，面对市场的下跌，不能视而不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见，相反，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并且及时采取措施。我常常碰到有些被套牢的股民，看到股票持续下跌时挺着胸脯对我说：“不理它！”这种态度类似被人缚住手脚的缩头乌龟，它们被动的战略战术往往使自己任人宰割，无还手之力，即便以后通过时间挽回空间，最后得到的也只是两个字：解套。

对于进攻型的投资者而言，往往采取积极的措施，或者寻找更好的机会，更好的市场，更好的个股来弥补改正自己以前选择的错误，这样做当时承受的心理压力虽然较大，但事后总能事半功倍，主要是建立了信心。

当然，对斩仓绝不能一概而论。好的股票有时也会连续下跌，所以以上立论的前提是对前景黯淡，无潜力可言的个股进行及时处理，否则越陷越深，就会失去投资的本义。

何谓投资？

成功的投资总是以最小的资本搏取最大的收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不如还是买国债、存银行或者请人理财。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成功的投资家的。这一行成功的概率非常低，而它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不过许多人缺乏耐心和韧性而已。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树立自信！

(注)：打穿——股市术语，即把老本都赔光，俗称打穿底。

四、抽签表的故事

谈起抽签表，1992 年春节我到上海时曾经看到过。当时的上海人认为花钱买抽签表，最后这笔钱还要捐给国家，挺不划算的，个个摇头不买。搞得销售单位只好在大街上摆摊，那情景真是可怜兮兮！

深圳在 1991 年 7 至 8 月也卖过一次抽签表，我因为当时尚缺乏强烈的投资意识，购买抽签表的心情并不迫切。等搞到一些身份证去认购时已过了期限，从此懊悔不已。这次到上海过节真是一次天赐良机。只是当时我的大部分资金套在深宝安股票上，好不容易凑了 5000 元现金想购买上海抽签表。正好有熟人说可以到银行去替我买那种不记名字的抽签表。我欣然应允，岂知黄鹤一去不复返，银行的那位先生后来又说这样做法上面已经明令禁止了，搞得我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后我才知

◎ 安妮投资生涯路

道，原来抽签表炒起来了，买 10000 元抽签表可以赚十六倍，那么我的 5000 元意味着 80000 元的利润！人啊人，什么时候能去掉贪小便宜的恶习，什么时候就学会了走正道！从那以后，我一般事情都不愿请人代劳，情愿亲力亲为，按规矩办事。

这次深圳发放第二次抽签表，我想可能会成为新股认购的一次绝好机会。首先我已懂得这抽签表的含金量；第二我早就有所准备，搞了一批身份证（当时为一证一表，一人只能认购一次）；第三我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冲动，认为这一机会会为自己 在资本市场赢得第三桶金，而且将比前两次更辉煌！

岂知，我认识到的东西许多人也已意识到，尤其是深圳人，在牛市熊市中搏杀，在一级、二级市场滚打，都具备过人的聪明和使不完的干劲。在深圳，每一个人生活压力都很大，首先是房租贵，第二是交通贵，第三是应酬贵。一个单身汉或单身女人在深圳一个月的开销，没有 2000 元是打不住的，一个家庭的起码消费更在三四千元以上，环境逼迫每个外地人在这里搏命赚钱，找机会。而我，想在深圳站住脚的最主要原因是想把我的儿子非非接过来上学。每次他给我打电话都差不多哭着说：妈妈，我要去你那里！当时他还在上小学，我心中暗暗使劲，一定要在他上初中时把他接到特区来！一个女人所有的奋斗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子女，那么也许就失去了崇高的本义。尤其对一个中国女人而言，更是如此了。

人没有一点压力是不行的，尤其在财富积聚的初级阶段，

许多人都是因为一个“穷”字才走上发奋致富的道路。现在外面有种说法把中国的中产阶级分成三种，一是靠勤劳致富，二是靠政策致富，三是靠钻空子致富，人们通常把股市上致富的人归入第三类。诚然，致富的手段有许多种，但我认为，从法律上讲，致富应分为两种：合法致富与非法致富。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符合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那么靠股票致富的人就是正当的。他们凭大脑，凭决策，依靠资本和信息获胜，为有效益但缺乏资金的企业筹资输血，并且造就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雏形。何谓钻空子？其实只是因为以往我们中国在直接投资这方面是空白！

对于这一点，有些人是自觉的，有些人则是被裹胁的，但介入发行新股这一大潮的人，既然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并且承担了风险，当然也有理由享受它的成果。

也许有人对此嗤之以鼻，但是我要以亲身的经历告诉后人：为了认购新股，我们忍受了血与汗的考验，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辛劳。全深圳的人几乎排了整整三天队，而这三天当中吃饭困难，喝水困难，连小解也没地方去！经过三日三夜百万人拥挤堵塞的深圳市，事后像患了大病似的，满街是汗臭、污水、雨伞和鞋子，环卫工人整整打扫了一周，对着马路又冲又刷，才把这些污秽臭气扫除干净。

在“8.10”的前几天，我们几乎每天去跑邮局，虽然从内地寄来的身份证全是用特快专递，但是由于邮件堆积如山，实在没有邮递员派送，报上已登了启事，需要自己亲自排队认

◎ 安妮投资生涯路

领。不到邮局还不知行情，晚上八点赶到那里已是人声一片，至少有几千人在等待领取邮件，多种特快专递信件像小山似的一堆一堆地放着，大家凭着号码各自认领。有的只是小小的一封，有的竟是半人高一麻袋的身份证。据不完全统计，那半个月里深圳邮电局至少收到了二千万份以上的身份证。怪不得大家戏谑地称此为“全国身份证大搬家”。

等了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刨到了属于自己的特快专递。在回家的途中，虽然已是午夜时分，但仍有不少人提着小板凳、小板桌甚至躺椅之类的放到证券部门口依次排队。天哪，离认购新股还有四天，他们何至于这么着急？不然，行人中许多对这一“未雨绸缪”打提前量的做法颇为认同，有的赶紧打电话通知家人，有的则情不自禁地加入了午夜的长龙。

当时，我也很犹豫，是否要去提早排队？还是同去领取邮件的陈宁对我说：全市这么多人连夜出动，邮局身份证这么多，这肯定是一场比耐力的马拉松大赛，我们只可智取，不可硬拼。

是啊，凭我这种身体三天以后不拖垮下来才怪呢，到时不是我买抽签表，而是抽签表卖我了。这样一想，干脆无忧无虑地说睡就睡，说吃就吃，养精蓄锐，到8月10日早上比高低！

那几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街上人头拥挤，人声鼎沸，交通处处堵塞，上街不能打的，一律改乘摩托。摩托车生意一好不断提价，平时的五元改为10元，有的人为了赶快赶到目的地——某证券部，往往甩下一张50元大钞，连找头都不要

就跳下车走了，似乎抽签表马上就要发到手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证券部附近的矿泉水，盒饭，手纸统统涨价 100% 至 200%，小贩们成了无风险的收益者，赚得是罐盈钵满。我亲眼看到一些无良小贩，把客人丢下的矿泉水瓶装上自来水重复出售。有一次我忍不住上前阻止，那小贩瞪着眼一指前面：这阵势有水也运不进来，你想叫他们晒死？

8 月的深圳正是热浪滚滚之时，拥挤的人群中，每个人的身上脸上都是大汗淋漓，衣服上面还用粉笔写着号，有的地方聪明一些用绳子栓着一个个板凳腿，而主人则在有树荫的地方虎视眈眈。尽管如此，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嘶嘶冒气，许多人尚未等到“8.10”这天已知难而退，人们用 10 元一瓶买来的矿泉水浇在头上衣服上，以防高温，看到这情形我也无心再去责备小贩，反而觉得还是小贩“人道”一些。

最恼人的是不断爆发的吵架，虽然离认购尚有几天，但常有性急的人来加塞，尤其是稍有资产或权柄的人雇了不少农民工前来插队。这些农民工每天排队的工资为 50 元，还分早中晚上班，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桩报酬不菲的肥差，当然十分踊跃，这比在脚手架上当小工工资高多了，而且还有新鲜感。不断的起哄吵架就是这些农民工加塞造成的，引起周围市民的极大不满。

农民工的主人则住在不远处高高的宾馆大楼上，一边享受着空调，一边看着下面的场面窃笑，一边还对那些战高温排队的人撇嘴。

● 安妮投资生涯略

时间一长，前后排队的“队友”均成了老乡，常常委派一人“盯岗”，其他人先下岗，过几小时才来换岗。开始还有全家带了晚饭，拿了小圆桌，一边进餐一边打扑克的。后来越挤人越多，这奢侈全被剥夺。临近“8.10”的最后一天，即8月9日，证券部前面的广场被保安用绳子或铁丝围起来，只出不进，以防农民工捣乱。排队的人一边拍手称快，一边又为盒饭和饮料运不进来着急。最后有人要小便，突围出去以后发现根本无法再入内，急得一边跺脚一边骂娘，完全失去了常态。连一些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也粗口大开，与农民工已没有两样。

在里面的人又渴，又要憋屎憋尿，巴望时间赶快过去，可以向8月10日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冲刺。“8.10”在排队人的眼中并非是一场灾难，而是世界的大同，仿佛只要那一天来到，买到一张或数张抽签表，那么理想的大门自然洞开，阳光雨露肯定撒遍人间。

这可笑吗？一点也不可笑！每个亲临排队的人都被周围的人浪、气浪、声浪刺激，引起某种强烈的共鸣，“8.10”仿佛是一个最美好的日子，而抽签表则是发财的准签证！日子越近，这一幻觉越强烈，每个人都像被某种魔法附身。当我亲眼看到一个姑娘憋不住尿像疯子一样冲出人群的时候，排队的人当中很少有怜悯，甚至许多人露出一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庆幸自己少了一个竞争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我也亲眼看到一对外地来的老夫老妻在人群外面看着自己

的儿子排队，那男孩并不强壮，瘦削的肩头在人海中显得弱小无助。当时的保安为了维持偌大一个广场的秩序，挥着警棍叫所有的人像犯人被捕时一样蹲在地上（这一做法在每个证券部流行），大家出于无奈只有照办。令我惊讶的是居然很少有人抗议，可怜的发财梦压抑了真正的人格。那个瘦削的男孩不知怎么想要站起来，老夫妇向我解释道：“一定是他的脚发麻，正常人谁能够这么一蹲几小时？”

保安狠狠地向那男孩呵斥，开始他痛苦地依从着蹲了下去。中国的公民要无偿交出 1000 元换回一张可能会买上股票的抽签表，居然还要忍受这种屈辱，这是许多人至今仍忿忿不平的。过一会儿，他乘保安不注意又站了起来，保安正好扭头看到了他，不由分说一警棍打了下去，一条细细的血流从青年人的额头上流淌下来。他想辩白什么，甚至还向保安歉疚地笑了笑，突然又无声地蹲了下去。我身边的老夫妇再也忍不住了，那老妇人边哭着边喊：“儿子，儿子，快出来，我们不买了，我们回去。”那老头儿更是倔强地穿过绳索，急欲去拉自己的儿子，另一保安一个箭步跨到他的面前，高高扬起警棍吓唬：“没有命令看你敢进来！”

老头子高声地叫骂起来：“我们从东北来，千里迢迢是为了吃你的棍子吗？儿子，出来！出来！我们回老家，我们不要买新股，什么臭东西！”一边说一边硬是把他儿子拽出来，骂骂咧咧地走了。

“8.10”那天我早早来到当时还是某个银行管辖的证券部，

◎ 安妮投资生涯路

那里已是人山人海。那天我有意穿了一双布鞋，一套运动衣，把书包紧紧地压在胸前，里面有 10000 元钱和十张身份证，这就是我的全部资本。为了冲到前面，我利用女子柔韧的身躯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终于挤到了绳子围着的边圈。绳圈内也是黑压压的人，全像囚犯一样蹲在地上，这时我才明白保安为什么要采用这独特的方法，因为只有蹲着，人群才不易移动，管理才较为有序。守着绳圈的保安与我平时很熟，因为我是这个证券部的职业炒家，他也时时向我打听股票行情。乘他不防备，我弯腰一钻便蹲到了人群里，等他转身发现我，我只有低头不理他。就这样我“深入”到了排队的第一线。认购还没开始，但已有人中暑被陆续地抬出去，“出师未捷身先死”，太不值了！我为自己庆幸，这些人排了三天三夜怎能忍受？环顾人群，其中女的极少，中年人更少，我也算是物以稀为贵！

九点整，证券部的铁栅门打开了。这铁栅门我太熟悉了，平时它是那么权威，总是只给少数几名率先冲进去买位的人以特权。今天，它显得更加威严，因为只有冲到那里面才意味着能买到抽签表。据公布，这个证券部只有近五千张抽签表出售，刨去开后门的、中饱私囊的，大概至多只有二三千份可卖。我这样计算着。我能不能成为这其中的幸运者，真是毫无把握啊！

大门一开像无声的命令一样，所有人呼啦一声站了起来。就在这时，警棍像雨点一样地向人群落下，保安一条声地叫道：“蹲下！蹲下！谁站起来揍谁！”这些保安可能都是刚复员

抽签表的故事 ⑤

的农村兵，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用这种专政手段对付的是谁。很多还是稚气未退的年轻人，第一次感到把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挺得意，挺来劲的。这些保安我很熟悉他们，收入很低，要求也很简单，看着我们每天炒股票，不需要像他们一样值勤，心理已经很不平衡，这次难得有机会支配别人，此时不显威风更待何时？

警棍无情地落下，上面清清楚楚地染着鲜血和头发，人群中几声惨叫之后迅速安静下来。好汉不吃眼前亏，再硬的汉子都要乖乖地蹲在地上，等候保安指到谁便让谁站起来进到铁栅门内排队，每次入内人数有限，只有十个。绳圈内至少蹲着千把人，绳圈外则有几万人始终熙熙攘攘往里冲。我有希望吗？在我前面不远处蹲着一个妇女，也许由于下蹲时间太长，也许由于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她的脸煞白，双手紧紧抓着铁栅栏哆嗦，嘴里直叫：“我受不住了！我受不住了！”但是没人理会。看栅栏的保安我认识，我大声地叫他：“你能不能让她先进去，照顾一下女同志嘛！”

马上有男人用眼睛瞪我，嘴里不干不净地说：“这里没有女人优先！”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如果我是男人，此刻真想骂他一顿。女士优先难道只是在社交场上虚伪的礼仪吗？我再一次恳求那位保安，并且吓唬他：“你不让她进去，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那保安迟疑了一下，跑出去到一位军官那儿作了汇报，他远远地指了指这女人，那军官看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只见那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女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冲出铁栅，铁栅上有什么一闪，尖利的铁刺把她手腕上的手表勾落在地。这一切我看得清清楚楚，情不自禁地叫起来：“喂，你的手表！”她回过头来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匆匆说了一句：“表我不要了！”身子像虾米一样向铁门内冲去。刚才那位呵斥我的男人顺手把手表从地上捡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周围至少有几个男人都看见，但没有人吭声。这回轮到我为男人悲哀：你们的整体素质太叫女人失望，所以，本世纪末中国的两性失衡才这么严重！

第一、二批十个人进去之后由于速度太慢，外面的人群重新骚动起来，这回任警棍挥舞都已不起作用，后面的人首先站了起来，人群海浪一样地涌动，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身不由己，每个人都被挤得张大了嘴巴，发出“噢噢”的嚎叫，像一群被赶来赶去的猪仔。我的两只脚整个儿被提起，身子脚不着地随着人群的波浪冲来冲去，我的骨头一遍遍被挤碾，身上的肉像被绞肉机一样地搅动，我大声地呼叫：“哎呀！哎呀！”这无助的叫声淹没在一片可怕的人声之中。这时我有点懊悔，如果那时被拉出去不给排队也许还是幸运的。我心里充满恐惧，不知这种挤压何时平息，我会不会终于站不住被这些人踩在脚下？已经有人惊叫着倒下去大呼救命了，但人群没有办法停下来，局面已经失控。为了应付这一混乱，解放军中那位当官的命令搬开铁栅栏让人群干脆涌向证券部，以便疏导人流。我发现这办法还是管用，因为这样终于有了一个方向，大家都往铁门冲，保安们乘机关上铁门，把铁栅栏搬过来维持这

抽签表的故事 ●

条人龙。“乱中取胜”，我也被莫名其妙地挤到了大门边，在人群中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大约十点半进入铁门购到了我的第一张抽签表。当我打开书包把 1000 元战战兢兢地递到柜台上时，发现那些 100 元大钞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沾满了我的和其他人身上的汗水。证券部小姐们在抱怨钱太湿，点钞机过不去，还有的皱眉头说太汗臭，但是我们这些类同乞丐和囚犯的投资人又能抱怨谁？

从证券部出来，我赶快溜出人群到对面的小饭店去吃了一个盒饭，一口气灌了三瓶矿泉水，这时有人上前问我，10000 元买你一张抽签表干不干？我一想到刚才的辛苦，坚决摇头拒绝了这一获取暴利的机会，并且决定再接再厉，继续排队，既然排一个队可以赚 9000 元，何乐不为？

那天，我周而复始地排队，一共认购到三张抽签表，真是运气十足的了。那些广东大姐都说我的命好，我苦笑一下：不是我的命好，而是我拼命！

晚上十时许我才回到家里，洗澡时脱衣一看，我自己都惊呆了！身上无一完肤，全是乌黑的青紫块。这一夜我没法仰面而卧，只能俯身而睡。

这个漫长的夏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夜色中，我睁大了眼睛，周身疼痛使我一夜无眠。我不知道我所选择的这条道路将通往深深的陷阱还是幸福的乐园，但我从自己满身的乌青上体会到，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必须付出代价。

五、从希望到失望

经过紧急讨论，第二天管理层公布了增发一倍即加售 50 万张新表的决定，告慰没有买到抽签表的投资者。

用现在的眼光看无限量的供应抽签表，然后再核定中签率，那么也就不会酿成上述事件了。问题在于，我们的认识总是落后于市场，管理层对老百姓的投资欲望没有充分的估计，但反过来，老百姓对投资结果也往往预期过高，所以常常演出一些由希望到失望的悲喜剧。其实，抽签表事件发展到后来，老百姓又认为抽上签反而倒了霉，没买表还是好事呢，否则不会赔得那么惨。事件永远是向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向转化，管理层和投资者谁都有错误，永远正确的只是上帝和市场。

中签率终于在万人翘首等待中出来了！

十张联号抽签表中只有一张中签，也就是说中签率 $1/10$ ，

认购一万股必有一千股中签的，这一结果在大家意料之中，有些合伙买十张但依然没有中签的散户大有人在，只怨自己钱少。

客观地说，那时的中签率比现在新股的 2‰ 中签率要好多了，所以抽签表的身价从一开始 10000 一下子掉到了 3000 元，那些购表大军仔细算算自己的成本：雇农民工，贷款还息，未预知的市场风险，还要等一两年才能陆续上市等等因素，长期持表成本太高。于是，市场上开始大规模倒卖抽签表。

抽签表的炒卖地点自然形成在几家大银行门口，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经深圳市政府屡次查处后逐步转入地下。

我认识的一位河南来的股民悄悄地问我：“你要买表吗？”我当时只认购到三千股新股，如何完成我的“二次革命”？

这位河南股民挺有意思，他曾与我一起买了股票深金田，盈利之后我买了房，他则买了地。这块地是龙岗的 300 平方米商品房用地，每天就看见他拿着这张地契在证券部晃来晃去。因为要抽签了，他等着用钱，想把这块地卖掉。

可惜谁也帮不了他的忙，大家都开玩笑叫他“地主”。

这时“地主”惟一想干的就是趁着倒卖抽签表赶快赚些钱可以去认购新股。一是出于恻隐之心，二是想用抽签表再搏一搏，我慨然应允：“行吧，你拿三十张中签表来，我全要了！”

他听了高兴得二话没说，跨上摩托车就取表去了。反正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倒来的表，由于是批发每张可便宜 200 元，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也就是 2800 元一张，我付清了对方的款，200 元一张就作为“介绍费”全给了河南人，也算帮他圆一个“新股梦”吧。到此为止，我的积蓄也就“山穷水尽”了。

当时有二十多家新股计划发行，按照号码的区间还要抽出你能认购哪家新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根本无法自由选择。投资者处在一种可笑又可悲的境地，拿出满把的血汗钱去投资，却不知道自己投资的是什么。一切恍若黑箱操作，而我在原来 1000 元的成本上每张又多加了 3000 元，在没认购新股之前我的成本就是每股四元手续费了！与我相同情况的投资者比比皆是。

第一、二次抽奖号码揭晓了，靠我自己排队买上的是“深天地”和“深能源”的股票，深天地有两千股，深能源有一千股，上市时间深天地是较早的，深能源则在第二批。那后来买来的三十张抽签表可惨了，全是清一色的上海石化！每股认购价三元钱，加上我的成本已达七元以上，这倒也罢了，它还要分三次上市，也就是说我用七元成本认购的这三万股石化第一次可上市 40%，半年后上市 30%，一年以后才全部上完！

这下倒了大霉，可是能怨谁？谁也无法去预知，也算是投机倒把给我的一点教训罢！“地主”见了我很不好意思，我只好笑着说：“挨着不如轮着嘛！”

两张深天地，我急于套现，在上市的第一天就抛出，甩出一个天价：18.70 元，每股赚了 15 元多，两千股深天地给我带来了 30000 元暴利，如果当时以一万元代价轻易脱手不是平白

少赚两万吗？我暗自庆幸。

至于一千股深能源就更加令人喜不自禁。

深天地的赚钱效应令许多股民对新股十二万分的崇拜，于是有人开始继续炒作未上市但已明确身份的中签表，这比我们那时的盲目炒表风险小多了。

当时炒得最厉害的是深能源，因为宝安有很多农民中签深能源，转让价高得离谱，为每一千股二万二，即 22 元一股。当时正逢牛市，人人豪情万丈，许多人见面就问：“你有没有深能源？”仿佛有了这支股票便有了发财路。

我恰好中签一张，成了证券部的大热门。许多人向我来收购，开始我十分不愿脱手，心想：一级市场炒得这么高，二级市场没准能到 40 元哩！这样一想，死活不出。

最后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让我把深能源卖掉了。在我认识的女股民中有两位执着地要向我购买深能源中签表，一位愿出 2.2 万元，一位高出一头愿出 2.25 万元，虽然只多 500 元，我也从来没有同意出让，但她俩竟为了这件事闹起别扭来了，一见面就互相冷嘲热讽，使我觉得好不自在，仿佛就因为我的那一千股深能源妨碍了她们的关系。

最终，我忍不住了，主动对她们说：“你们也别争了，我把这深能源卖给你们就是了！”同时，我又劝另外一位有深能源的朋友让出一张，使她俩皆大欢喜。

孰知，此事的结果不是皆大欢喜，而是皆大悲恸！

半年以后，深能源方才上市，此刻牛市已经过去，市场一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片萧条，深能源生不逢时一开盘最高价仅 17 元多，要不是卖得快，这两位女同胞的亏损还要大，这样她们还每人亏了 5000 元。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命好不如运好。如果当天不抛，该股后来曾经走到六元一股，几乎跌破发行价。

有一次，我偶然碰到其中的一位，她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你是不是知道股票要跌才把深能源卖给我们的？

我哭笑不得：市场上讲究一个愿买愿卖，但是千万不要和你的亲戚或朋友做场外交易，否则跳进大海也洗不清。好在现在的股票市场都是电脑撮合，如果像三百年前在美国的一株橡树下成交的话，巴菲特每天要被多少人盘问：你赚了我們多少钱？

市场上没有后悔药好买。我从朋友手中购入的石化三万股共计亏损 60000 元，第一次卖了 6.80 元一股，第二次卖了 5.40 元一股，第三次就卖了四元多一股，平均价五元左右，而我的成本在七元，怪谁？所谓“风险自担”，在这个市场是没说的，我们惟一觉得遗憾的是：当初我们没有选择权！也就是说我们满腔热情认购的中签表却无法预知能购买哪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我们没有权利选股！并且连时间表都没有一张，这就是中国原始股民为这个市场付出的代价！

许多人都说，炒一级市场包赚不赔，我要忠告这些股民朋友：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以前的时代不适用，以后的时代也不适用，可能只是从 1995 年到 1999 年这一段时间它是成立的。因为有了 1991、1992、1993 年，股民认购新股的种种经验教

训，管理层总结摸索到“网上认购”这一受到各方面认可的方案，使原始股东大赚一把。目前一级市场的无风险和二级市场的高风险，这样不平衡的局面终究会被打破，因为又会有许多投资者的市场经验教会管理层去推出更为合理的认购方式。

在我以后做了股评家的日子里常常收到许多投资者的来信，尤其是上海的投资者，他们购买的石化股票比深圳的成本高，主要原因是中签率低，这样一来许多原始股东迟迟未能解套。他们纷纷对这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发出种种质疑。是啊，全球哪个股票市场会出现这种因中签率不同而成本迥异的同一只新股呢？

有些问题、有些事实是不能解答，也无法弄明白的，只有让时间去抚平这些投资者心中的块垒。当他们满腔希望的时候最好告诉他们：世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而当他们满腔失望的时候最好告诉他们：世界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股评家和牧师的作用差不多，本来就是一种心理医生的角色，他们需要比别人更能平衡内心，也就是更加“阿Q”。

我认购新股准备完成“二次革命”的美梦未圆，检点钱包的时候赢亏轧平只赚了15000元！区区小数，与我确实无益，但有一件事却大大培养了我的市场信心。

前面说到新股深能源的股价由开盘的17元以后一直落到六元人民币，“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其它的新股、老股无不仿效其跳水模式，一泻无余。

此时，对我最有教益的便是“深长城”事件。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深长城也是当时中签的一只股票，认购价是二十多家公司中最高的，达 11 元，加上抽签成本每股合 12 元。之前，深圳股市已经豪迈地“消灭”了股价 10 元以上的股票，这只股票如果上市能否达到认购价，90% 的人认为是不可能的，电台报纸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结果，当然是羊群效应，跌的时候大家都看跌，涨的时候全体都看涨，媒介基本只是群众的应声筒。这么一讨论，几乎所有人的信心都崩溃了。有人拿着这些中签表到证管部门要求退钱，有人集会大声呼吁停止交款，号召中签者集体抵制，我认识一位银行干部的儿子，他有整整一百张深长城中签表，可以一下子认购十万股新股，所需资金一百一十万。能拿到这么多中签表的人一百多万应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信心，他觉得这一百多万即便认购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不如不认购好。

这一问题困扰他很久，他也找来好多同僚商量。大部分人都摇头，认为他拿着一百多万去冒险太不值得了，“你这不是拿着钱往水里扔吗！”“股市不知要跌到哪里去呢！”许多人好意规劝。当时市况低迷，这一百张中签表连每张 1000 元也没人敢要，他实在是进退两难。

这位小青年最后找到了我，问我该怎么办？我给他出了一个象征性卖出的主意：“既然你不愿缴款认购，中签表又卖不出去，你能不能象征性地卖掉，譬如叫买方花 100 元，甚至只花 10 元钱来买你的中签表呢？至少让人家去碰碰运气？”

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我赚不到的钱，也绝不让

别人赚!”

我看着他那咬牙切齿的模样只有沉默。中国市侩式的偏狭和短视，曾使多少人丧失了大好的机会啊！最后，那十万股来之不易的深长城中签表听说居然被他亲手烧了。据说，当时这个小青年还选择了一家门面豪华的证券部，在门口大大抨击了一通中国股市后为了表示抗议将中签表全部付之一炬。等我知道这件事想去阻止已经晚了。当时听说也有一些股民出于同感把口袋里的中签表拿出来一起参与“集体焚烧”。这事被当作“美谈”在深圳流传很久，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中国新兴的股市前景充满迷惘和忧虑的心态。

而我由于对股市抱有坚定的信心，用别人送我的两张深长城抽签表后来居然赚了钱。

事情是这样的，也许我劝告那小青年的话说过无心，听者有意，有位从外地来炒股的长者因对深圳股市彻底灰心，临时时把自己仅有的两张深长城中签表送给了我，这位长者因为我在牛市中帮他出点子赚过钱，临走又无物相送，顺手把两张中签表塞给了我。告别时他一脸严肃地说：“这股市我再也不玩了，全是骗人的！骗我们老百姓，谁玩谁亏！”

我有些不以为然地对他说：“别这么想吧，股市中强弱分明，咎由自取，反正我是不会认输的，除非等到深沪两个交易所关门我才会洗手不干哩。”

这一激，外地人来了精神，送给我两张中签表，让我去缴款。值得感动的是他认为深长城中签表已一钱不值，甚至都没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向我要那 1000 元成本费。认购截止日，深长城缴款率不到 60%，也就是说至少有近一半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认购权，放弃了自己那三天三夜的排队所得，实际上也是放弃了对股市的信心。回想那天我买到的中签表可卖 10000 元一张，现在面对这张毫无价值的“废纸”真有点唏嘘不已了。

而真正对股市信心未泯的人，等到深长城刚上市便领回了一个沉甸甸的红包，一份令人快慰的回报。因为捱到深长城上市市场已经好转，深长城因其优异的业绩在深圳股市终于大放异彩。俗话说：贵有贵的道理，当时定价 11 元认购市盈率并不高，上市公司也没因为股市低迷而停止运作，它依然是一只好股票，直到现在还是。我抛出深长城的价格是 24 元一股，即每股赚了 12 元之多，股价已翻番了！

不知那位银行干部的儿子作何想？他至少烧掉了一百多万元人民币的回报，同时也结束了他本来可以十分辉煌的一次投资。

在证券市场上“权力”正在褪色，脑袋才是赢利的主要渠道。我想，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在以后的证券市场道路上，尽管仍有一些人依靠权力敛财，速度还飞快，但他们灭亡的速度也在加快。随着市场的规范化和有关方面监管力度的加大，坚持走宏观面、基本面、技术面分析道路的人，坚持改造自己知识结构的人终于循序渐进，积少成多，走上良性循环之路，几年下来成为市场上真正的赢家，最终推动着市场的理性投资蔚然成风。

在这一市场上我坚持“打明牌取胜”的理念，依靠“市场公开信息”赢钱的方法，采用“全面的观点视察全面的股市”（这一点颇有点像法国年鉴派的论点），争取做长跑的乌龟，而不做博取短差的兔子，这样才有可能争取长久生存。

回想在新股认购中的桩桩事件，芸芸众生的沉浮挣扎现在都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最终赚钱并且能把钱保留住的还是有备而来的投资者，机会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脑袋。

六、首次代人操盘

“8.10”事件后，股市低迷了一阵子，但是由于房地产在1992年开始形成热点，一些地产公司大行其道，其上市的股票也越来越多，在市场上表现极佳。尤其是海南的房地产股，如琼能源从11元炒到48元；琼港澳从7元炒到32元；琼民源的原始股股价为2元，一路炒到24元。当时形成这么一种现象，炒海南的地产发财，炒海南的地产股票更容易发财，因为它比地皮容易分割，容易出手套现，参与者也更多。

这时候，我因为已买了房子，开始定点在中行证券部炒股票。当时的证券部经理看到我经常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操盘业绩也不错，同意辟出一个柜台来由我们代表券商向股民作咨询问答。那是在1992年的第四季度，当时全深圳尚未推出此类服务，全国范围内更是少见，也许我们这一家就是

当初券商最早的咨询窗口。走上证券咨询道路，是我“改写人生”的第二步。

一开始，咨询是不收费的，我们经常印一些股民急需的资料，如分红配股消息、转券认购条例、送红除权计算等一系列常识性的资料，以复印价卖给股民。后来到我们这儿来咨询的投资者越来越多了，还有从东莞，顺德，佛山等地跑来的，常常在柜台前排成一条长龙。这时，我深深觉得咨询行业大有前景，需求很大，服务不多，只有把它变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商业行为才能广泛推广。

我们开始向咨询者推荐股票并且推出最佳买卖点，听了我们的意见如果赚了钱，我们只酌收 50 元咨询费。这样一来，前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许多人帮我们作免费宣传：“50 元赚大钱，钱越多赚越多！”久而久之，我们开始有了固定的咨询客户，有时他们嫌跑来跑去麻烦，还会影响上班，就干脆建议：你们能不能代为操盘？赚了钱我们平分！

这主意十分诱人，但我们从未尝试过。另外，亏了钱怎么办？我们自己的钱还不够赔大户的呢。经过反复思考，我对第一个委托我们的客户——一位从湖南来的复员军人说：“这样吧，你委托我们操作，赚了我们也不要收取一半利润，仅取 20%，亏了我们也不赔，下不保底上不封顶，先干三个月试试再说！”

这位复员军人三十出头，高高大大的个子，因为跑运输这几年积攒了几十万，说话做事十分干脆，颇有几分军人风度。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他略加思索，把头一扬：“行，就照你说的办！”

双方一拍即合，复员军人拿来了自己的股东代码卡，一看他的股票我不禁乐了：80 万元人民币买了三四十种股票，现在已亏得只剩 56 万了，还是在大牛市哩。

他请我们在饭馆里撮了一顿，我像医生看病似的把他那些宝贝股票全分析了一遍，结论是：太乱，太杂，买进卖出毫无根据。

没想到他正色道：“报纸上不是说要把多个鸡蛋放到多个篮子里吗？难道这也错了？”

我也正色道：“理论是不错的，但应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接着我便开导他：“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地产热，中国人突然发现土地可以卖大钱，也突然发现房产商品化过程中有暴利，这使得一部分既有土地储备又有政府支持的地产公司盈利可观，这一现象在海南特别突出，一些海滩荒地突然变成了聚宝盆，什么琼能源、琼珠江、琼民源、琼港澳，还有深圳的金田、万科、振业全成了金凤凰，这时候你为什么却偏去买什么深宝、益力、华发这样的垃圾股？炒股要炒龙头股。龙头一抬，全身劲来；龙头一摆，行情下垂，坚决换股！”

他听我说得头头是道，摊开双手说：“既然把股票交给了你，你摆弄就是了，我不干涉。”

看到湖南人这么信任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他的亏损拿回来，并且趁着牛市狠狠赚上一把！

第二天，我把他的深宝、华发、益力全部斩仓，一古脑儿

买进了琼港澳，他看着我大惑不解地问：“你不是说琼能源是龙头吗？怎么全买了琼港澳？”

我耐心地告诉他：“现在已经不是行情刚刚启动之时，龙头的劲已经到了龙身了，琼港澳与琼能源相比股价差了一半，肯定会有个补涨过程，咱们就炒它这个差价吧！炒股票一开始论质，然后论势，最后论价。现在正是论势之时，也就是说凡沾地产边儿的股都得升，哪个空间大就买哪个吧。”当然，牛市炒到最后便是炒低价，谁便宜买谁，这一点当时还未来得及告诉他。

湖南人一个劲儿地按计算器，告诉我斩仓的结果是他亏了80000元，我笑着说：“你放心，这些小钱准能赚回来，相反你如果一直捂着它倒反而要亏大钱呢！”

琼港澳果真不负所望，第二天就从11元升到了12元多，以后涨涨停停一气奔上了28元的高位，这时候快临近春节了，深圳人思乡心切，纷纷打点行李准备回家过年，只有我们还在坚守岗位。

在代人操盘的过程中我们一般是不满仓操作的，一是为了规避风险；二是便于捕捉短线；三是投资人常常有时要取点零花钱，免得到时提不出现金；这回既然要过年，湖南人也买好车票要与我们分手，他的股东账户上还剩100000元。当确认他不再需要提取钱之后，我决定帮他买入最后一只股价没有达到20元的股票——深华发。

这时，梗直的湖南人又想不通了：两个月前是你帮我买深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华发卖掉的，现在为什么还要把它捡回来？

我打趣道：“敢情你当初就很不情愿吧！这样，我们来算一笔账，当初卖掉深华发是 11 元，买入琼港澳也是 11 元，现在琼港澳升到 28 元，华发也才 18 元，同样的钱产生不同的效果，现在即便把它追回来，你也只有多赔七元成本，而那边的琼港澳咱们刨去手续费已经赚了 16 元一股，这账你得会划算！”

“华发这垃圾股还能涨吗？”湖南人这回倒很理性。

“是啊，我也知道这华发是垃圾股，但是大牛市大革命，把 20 元以下的股票全消灭了，现在除了华发啥股票都升了天，年一过后还乡大军要统吃的不就是最便宜的股票吗？”

“只是风险太大了一点。”湖南人还是战战兢兢。

“风险是有，但我认为不大。大牛市可以做到富贵险中求，因为所有人的头脑都发热了，往往把股价炒过头，关键是我们要在牛市结束前安然撤退，这才是最紧要的！”

“反正还剩下 10 万元，豁出去了！”湖南人毕竟还有军人之余风。

为了表示同甘共苦，我把自己所剩的几万元钱也都变成了“华发”，一古脑儿打到股东代码卡上。

买完这些股票后，除了车票我们几乎又成了“无产阶级”，打点背包之后与证券部挥挥手，“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春节过后，我想回证券部的心情比想回家的心情还切，还急。年初五一上班我到证券部一看：存款的人排成了长龙，买

人的窗口更是排起了复合式的长龙，人气鼎沸。春节前空仓的人懊悔不已，因为这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去了上海，又作了重要讲话：要加快发展中国经济！

老人家号角一吹，股市上万马奔腾。

一开市许多股票就像乘上火箭似的往上窜，琼能源眨眼间涨了四元，我们的深华发后来居上轻松跳上 20 元的台阶，最多时一股升了三元。

湖南人从家乡打来长途，问股票情况如何。

我高兴地对着话筒说：“全涨了，涨得最凶的是华发，深圳终于消灭了 20 元以下的股票了！”

他兴奋得直喘气：“这样吧，我再从家乡贷个百把万来，咱们全部买华发如何？”

我的心往下一沉：这家伙真是会走极端，如果所有的人都想拿钱来买仅三分钱收益的华发，股价又在 20 元以上，这股市岂不疯了？我压低嗓门对他说：“别这么得意，这两天我会把华发卖了！”

“为什么？为什么？”他在话筒里着急地直嚷嚷。

“等你来再说吧！”我觉得很难叫他一下子明白过来。

华发在后来的两天里最高曾冲到过 24 元，但春节过后火山般迸发出来的人气有所减弱，它已很难再创新高。思考再三，我觉得持仓风险过大，便在 23.80 元的位置上把华发卖掉了。四五年之后，甚至直到今天也未见到华发有过这样的高位，而我们仅仅过了一个春节就赚了它 30%！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湖南人果真携带着一张百万元汇票重赴深圳，这一回他红光满面，以前蔫头蔫脑的晦气一扫而光，军装换成了西装，胶鞋又换成了皮鞋，甚至还在领带上面披了一条羊毛围巾。既有点像上海滩的暴发户，又有点像香港的黑社会头子，总之，变得十分自信。

他让我们代为操作的账户已由当初的五十多万变成了 98 万，回来后他要求平仓，说他想自己试试，反正三个月已满期。

我很快明白了他的心思，他一定以为我们赚钱很容易，自己几个月私下揣摩也懂得七七八八，何不亲自上阵过一把瘾？再说投资是自己的事，迟早要自己干。于是，我爽快地把股东代码卡还给他，他也爽快地付清酬劳，并请我们在当地最豪华的饭店吃饭。

席间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并立下豪言壮语，要让这 200 万元资金再翻一番，然后在深圳买房，买车，开公司。

“如果你愿意，你就到我这儿来当总经理吧！”他用手抹一把嘴，十分真诚地邀请我。

我笑而不答，心想：除了搞证券这一行，实业我是不会沾边的！临别时我反复叮嘱，这下钱多了定要小心操作，不可鲁莽，有需要时尽管找我们，一定为你作免费咨询。

他搓着通红的大手说：自然，这是自然。一脸的诚恳。

以后在这个证券部里我们还是经常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是也许出于自尊，他很少过来咨询和聊天，老远看见了彼此只

是打个招呼而已。牛市中为他赚了四十多万，我们拿走了八万多，这对于一个跑运输出身的复员军人而言的确不是一个小数，这一点我很能理解，于是照做其他客户的生意。

有一天中午休息，证券部里没有人，湖南人突然走过来，邀我去吃饭。我婉言拒绝，说：“有事尽管讲，不必客气。”

湖南人有些窘，更有些难为情，嗫嗫嚅嚅地说：“不瞒你讲，这股票我自己做了以后老是亏，现在两百万又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了。”

我一愣：没想到他亏得这么惨。其实春节以后的行情总体还是向上的，只是出现了大幅震荡，这是牛市到顶的信号。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让他镇静下来，说说亏损的理由。

原来，他追高买了 67 元一股的深发展，看看涨不动，就在 64 元出货换成了鄂武商，谁知鄂武商又从 34 元跌到了 24 元，200 万元他只买了这两只股票，这下一只篮子里只有一个鸡蛋了，怎么又错了？这是他彻头彻尾想不通的。

我拍着他厚实的肩膀说：“你呀，真是开大卡车的料，只知道直来直去，也不知道拐个弯儿。深发展是当时股价最高的股票，已经炒到快 70 元了，还能升到哪里去？鄂武商是个商业股，34 元就是天价，你还去追什么？”

“那么照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离场，坚决退出！”我的回答只有几个字。

湖南人沉默不语，大概最后还是想通了，第二天就卖掉了大部分股票，退出一百万现金，他这次老老实实来找我咨询：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现在该怎么办？

我认认真真地告诉他：这一百万贷款你可以先还掉，牛市也快到头了，贷款炒股风险极大，千万别玩火。

“那我真的就此罢休，那亏损的四十多万到哪里去补？”

“要补也不能着急，而且在牛市末尾宜出不宜进，只能以小补大，不能以大补小，千万要注意！”

哪知湖南人借的贷款没到期，归还不甘心，他一跺脚买了两个铺头，而且还是楼花，每个五十万，正好是一百万！当时地产炒得过热，铺头卖得极贵。这一大型商场建成之后已是1994年，正逢宏观经济调控，除了最初卖出的第一批楼花之外，后面的成交极少，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正式开张。我不知道湖南人的铺头营业了没有，如果他回天乏术的话，这笔一百万的贷款肯定成了烂账！

1993年3月中旬之后，牛市很快接近尾声，深发展长期趴在40元左右，深华发一落千丈又到达七八元钱，如果那时候不果断卖掉至少要亏60%，它在高位停留的时间非常短，能迅速出手的肯定不多，这一着险棋至今回想起来还令我出冷汗，从此以后我很少敢买垃圾股了。

至于湖南人，自从深华发跌到八元钱一股之后，我再也没看到他高大憨厚的身影了。

据证券部打单的小姐说，他买了铺头以后，在深华发跌至10元钱时又全部买了进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漫长的熊市中，深华发长久的趴在两元一股的

价位上，迟迟没有启动过……

现在，回想我走上证券咨询的这段历程还是颇为自豪，经我的指点或代为操盘的客户在牛市中都赚了大钱，并且在股价从高位下落前平安撤离，我们的咨询柜台越办越红火，茫茫股海中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厚积而薄发”，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重要性，以前在做企业会计时所积累的财务知识，以后在电视台做记者时的经济知识，以及长期以来对人文科学的关注，都在开展咨询业务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支撑着我走过这一段充满挑战意义的投资生涯。

所谓人生的定位便是要找到最佳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汇聚了你以前生活、工作、知识结构、人际关系的总和，并且恰恰是与时代的需要、市场的需要相符合，这时的你才可能“四两拨千斤”，以最小的能量做出最辉煌的事业，让生命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有的人在寻找人生定位时会犯“千斤拨四两”的错误，化了很大的人力和钱财去做一件自己根本干不好的事，“顶着石头做戏，两头不讨好”，关键的原因是对自己不了解，对社会需求茫然无知。选择的切入点不妥，没有扬长避短，反而扬短避长，这种人生的悲剧时时在周围发生。这也告诫我们：“改写人生”是一种战略定位，事先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思想准备，把内在优势和外部环境巧妙结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七、牛市大逃亡

1993年春节以后，中国股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牛市老年期，证券部里整天涌满了人头，股价上下剧烈波动，获利资金逐步退场，新进资金汹涌而来，这时候的深圳连中学生也在炒股票，大学生在老师的带动下把股市当作投资的实验场，结果发现自己的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在市场上做得一团糟糕。一些港资、台资悄悄潜入大陆股市，境外投资者因为没有合法的中国身份证而着急，情急之下一次性地购入大量B股，因为B股的价格仅A股的 $\frac{1}{2}$ 或 $\frac{1}{3}$ ，被普遍认为是万无一失的。

那一阵子我特别忙，中午和晚上都排满了饭局，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热情邀请，无非想在牛市中再多赚一点钱。委托我们操盘的人也迅速增多，有的甚至只有一把未上市的新股，

也委托我们见机抛出，因为这些常来咨询的客户发现我们抛售新股的价格常常比他们高。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在牛市中我们只把股票当作已被炒高的虚拟资本，抱着落袋为安的强烈愿望。而这些宝安的农民却把它们当成了赖以生存的房子、土地或者是同甘共苦的老婆、孩子。要他们明白股票是不能伴随终生的，很困难。他们手中现有的这些钱全是因为特区土地政策赋予的，在此之前他们还是一无所有的渔民、农民，一夜之间卖了地变成了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其实除了这些卖地的钱他们还是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总想要拥有点什么，既然股票好赚钱，那就拥有股票吧，就像当年的土地、房屋一样。

被炒高的股票像击鼓传花似的转到根本不知股票为何物的人手里，尤其是一些本来搞实业的人开始并未涉足股市，后来听到每个人都在谈论股票，并且连智商最低的小商小贩、服务员、理发师、擦背的、捏脚的都在股市上赢了钱，这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冲动：我算不算人？我为什么不去赢？

确实，那时候我去宾馆或者娱乐场，连开门的 BOY 都会来跟我讨论什么叫移动平均线和 RSI 等等，令人刮目相看；喝茶吃饭时常有邻桌不相识的人帮我买单；逢年过节有许多人寄来贺卡和礼物；那光景真叫人留恋！那一年的股市实实在在让不少人赚了钱，有的是赚新股的钱，有的是赚老股的钱，股市从 1992 年 10 月份一路上涨，深圳综合指数从 180 点跃升至 368 点仅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如果那段时间有谁呆在深圳而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没有参与股市，一定会被认作怪物。

炒股赚钱之后，市场的消费气氛很浓，一些大户请我们吃饭每餐动则三四千，卡拉 OK 一次也要两三千，花钱都不皱眉头。有次我去工行储蓄所取钱，居然在台子上拾到一张六十七万的现金存折，当时我毫不犹豫交给了柜台，银行职员惊讶地盯着我，连问我的姓名。这张存折的内页上表明不用身份证及密码便能取款，事后一位相识的熟人知道了也觉得我挺“伟大”，其实并非鄙人伟大，当时我的资金加在一起还没有这个数，我何尝不想一跃而成百万富翁？可我不会贪不义之财，长久在证券市场生存，我相信自己会轻松地赚到这些钱，毫无问题。大牛市赚大钱，市场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世上没有不跌的股市，春节之后新资金的加盟虽然使深沪两地股市创下新高，但要维持这一高位，并且继续往上跑便十分吃力了。

首先是蓝筹股深发展步履蹒跚，在创下每股 68 元的新高之后，出现下滑，成交量随之放大，有经验的投资机构乘机抛出，开始进行轮炒。此时，市场上弥漫着普遍的乐观情绪，一些股评家预测深发展要走到 100 元以上，既然要见百元大关，那么每次回调都是介入的大好机会。“借问深股走多高？牧童遥指 500 点。”报刊上出现这种文章居然没人反驳。

我认识一位女孩子，婚前筹足了 4000 元准备买家具，这时也兴冲冲地赶到证券部，一古脑儿买了深发展，还挺乐观地对我说：“没有床结婚就打地铺，等深发展以后升上去了，我

买套两万块钱的家具！”此言不谬，然而她的深发展买在 68 元天价附近，两年后仍未解套，最低跌到六元钱，结果她与新郎就此打了两年地铺，我问她后悔不后悔，她苦笑着说：“可不，这两年天天躺在地上想这个问题呢。经济一窘迫，孩子也没敢生，股市倒督促我计划生育了。”

深发展无法创新高，琼能源作为深圳股市新龙头被一些机构动用大资金炒高，在它的带领下一批地产股鸡犬升天，莫不出尽风头。

1993 年牛市中还有两只最让人赚钱，也最让人亏钱的品种，即宝安权证和宝安转债，可称为孪生兄弟。所谓权证是一种认股证，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以规定的价格认购正股；转债则指可转换债券；平时以债券形式流通，到规定的时间内以规定的价格转换成正股。

宝安权证是在熊市中即 1992 年四季度上市的，当时的理论价格仅五毛多钱，因为当时宝安正股仅 13.50 元左右，而换股价为 12.87 元，上市第一天我也非常想买进，因为这是一个金融新品种，以前从未有过，会有许多人感兴趣。当初我填的价位是 1.58 元，心想已高出一元总会成交的。

岂知，一开市宝安权证就蹦到两元以上，本来一起排队想买宝安权证的客户一下子如潮水退了下来，我只看见仅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神定气闲地填了一张单：5 万股宝安权证，每股五元整。我惊得直咋舌。结果整个证券部就他的单成交了，成交价为每股 4.50 元，我当时想这人肯定疯了。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这位男子买到宝安权证之后目不斜视地走了。此人以前没来过证券部，以后也没见到他来证券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大赢家。

宝安权证在五元左右的位置徘徊了一阵之后，很快冲到七、八元一股，报纸上有些见多识广的学者开始撰文，预测这一品种如遇上大牛市将炒到 17 到 18 元一股，并且刊出详细测算公式。其时宝安正股仅 15 元。

我仔细地看过这篇文章，并与文章的作者认真探讨过，觉得言之有理。大家都不认识的东西才具有朦胧感，尤其是宝安权证发行股数不多，易于收集，易于炒作，它代表了市场主力对后市的预期，应该大有作为。

想清楚之后，我破天荒干了一件冒大险的事——把当初正在蠢蠢欲动的深发展平掉，然后以 11 元多的价格买了一把宝安权证。许多人说我疯了，太不理智了。一位大学老师还劝告我：别一头栽在宝安权证上终生爬不起来。还说：你看好权证，为何不买正股呢？

我笑而不答，正股盘子大，那么多人套牢，能炒得动吗？权证刚发行，现在已经创新高，每人都赚钱，上面没有套牢盘，虽说与正股相比差四元钱，但我还是愿意倾囊一搏。回想起那时的我，在股市上属于初生牛犊，资金少，输得起，没负担，还有点“笑傲江湖”的味道，锐气正足，这股劲头是非常宝贵的，它应该保持到我投资生涯的终点。股市虽则讲究理性投资，但看准了必须重锤出击！

买完宝安权证之后我即回家过年，春节回来一看该权证很快涨到 13 元，我觉得已经赚了不少，逐步平出一点，没想到它以更快的速度涨到 18 元以上，这时候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把它全部平仓，获利 60% 以上。我认为此时这一品种的风险已经够大了，因为它的价格已与宝安正股持平。谁知我平仓以后又有更多人前来炒作它，一些不知权证为何物的人，尤其是宝安农民几乎个个买了它，因为它比正股升得快，转眼间把它炒到了 21 元以上，我对每个前来咨询的投资者都说，千万不能再买宝安权证了，因为它已经比正股高出两元以上，如果拿它去换股的话宝安股价值 33 元一股，但这些投资者几乎没听明白什么叫权证，返身就扑了进去。我为他们叹惜但又无力阻拦，这市场疯了，其中宝安权证是最大的疯子！

当初跟我一起讨论权证的学者也已从宝安权证安然撤出，凭这一品种他在牛市中赚了数千万，我与他开玩笑：你是始作俑者，现在更应该写篇文章来劝告投资者赶快收手。

他笑指着一堆报刊杂志说：这里不是也有大声呼吁的吗？叫多总是受欢迎，喊空便会被人当作老鼠打，我可不想做过街老鼠。

翻开当时的报刊，还有些文章在分析宝安权证要涨到 50 元以上。现在想起来，这些所谓的股评家实在缺乏常识，不过，他们生下来也没炒过权证，不知者是无罪的。但 1995 年那波炒基金，不也有股评家叫嚷基金的理论价格在 10 元钱之上吗？看来人类总会重复同一种错误。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上帝叫你灭亡，必先叫你疯狂。

宝安权证便是最好的一例。1993年3月份之后，在21、22元以上接棒的人渐少，随着大市的回落，它一路惨跌，最后直至几分钱，待到交收的七八月份几乎已没法成交，因为那时宝安正股已跌到七八元一股，谁会拿了权证以11.78元的价格去换正股呢？宝安权证这一役可以说绞杀了无数投资者，变成了中国股市的“断头台”。

还有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便是宝安转券，当时的总额度为五个亿，以1.03元的价格溢价发行。发行时正逢熊市，几乎全被银行包销吃进，投资者认购很少。而等到宝安转券上市时正逢1993年初的大牛市，当时宝安权证正被炒得热火朝天，一些不知可转换债券为何物的投资者在第一天就买进了大量转券，该品种第一天收市价为2.55元，包销团悉数吐出获利达150%以上。

当时实施T+0交易，第一天换手量极大，第二天成交量无法跟上，价格有所回落，在2.30元左右收市，仍有许多投资者采取高抛低吸的办法做短差。在那段时间里投资者赚钱心切，持股一周为长线，两三天为中线，当天进出为短线，有的短线高手一天会跑进跑出七八趟，当然其效果是只赚手续费不赚钱，可见当时投资心态之浮躁。

深圳有位非常知名的超级大户X先生，他在宝安转券上市第一天就吃进二千多万股，此人我有过几次接触，高大白净，满腹经纶，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同时充当几家金融机构的

投资顾问，当时他的一举一动对窄小的深圳市场颇有号召力。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在一个大户室作演讲，那时深圳指数低迷不振，在他的鼓动下大户们纷纷填单买进，半个小时之后指数便上了十几个点，可见此人能量之大。

按理说，他对宝安转券的判断大体没错，一是在牛市，二是在大众尚未认识之时，三是有宝安权证作渲染，何往而不胜也？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政策上的作用。一是该转券大量集中在银行手中，抛盘十分集中；二是银行抛空之后管理层怕投资者高位跟风，一连刊出几篇文章对转券进行“阐释”；三是除个别大户之外没有实力机构操作，基本属于散沙一盘；结果这一品种每况愈下，除上市第一天外再也没有上过 2.50 元高位，最低于 0.87 元收盘，X 先生操作宝安转券亏了两千多万。从此他离开深圳，并且离开了证券这一行。

好在我并未参与宝安转券的炒作，因为第一天开盘就在 2.20 元以上，我认为它的价格已一步到位，它不像宝安权证是慢慢升高，逐步加温的，一个品种如果投资者不是阶梯式的接棒，而是谁都接在同一高位，那么将很危险，因为它没有空间。

时隔多年，1998 年 7 月管理层又推出了可转换债券，如南宁化工、吴江丝绸等。这次有一点不同，既无正股挂牌作参考系数，又不知转换价是多少，朦胧成分较多，投资者的跟风是不可避免的。南宁化工上市第一天最高价便跑至 2.50 元，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与宝安权证相仿；是否又会演出宝安转债那样的悲剧呢？我想可能性已少的多，因为市场和投资者都已经成熟了。这次接棒的大多是机构而非散户，不知下场如何？

宝安权证二月份到达 20 元以上，之后便上冲乏力，也显示出牛市到顶的征兆，但大盘仍在向上冲，没出现过一次像样的调整，谁也不知顶在何方？

2 月 15 日后，沪股在顶位 1536 点，2 月 22 日深股在顶位 368 点分别出现了大幅回落，几天之内深股探底至 280 余点，沪股滑落至 900 点左右，市场上一片惊慌，获利盘过于丰厚，许多人在低位了结，并发出“熊市来了”的呼救声。

众人一片惊慌之时，股指又缓缓启动，再次快速冲刺到 340 点附近，此时我们已预感到牛市到头，此次的上扬只不过是下跌之前的反抽，于是把压仓的琼珠江和琼港澳悉数卖出，虽然没有卖到一个最高价，但也卖出了一个次高价。从理论上讲，炒股不能要求在顶峰出货，只有在顶部确认以后出货才是最理想的，琼珠江和琼港澳卖出之后，我们全身心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记得珠江卖出去是 34 元，港澳卖出去 28 元，以后的五年之中这两只海南股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高位……。出于巨大的惯性，当时许多人认为牛市没完，特别是在牛市中一路踩空的人，他们成了牛市顶部的生力军。不久以后，深圳综合指数 280 点成为颈线位，指数在此塌方以后便走上了漫漫熊市。现在只要打开图表，368 点那个高耸的山峰赫然可见，在那场牛熊大搏杀中使多少人折戟沉沙，现在想来仍然触目惊

心。许多百万大户透支，最终被打穿了底，证券部自营账上的负数永远无法抹干……

而我们，1993 年牛市一役靠区区七万元却赚到了 80 万，留下 20 万人民币以利再战，其余全换成了港币，准备进军 B 股市场。

八、向 B 股、港股进军

A 股大牛市期间，B 股也出现了短暂的上扬，一些上市公司见风光无限好，便和承销商一起把发行价订得极高，如深万科原始股股价在 11 元港币，金田也在 10 元港币以上，上海发行的 B 股也有此现象。

B 股是可以自由认购的，但必须是境外投资者，所以投资层面不广，易进难出。

1993 年在 A 股市场还炒得轰轰烈烈之时，B 股已显出颓态，一路阴跌，发行价在 10 元以上的深金田、深万科都跌到了八九元的水平，套牢了当承销商的证券公司，也套牢了许多海外基金。新股事实上已无法高价发行。

从 A 股市场突围而出，很难找到新的投资目标。当时也有人向我推荐两个法人股市场，一批在 A 股市场中获利的先

向 B 股、港股进军 ②

知先觉者率先冲进这一市场大捞一把，股价低，筹码少，市场很容易操纵，但我觉得既然他们都已进去赚了大钱，我们何必再去抬轿子，不如踏进早已低迷的 B 股市场另图发展，同时也有些向境外投资者学习的意思。

走进 B 股市场，我首先接触到的是南方证券的国际业务部，这个业务部有几位忠于职守，处处为客户着想的经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开始走上了 B 股投资之路，仍有一些客户委托我们操作，我们继续在 B 股市场为他们服务。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很小的插曲：

B 股开户需要境外投资者身份，当时我们找了一位香港的朋友来深办公证并开户，这是一位整天关在画室里作画的国画家，一听说我们要炒股票，瞪大了眼睛连连表示诧异：“在我们香港，炒股票的人都亏得倾家荡产，这种事情我劝你们还是不碰为妙。”他操着不流利的国语：“再说你们都有一技之长，在香港没有职业的人才去碰它！”

我们笑了，告诉他：“炒股票眼下是中国最好的职业，有大批职业投资者以此为生，您是不用担心的。”

画家是位好好先生，他点点头，既然我们主意已定，他也只好客随主便了。

那天，我们公证完后要去办股东代码卡，站在马路上等了整整十分钟也没拦到一辆的士。中国大牛市的情结使的士司机也往证券部跑，谁还愿意赚这个小钱？再加上中午是驾驶员换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班时间，许多车根本不停。

等得不耐烦，我提议乘公交车，反正才三站路。当时是中午十二点，大街上静悄悄。

一辆公交车迎面而来，我们一行四人全上了车，除了画家之外，我们三个全为女流。车行过一站，突然跑上来几位新疆人，我也没在意，正好这时有人让位，香港画家出于礼貌非要让我就坐，而我则与他推让，客气之间我突然发现一个新疆人伸手在掏画家背包内的皮夹，我一把上去按住了这新疆大汉的手，没想到新疆大汉和他的随从立即拔出了刀子一齐向我捅来，我一边退让一边惊叫：你们抢劫！汽车内有位男子挺身而出，并出示证件：“我是公安人员，你们别胡来！”新疆大汉丝毫不理睬，这时公交车已经到站，我们连声大叫：“别开门！别开门！赶快开到公安局。”驾驶员却大开车门，售票员居然对着我们傻笑，作无知状。

我气得七窍生烟，冲到门口就去抓那个新疆人的肩膀，香港画家一看此状吓得直哆嗦，一把拦住我说：“算了，算了，钱包丢了算了！”两位女友也抱住我不放，争持间，说时迟，那时快，三个新疆人一齐跳下了车，扬长而去，在马路上还对我做鬼脸。

这时候，车里所有人包括那“公安人员”都来劝说我：“你不能去抓他们，你会吃亏的！”“多险啊！”许多人随声感叹。

我扭头问画家他钱包里有什么，他说：有信用卡，回乡

证，还有四千港币。

我舒了一口气，好在钱不多。下车后我们立即去报案，回乡证、信用卡在香港都可以补办，至于 4000 元港币，我和女友商量两人各赔一半，当即付给了画家，画家的脸色显然还没转过来，他发誓：以后再也不来大陆了。

我心里闪过一丝不祥之感：这 B 股还没做就遭人抢劫，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

以后的经历证明，这一预感是有道理的。

南方证券是深特房 B 股的承销商，我们认购到二十万股深特房的原始股，每股作价 3.55 元港币，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因为 A 股二级市场上每股作价 15 元，相信 B 股上市炒到七八元港币应该没问题。抱着这一美好愿望，我和我的客户久久地等待着。

深特房认购之后磨蹭了好久才轮到上市，上市第一天开盘在 4.80 元港币左右，连我们满以为十拿九稳的五元港币价位都没见到，以后就一路下滑，而且抛盘如潮。

我们不甘心这一结局，死死等待，不久就看着它到达了发行价附近 3.80 元，化了那么大的劲认购到的深特房难道就是这么个结局吗？这时我才明白：B 股市场早已变成了海外基金的套现市场，他们对这一市场的看法已彻底变得悲观，所谓“水浅不养大鱼”，在一个没有散户参与参加的市场上，他们能赚谁的钱呢？

投资 B 股一开始就十分不利，而我的个性偏是属于主动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进取型，永远不会自认失败。于是我开始订阅香港报纸，希望在港股上找机会。

我把这一想法跟南方主管国际业务部的经理一说，他们都十分支持我的主意，并为我破例开了深圳第一张港股户口，这时候他们总部也提出开拓国际市场，正要尝试进入香港股市、日本股市、东南亚股市等。

我打开香港股市的历年图表，发现当时市场正处低迷，恒生指数在 6800 点左右徘徊，很多个股长期没有成交，长实的股价跌得很低，甚至低于配股价。此时，长实董事长李嘉诚为了表示对本公司的信心，宣布用公司资金买回配股权参与配股，这一举动当时在香港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媒介甚至评论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信号，即股价已跌破应有价值，促使上市公司回购，港股大致已经见底了。

主意打定，我立即用剩余资金全部打入港股。因为钱少，我记得当时买的全是垃圾股，如宇宙控股仅一仙，骏威投资仅一毫，等等。香港证券公司的专家还讥笑我：“安妮，你为什么尽买垃圾股？”

那时候炒香港股必须用英文名，再加上我已在香港《商报》和《文汇报》开设 A、B 股专栏，于是干脆取名为“安妮”——这是一个最普通的英国女子的芳名了，我想：最普通，最简单当然也就最适合我。

买入港股之后，先是野村证券大举进入，将指数抬到八千点，当本港专家一致认为牛市到顶之时，美国大摩又进场扫

货，一举将指数炒到一万二千点。我并没有在最高位出货，大概在一万一千八百点时全面清仓，那时宇宙控股已涨到一毫，骏威投资也涨到五毫，而其中我还炒了一把国内的 A 股，基本上初战告捷。

南方证券国际业务部的老总见我“隔山打牛”还能获胜，干脆聘任我为他那个部的业务顾问，一些顾客见我买什么股也就纷纷跟进，成交量一时大增。

港股发动之后，B 股也略见好转，我们以前套牢的一些股票逐步获利，这次我大胆吸取深特房上市的经验，见高便抛，无论是闽灿坤，深特力，深金田我们都赚了 60% 的钱，特别是深特房让我们在 5.40 元港币的位置上全部获利平仓，B 股及港股的总市值一下子超过了百万。

A 股及 B 股市场上的成功使我有些得意过头，不久之后我便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由于深圳 B 股启动在前，上海 B 股跟风在后，我认为上海 B 股还有一波行情好做，于是把百万港币换成美金，大举进军上海 B 股市场。

我首先选择的股票全是浦东概念股，外高桥，金桥，惟独没买陆家嘴。而错就错在这一着上！

外高桥、金桥、陆家嘴本来股价是差不多的，外高桥、金桥在 0.70 美元，陆家嘴稍高，在 0.80 美元之上，香港股市的经验让我觉得，价位越低越能赚钱，所以全部趁低位打进“两桥”。一个月后，三驾马车分道扬镳，外高桥、金桥仍在 0.80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美元上下徘徊，有时甚至跌到 0.70 美元左右，陆家嘴却一路小跑，跃到了 1.40 美元以上。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追高，加上外高桥又要配股，只能挖了东墙补西墙，结果把金桥卖了去参加外高桥配股，迄今为止我的外高桥成本在 0.60 美元以上，五年后仍未解套。

1996 年，深圳 B 股曾敞开大门，向境内投资者开放，一时两地股价拔地而起，天天向上，外高桥有一天曾经冲到我的成本价 0.61 美元，我拎起电话就想平仓，我的一位客户在旁边，她劝告我：“别卖了，我们已经等了四年，还在乎这几天吗？”

转念一想，有道理，至少把利息拿回来呀！

岂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B 股市场紧急通知不能对境内投资者开放，已买了股票的只能卖不能买，一时卖盘汹涌，没几天股价就跌回了原位，我又白白放弃了一个平仓出逃的好机会，到今天外高桥 B 股只有 0.25 美元一股，我在深圳 B 股及港股市场赚的钱全部赔进去还不够。

回想我在 B 股市场投资常常是：一、有惊无险——套牢几年突然解套几天；二、有赚无回——好不容易赚钱又赔进去；三、有悲无喜——账上的市值无法套现；四、反复无常——摸索几年毫无规律可言。想必许多投资者都有同感。

输掉的是时间与金钱，那么赚回来的经验和教训呢？

我想应该概括成一句话：没有群众基础的市场千万别进去，“池小不养大鱼”，水至清也无鱼。

向 B 股、港股进军 ②

无论是中国 A 股还是香港股市，毕竟是有大众投资者参与的市场，所以它的起落起伏还是有规律可循，并且大体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但是深沪 B 股也罢，两个法人股市场也罢，由于投资层面的窄小，资金进出受限制，一直无法使它发育成理性、成熟的大市场，在这种市场玩股票，就像用你的左手打你的右手，最后是无法定出胜负的。

知道这一点对于我很痛苦，因为居然用了五年的时间去悟一条基本的道理，所以当以上市场还未变成开放的自由市场之前，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选择市场比选择时机重要，选择时机比选择股票重要，选择自己在证券市场的定位更重要！

这也算是投资 B 股与港股给我的一点回报吧！

九、被资产重组的宝安农民

从1992年底到1993年底，我在中行证券部开设咨询窗口长达一年，资金由小户做到中户，最后跻身大户之列。当时这家证券部超过百万元的大户有五十多个，包括个人和机构，其中也不乏上千万的。八十多平方米的大户室里沙发排成五大排，像看电影似的。沙发上一概总是坐满了人，行情火爆时有七八十人前来参战，保安凭大户证才允许进入。行情清淡时也常有二三十人围观，团结战斗，气氛热烈。晚上收市后大家久久不愿散去，聚成几个牌桌常常干到深夜，许多大户也把证券部当成了“家”。

久而久之，人与人相处彼此有了感情，谁买了股票赚钱，谁就成了“一日英雄”，免不了请客，买饮料庆贺一番；谁卖股票输了钱，又成了“一日狗熊”，大伙儿都会上前你一言，

我一语地安慰，甚至陪他长叹短吁。

有些人在家里连对老婆都不敢讲的话也在这里一吐为快，股市内外大事小事都可以在此自由讨论，征求意见。大户室里的两位打单员是很可爱的小青年，每天帮我们买卖下单，平时在一个锅里舀饭吃，说不出的亲切！现在回想起那时候的情景还让我留恋万分。

大户室里面让我忘不了的是短线高手李先生，进入大户室里携带资金三百万，其父在香港操作股票，据说他最初入市的本金一百多万是老头子拿出来的。

也许由于家庭的渊源关系，李先生一来就出手不凡，牛市中凡他追赶的股票十有八九能飞起来，万一飞不起来，他斩仓的速度也极快。那时流行 T+0 交易，当天买入的股票当天便能平仓卖出。他那三百万资金有时一天就打出两三千万的成交量，无愧于证券部的“顶梁柱”。

出于对他的尊敬，许多人称他为“李哥”，而他总是谦逊地一笑，说自己是小弟，要我叫他小李。

据他对我说，这三百万资金主要是他认购新股积累所得，特别是深圳“8.10”事件后，新股认购改为储蓄存款配额认购，对于有一百多万的他，利用资金优势轻轻松松赚了100%。特别是那时新股认购很集中，粤美的、粤美雅、粤电力、粤 TCL，光广东的股票一下子就有一大串，其余像广西、湖北、四川，哪儿有新股，哪儿就有李哥。岂有不发的道理？

在一级市场晃荡久了，人心思归，李哥想到二级市场显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身手，再说许多一级市场认购的股票需要抛售，他也必须盯盘。

开初，小试牛刀便锋芒毕露，这给了李哥很大的鼓舞，时间一长，再有新股他也懒的去跑了，每天呆在大户室里跑短线，跑个不亦乐乎。

1993 年大牛市结束之后，李哥账上的资金明显减少，但还没有伤筋动骨，因为他跑得快，还有 250 万。这时候我们开始把仅剩下的人民币聚在一起外出认购新股，顺便享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李哥觉得新股上市时间不确定，不如打短线痛快，留在证券部坚守岗位。

每当我们出去认购一趟新股回来，就发现李哥瘦了一圈，那账上的市值也在不断减少，那是一种慢慢的、悄悄的减少，像割肉挖骨一样叫人心痛难受，但表面上李哥还是笑嘻嘻的，对后市充满信心。

有一次我忍不住劝李哥：“下跌行情中千万不要满仓操作，另外切忌透支。”

偏偏李哥和证券部经理是哥们儿，因为他对证券部贡献太大了，除了打出可观的手续费外，李哥还常常义务帮证券部打工，什么改电路，修电脑，打扫卫生，李哥勤快得很，真比那些证券部的员工还本分，用他的话讲：“咱们每天在一起不是比谁都亲吗？”别人透不了支，李哥透支一句话。

想想也是，有时李哥打牌晚了就在证券部的沙发上睡一晚，第二天又精力充沛地跑开了短线。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年

轻人真应该在证券部拿双份薪水。

1994 年底我即将要到深圳去工作，年尾到证券部和老熟人——道别，当我走进我十分熟悉的大户室，里面的光景吓了我一跳！

沙发和电脑屏幕依然故我地放着，只是那上面蒙了一些灰尘，八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寂静无人，仅一位不认识的打单员在翻一本书看。往日的喧嚣和激情在哪里？往日买卖的吆喝在哪里？白板上照例贴着一些配股缴款事项，我翻开一看，已是半年前的消息了。

这儿怎么了？出了瘟疫还是发生了事故？

我把原来的证券部经理找来，他摊开双手对我苦笑，说：“全打穿了，不来了！”

回答是如此的简单，简单到不用解释。

“那么小李，小李呢？”我自认为这个短线高手不至于被消灭的。

证券部经理端了端眼镜，又一次摊开手：“只剩五十万了，是我劝他不要来了。”经理镜片后面眼光一闪，我看到那里面有愧疚、痛苦，还有说不清的许多东西。

“怎么可能？”当时百十号人挤挤嚷嚷的屋子怎么会变的这样凄凉？当时跑得比兔子还快的李哥怎么会只剩下五十万？我既震惊又悚然。

听说我的到来，当初打单的两位小青年跑了进来，现在他们已转移阵地，到外面替散户下单，是他们把一切告诉了我。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你还记得李哥常坐的那个位置吗？”打单的小黄问我。

“怎么不记得，不就是左边第一张吗？”在那张被坐塌下的沙发上常常是李哥正襟危坐，豪迈地发出种种号令：“小黄，替我打进 XX 股票五万股！”“小黄，替我卖出 XX 股票五万股！”李哥买卖不作兴几千股一单的。

这张凹陷下去的沙发记载着李哥多少可歌可泣的战绩啊！

“李哥是 1994 年 6、7 月份离开的，离开前他摸着这张沙发哭了，他说本来他想把这张沙发坐穿的，然后也就变成了千万富豪，没想到沙发没坐穿，自己的底快被打穿了！”

“打穿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透支买了五十万股深万科，12 元多买的，开始赚了钱，每股有二块多，到手了一百多万，结果他对深万科越来越痴迷，不断地拿这只股票打短线。没想到行情一路下跌，12 元的万科跌到了六七元，这样李哥的本金也就没有了。说起来，深万科还是只不错的股票呢，要是选了垃圾股，不到六七月份，李哥早完蛋了！”

听到这里，我只有为他惋惜的份儿了。李哥天资不错，但总认为自己能赢，这一点妨碍了他看清大势。顺势者安逸，逆势者徒劳，再聪明的人在股市大势已去之时都应该顺势而为的。不知李哥现在干什么？我突然感到很想念他。

还有一位来自沙井镇的表铺老板，给我印象尤深。他是靠做手表及小型挂钟发达的，身价也在百万之上。为了炒股票，每天早晨乘一小时中巴颠颠簸簸来到证券部。他有点文化，但

100万也炒得只剩70万了。为了省心他干脆把资产委托给我们打理，而自己则在证券部外席地而坐，伙同一帮子同乡打扑克取乐，从来不愿呆在大户室里，说看行情眼睛累。

牌桌上他是有输有赢，股市上则是一败涂地。有时他常常眨巴着眼睛很神秘地说：“我想炒股和打牌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赌。打牌我还赢过，股市为什么总也赢不了？”

我摇头对他说：“股市和打牌不一样，股市有规律，可以去找寻，牌桌上只有运气，无规律可言。要我打牌准输。你抱着打牌赌博的心理来炒股票，那是必输无疑的了。”

他眨巴着眼睛，叹口气，回头又出去打牌了。

与他一起打牌的，还有位号称“赌王”的男子汉，个人资产也有上百万，但这几年生意清淡，孩子生病，手中资金仅二十万也来炒股，其下场当然是与他打牌不一样，他看见钟表店老板把钱交给我们打理，自己也想这么干。我跟他说：“你参加咨询就可以了，这样花钱少，赚了还都是你的。另外乘年纪轻学一学，不好吗？”他一听，不错，便成了我们的座上客。

这位仁兄挺有情义，见我上下班要走一段路，就每天用摩托车送我一程，见了面总是说：“安大姐，你愿收我这个徒弟，我为你做什么事都行！”

一段时间下来，他的技艺果然有长进，我发现他很有潜质，最大的好处便是心理素质沉稳，有时他在赌桌上玩得很大，即便把全部身家押上去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炒股票只要不透支不会炒到零，这给他某种踏实感，所以无论是进货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还是出货，一旦想好他是十分果断的。

而他自己对炒股票也越来越有信心，并且对我说：“以前人家叫我赌王，以后我要人家叫我股王，你信不信？”

我真诚地点点头：“只要你坚持下去，会有这么一天的！”不过我还是很纳闷，他和那帮同乡打牌怎么老是会赢呢？说实话，股市上不会给人这样的好运道的。

他狡黠地笑了，这才是牌桌上的真面孔：“安大姐，我也不用瞒你，牌桌上不出千是不会赢到底的，我也是牌摸多了，来一张发一张用手指就能感觉到是多少点，所以我玩牌时点数捏的很准，不怕别人压多少。”

“股市上可没这样的好事，要拿捏得准全凭对技术面、基本面、政策面的把握，时间越长，经历的牛市和熊市越多才越有经验。”我推心置腹地跟他谈了好久。

有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他一个电话：“我儿子得了白血病，现在正在广州医院抢救，安大姐，我来不了股市了！”听到这一消息，我仿佛看到他满脸愁绪的样子。因为以前我就听说，他有个儿子得了白血病，已耗费了几十万，看来这次真的面临“病危”了。

“那么你的股票怎么办？”我为他着急。

“我已全部抵押给一个老乡，他给了我 25 万元钱，先给孩子看病要紧！”

这个外表狡黠的粗汉实际上有一颗极为柔顺温良的心，对他的孩子尤其如此。不少人都劝告他放弃对这个病儿的治疗，

反正他还有两个儿子，但他坚决不从。百万家产几乎都被这儿子耗尽了，他也无怨无悔。钱有时候确实不是最重要的。

牛市过后不久，我去深圳市内工作，从此再也没有看到他。有一次我过南头关口，突然听到有个沙哑的声音叫我：“安大姐，安大姐！”

蓦然回首，“赌王”正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脑袋上戴着头盔，让我险些认不出他来。

他把摩托车开到我身边，像以前一样载我回家。我在他身后问，“现在股票还玩不玩了？”

他沉重地回答我：“儿子死了，那二十多万也花完了，我再也没有本钱去股市了。”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大概以摩托车载客为生，每趟也就赚个五元钱，确实已沦为城市贫民。当初当“股王”的豪情壮志已烟消云散。

我想安慰他几句，但一时无法开口，转眼已到我家，他跨下摩托车取下头盔的一刹那，我看见这汉子的眼中有一抹泪光。

我默默地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让他有时间便来深圳找我。试想：如果他拿二十多万继续在股市操作，而不管儿子的死活，以后一辈子想起来都会懊悔的，钱能买回世界上任何物质，但无法赎回父亲对儿子的感情。在人生的道路上要摆正这一位置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当你面对巨大的金钱诱惑时，你能牢牢记住自己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又要到什么地方而去时，你才是一个真英雄，一个大写的人！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股市上“一将功成万骨枯”，要成就一个巴菲特式的股王，必须要具备多少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的巧合啊！

至于沙井镇的钟表老板，我们在 1993 年 3 月份牛市结束后把钱退还给他，以后再也没有联系。听说他用一部分钱给儿子自费上了大学，其余的钱仍在股市中打滚，不知所终。这还是“赌王”告诉我的。

输得最惨的是原来资金有一千万以上的胡总，他个人有两家企业，并有一辆奔驰 300，当时在宝安是挺威风的人物，进进出出总有一帮人跟着他，为他倒茶递烟，他的一举一动也自然被人仿效。

胡总在企业界干得不错，在股票投资上却一窍不通。大牛市尚未到顶，他听了朋友的游说，一千万现金全买了 NET 法人股市场上的股票，法人股股价比 A 股低得多，同样的业绩 A 股三四十元，法人股仅三四元，有的只需两元多，胡总一看，这便宜不捡谁捡？这钱不赚谁赚？结果一个猛子扎了进去。谁知法人股市场和我进入的 B 股市场一样，进得去出不来，胡总又买在高位，这些股票四元的不久变二元，二元的不久变一元，胡总怎么也想不通，天天来证券部骂娘，骂得我们心里都不是滋味。

有一次他垂头丧气地跑进来，对打单的小黄说：“今天我把汽车卖了，厂里发不出工资要现金！真他娘的！”

小黄对我这么一说，证券部经理猛地想起来了，胡总在 1994 年 12 月份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要借 50000 元现金。“有没

有搞错，你这个大老板向我借钱？我一年工资借给你还不够！”
证券部经理以为他是开玩笑。

“真向你借钱，我要给工人发路费，遣散他们！”电话里胡总恶狠狠地叫了起来，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听到这儿，我已哑口无言。

我想起当初认购了上千万宝安原始股的大坑村村委会，他们曾在 1994 年一季度找过我，当时宝安股的股价仍有 12 元左右，因为他们手上是可以流通的股份，送股加配股已有二千余万。我劝他们一次性卖掉，但村委会的干部经过研究之后告诉我：村民坚决不同意。

我为大坑村惋惜，自告奋勇地说：“你们能不能把村民集中起来，我去做说服工作。务必说动他们。”他们极为难地说：这是集体财产，必须村民集体通过，谁卖谁是败家子，他们不会愿意的。这是大家的命根子。

话已至此，我也只有三缄其口。大坑村是在 1992 年卖了土地之后买入的宝安股票，农民们自然将它当作聚宝盆准备传之后代，留之百世。现在跑来一个要挖他们“命根子”断他们香火的人，怎么能被接受呢？

最后，大坑村的那两千万股票其命运可想而知，到 1994 年、1995 年熊市时曾经跌到两元钱一股，即便在 1996、1997 年大牛市中它也再没有升到过 12 元。市值的损失足在两个亿以上，够造两个大坑村的。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宝安农民因土地政策敛来的滚滚财富在几年的资本市场中正迅速地被重组，被瓜分，所余部分也在慢慢贬值。如果再不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再不重视文化科技的投入，宝安农民有可能再次成为“贫下中农”，这不是危言耸听。

好在这几年来，宝安区打开大门引资办企业，外商投资额直线上升，教育质量也大为提高，一个崭新的宝安区正在崛起，只是不知道我那些被打穿的大户们是否已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

十、漫漫熊市从头越

1993 年 3 月份牛市结束以后便迎来了漫长的跨越一年半的熊市，在此期间深圳综合指数从牛市的最高位 368 点一直跌到了 1994 年 7 月底的 97 点；上海综合指数从牛市的最高位 1536 点跌至 1994 年 7 月 29 日的 333 点，跌幅分别达到 73% 和 78%，这两条大阴线的杀伤力不是股市中人是无法体会的。

前面，我们提到宝安农民的资产被重组，其实何止是他们，先期投入股市的第一批百万富翁中被消灭的绝不止一万人。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十个个人大户遭灭顶的就达八个，幸存下来的只有“杨百万”和另一个叫“许春华”的个人投资者。我亲眼看见一些以前资产上千万的人，现在做买卖股票只敢下几千股的小单，手指还是战战兢兢的。

1995 年我去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巧遇杨百万，那天我们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坐在一起互相探讨风险市场的成败得失，谈得颇为投机。杨百万送给我一张别出心裁的名片：上面印着一个哈哈大笑的胖子，身上扣一枝同样肥胖的钢笔，意味着杨百万平民股评家的身份。在谈到所以没有被股市的大风大浪吞没时，杨百万向我说出了一句属于他的名言：“以投资的眼光去买，以投机的眼光去卖”。幸亏有这一句座右铭，杨百万在大幅震荡的中国股票史上才站立得很久，成为历史人物。

上海滩第一代大户中，许春华先生也曾经在期市上惨遭灭顶，但后来他又在股市中重新崛起。我与他同台作演讲曾经有过两次，每次都见他在手腕上带着一圈佛珠，为一名刹方丈亲自赠送。每逢股市调整，他就遍访名山大佛，修身养性，在寺庙中闭门思过，据说效果神奇。

然而，我在漫漫熊市中跟他们的经历却完全不同。

也许由于自己是文人出身，一到市场调整，我就会换一种活法，从操盘手、股评家变成文学家、著作家，一门心思写起书来。这种角色的转换非常有利于调适自己的心情，深层次地思考问题。

1993年牛市过去之后，我们原先准备出版的《股市通宝》系列丛书才出了第一本《股票投资权威理论》，这本书汇聚了美国、日本、香港、台湾当代最权威的股票投资理论、经验和技巧，出版后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我们还向海天出版社报了另外三本书的题目，分别为《看盘与操盘》、《寻找最佳买卖点》、《股票投资技术分析方法与应用》，现在正是抓紧时间把

它们写出来的时候了。

一本正经地把自己关闭在书斋里著书十分沉闷，为了不脱离市场，应深圳《证券时报》之邀，我在国内开辟了第一个股评专栏《大户室的谈话》，用对话形式来描摹市场、评价行情，刊出之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读者每期将它剪贴，最后成册。

当时国内的证券类报刊尚无专栏文章，记得我是在《证券时报》刚成立不久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这一想法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在香港报纸分开了两个专栏，对专栏作者的要求，文章的风格，宣传作用已大体了解，所以觉得国内市场也不妨一试。建议提出之后即被编辑采纳，但是专栏到底采用什么名称当时并未定下。

经过几天几夜的思索，我一直在思考什么地方是人气最鼎盛之处？什么方式最能使行文更轻松活泼？什么人物最能吸引读者注意？想来想去证券部的大户室是最好的去处，大户室里的大户是最佳的对象；大户们的谈话是最引人入胜的股市记录。——这一形式以后被许多人采用。

这想法与《证券时报》编辑部一拍即合，于是从1994年4月开始我在这张报纸上正式开起了专栏，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先是《中国证券报》邀我在该报也开设一个专栏，我将它起名为《说股道经》，后是《上海证券报》专门派人南下邀我在他们的报纸上再开一个专栏，我就起了一个《安妮看盘》的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专栏名称。

好在那时正逢熊市，我的一支钢笔几乎同时开辟了六个专栏，《深圳特区报》上还有一个一周行情的栏目需要交稿，与此同时，我在香港《文汇报》与《商报》的专栏文章依然未停。

这时候的我，几乎每天一篇文章，而且还必须是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甚至不同观点，也只有星期日才有一天空闲。

现在回想起来还纳闷，那时的我五个手指攥了六支笔，居然也“妙笔生花，文思汹涌”。

人是需要压力的。我脑子里常想起儿子的身影，有时候想见他，都快想疯了！

因为那时的我初出茅庐，没有任何背景，只能靠自己柔弱的双肩去顶开这扇证券市场的大门，而且当时我是没有任何固定收入的，我靠稿费把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了。其实，当初南下时我就想过，即便没有任何工作，靠一支笔我也能养活自己，养活全家。

就在此时，我把在老家读书的儿子接到了深圳上中学。

由于没有深圳户口，上中学必须缴一笔“赞助费”，数字是6000元，当我把这笔钱郑重地交到学校时，我的儿子非常为我骄傲：这是妈妈一个月的稿费，凭稿费收入妈妈就能扛起全家的生活担子。

这时候的我，真的成了一个“职业作家”，只是我写的不是以前发表的散文、长篇小说及诗歌，而是一种叫作“股评”

的文字，我相信它最终将形成某种“股市文化”，类似文学作品中的“随笔”，受到广大投资者的欢迎，并且我会有自己的读者群。

除了撰写股评之外，1994年我在深圳开设了自己的电话咨询热线。

现在全国各地有数以千条的咨询热线，开播这种热线的咨询界人士也越来越多，但在当时的深圳能开设这种热线的仅二三人。

开始我只是咨询热线的忠实听众，每到下午收市之后就拿起电话仔细倾听各位股评家对当天行情的分析及对明天走势的预测。由于这些股评家都比较忙碌，或者要作相当长时间的准备，收市后来不及立即录音，致使我们每天听到其内容时都是在晚上17点以后，令人十分焦躁。

时间一长，我也很不耐烦，最后我想：为什么自己不能去试试呢？他们讲的那些我都懂，甚至能评说得更有味儿。

1994年五一节后，我找到当时的亿通声询台负责人老杨，把自己的来意及想法和盘托出。

老杨听完我的叙述之后，诧异地打量我问：“你能行吗？”

我把头一昂：“为什么不行？三个月后我能超过亿通台最前列的股评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底气很足，因为我觉得做咨询电话并不难。

老杨还是心存疑虑：“我们为了保证质量只邀请知名度最高的股评家做咨询电话，如果你这条线不行的话会影响我们的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声誉。”

我笑了：“检验知名度最好的办法是市场，也就是话务量，只要话务量上去就已说明问题。”我的回答不卑不亢。

老杨犹豫再三，然而过几天却正式通知我：上级已经同意了。

果然，我的声询电话不出三个月话量就跑到第一位，再过三个月其话务量超越原来前三名的总和，那时亿通声讯台仅我这条咨询热线每个月收入超过百万元。

亿通声询台想不通，邮电局也想不通，因为他们并未做多少广告或宣传，每次我到邮电部门去领酬金的时候，总有人指指点点，或从别的办公室跑出来，看一看：安妮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觉得这一切很正常，这是凭我的智慧和勤奋获得的，当之无愧。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我是第一个在声询电话中评介个股的股评人士，以前的咨询人士所讲内容除了对大势的观测便是技术指标的分析，对投资者直接赚钱的选股避而不说，惟恐引起麻烦。但是我想，既然是市场需要的，就应该知难而上，在股评中一定要把重点放在选股上。1994年我便推出了“不看指数做个股”的理念，这在熊市中是有实战意义的一招，否则每天只看到指数下跌，还有什么投资机会呢？

其二，我也是较早在声询电话中对宏观经济加以评述，并对政策导向及时报道或预测的股评家。记得在1994年7月底，

我提早预测熊市中管理层有可能推出利好政策，结果还遭到一位股民的投诉，因为他听了我的话在深圳指数 107 点时买了部分股票，买完以后指数就跑到了 97 点，他严厉责问我：“股票套牢的亏损谁负责？”

听到他打在留言信箱里的电话后我本想回电，岂料 8 月 1 日媒介就公布了“四大利好”，当天股市涨了 13%，这投资者的怨恨也就偃旗息鼓，我在留言信箱里反问：“你在 107 点买的股票赚了大钱谁有份儿？”这样一来我的股评电话就更受欢迎，因为投资者需要更多的具体信息，而不光是数浪。

其三是我在声询电话中首次推出了早、中、晚三档声询节目，早晨在开市前，中午在收市后，下午在全天结束交易时，一改原来投资者要等到晚上才能听声询电话的旧习，因此被认为是最及时，最准确，最全面的评述而大受欢迎。当时由于电话局中继线少，许多股民都打不通我的那条热线，亿通台常常被人痛骂。证券部门为了让所有想听电话的人一饱耳福，干脆用录音机通过喇叭播放，让股民们听完了声询电话才回家；而一些外地的股民则请深圳人当场录音再用长途电话放送，有些股民怕挂上了电话后面的人听不到，索性将我那条线开成“免提”连续播放；深圳某事业单位听说由于听我的声询电话，一个月的电话费高达几十万。

出于这种市场需求，电话局又把声询电话做到了外地、外省，最多时曾经有六十多个城市开通了声询热线，如果有时我因为生病或出差没有及时播出的话，几乎全国各地的电话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局都会来催问：发生了什么事？赶快播出！

花无百日红。久而久之我觉得十分苦累和厌倦，别人是套牢在股票上，而我是深深地套牢在专栏和声询电话上，从1996年开始，我逐步停写在海内外开设的六大专栏，从1997年1月我又停止做声询电话，逐步地从“股评生涯”中解脱出来，潜心提高操盘技巧及证券投资理论水平。

当我从股评界淡出后，经常接到许多热心的投资者打来的电话、写来的信，他们因为看不到我写的文章、听不到我的声音，觉得生活里面仿佛缺少了什么，对于这一点我深深地感到遗憾，我会更多地写书立著，把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生涯整理成文，公诸于世，以报答这些人生道路上的知己，投资市场上的同道。

漫长的熊市中，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不但没感到清闲，反而觉得十分充实，内心深处我在为即将到来的牛市做心理准备。

1995年的秋季我应邀参加了首届《中国股票理论研讨会》，在会上我结识了一帮证券界的朋友和咨询界的同行，深圳方面被邀的代表是野岛、周洪和我，王北方先生因有事未到。在会上我作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发言，题目为《九五规划与中国股市》，在这一演讲中我谈到：“按照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和紧缩往往都在三年左右，我国宏观经济调整自1993年6月份开始以来至1996年6月份恰恰为三年，根据股市提前反映经济周期变化的理论，我们相信中国股市高涨期的到来大约

会在 1996 年初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期也将在 1996 年下半年席卷中国大地。”在演讲结束时我还预言：在即将到来的牛市中会出现股价 100 元以上的股票（当然包括分红含权）！演讲结束时虽然赢得了掌声，但并不热烈。我十分尊重的一位前辈对我说：“安妮，你的演讲感情色彩太浓了。”言外之意，这样的预测是缺乏理性的。

当时我挺认真地说：“现在是下跌市道，大家都看淡，但我认为中国经济，尤其是股市要起飞了。”

开这个大会的地点是成都西藏饭店，在这次大会上我荣幸地认识了陈琦伟教授，他儒雅的学者风度令人如沐春风；与经济学家肖灼基先生畅谈数小时，思路大开；我还荣幸地认识了上海的应健中及瀚民，我们三个曾在《中证报》轮流“坐庄”开专栏写稿，却从未谋面。这回初次相识，自然分外亲切。去泸州川老窖上市公司参观的路上，我们说得很多，上海的股评家一致鼓动我去上海发展，使我感到全身热呼呼的，比喝了高度川老窖还带劲儿。

同时，在这次大会上我还认识了许多券商及上市公司的朋友，大家彼此来往，友谊绵延至今，互相得益匪浅。

大会结束后，西藏自治区信托公司证券部邀我去西藏开讲座，他们那里还从来没去过一位股评家。

盛情难却，大鹏证券成都营业部派陈迎先生陪我前往。我冒着高原反应，呼吸困难地说话，步履沉重地走路，顶着一跳一跳的头疼，在自治区礼堂终于顺利作完了我的投资报告。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会场上掌声雷动，我的脖子上围上了一条又一条哈达，一群西藏女股民拉着我的手哭了：“安老师，我们真幸福，终于听到了你的报告！”面对这些少数民族投资者的感激之情，我比她们更幸福。虽然我的报告会几乎开遍了全国各地，但受到西藏这么隆重的接待还是第一次。信托公司的老总，证管办的主任一直陪伴着我，惟恐我身体不适应；证券部的财务经理把挂在自己身上的护身符送给了我，祝我一路平安；司机为了给我买票，连夜来回跑机场，一夜未眠；临走他们问我到西藏的感想，我说有三点：

- 一、自然界很伟大，炒股很渺小；
- 二、人类为了回归自然要付出比破坏自然更大的努力；
- 三、西藏人适合炒股，因为他们离神最近。

听到最后这一点，他们都乐得直拍手——因为我说对了！西藏人炒股票几乎不亏，有意思的是他们套牢之后一概不斩仓，而且除了西藏本地的股票，外地的一概不买。当时仅仅上市了一只西藏股票——西藏明珠，在这只股票上人人赚了大钱，而且是领导干部反复动员之后才不好意思地赚了大钱。

在西藏的日子里，晚上每有高原反应睡不着觉，我就爬起来写作那本《股票投资技术分析方法与应用》。那些日子我即便在飞机里、火车上都带着这本未完成的书稿，很多章节是在飞机上的小桌子上完成的。虽然是一堆枯燥的公式与数字，但是我觉得其乐无穷，因为这里面每个参数都浸透了当时手工记录和计算的实战体会，会浮现出一个个栩栩生动而难忘的镜

漫漫熊市从头越 ②

头。脑袋因血管怒张隐约作痛，我站在窗户前，心灵随着高原的寒风在宇宙间游荡……

西藏的夜空是我见到的最神秘的夜空。

深夜静悄悄，我对着窗外贴得很近的月光和低垂在四周的天穹默默祈祷：牛市，你快快降临吧！

十一、四大利好强刺激

在漫长的熊市中，深沪两地的最低位均在 1994 年 7 月 29 日出现，上海指数为 333 点，深圳综合指数为 97 点。从牛市走向熊市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93 年全国热炒房地产之后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许多单位和个人从银行大量贷款投入地产建设，地皮飞涨，楼价攀高，信贷失控，形成泡沫经济。中央及时觉察这一问题，于 1993 年 3 月初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地产降温。1993 年 5 月 15 日及 7 月 11 日更是两次加息，收缩银根，调控措施连连出台。

在此打击下，股市不断下挫，一再破位。至 1993 年 7 月初，上海股市从高位 1536 点直泻至 777 点，恰好跌去 50%，深圳股市则从 368 点直探至 240 点，跌去 30%，两地的管理层及投资者束手无策，对突如其来的熊市毫无思想准备。

四大利好强刺激 ②

以前深沪两地股市的股票少、规模小，对宏观经济变化一向缺乏敏感，甚至十分滞后。就拿邓小平同志南巡来讲，事件发生在 1992 年 2 月，但深圳大市反应在 1992 年 4 月，上海大市反应更推迟至 5 月。那时候的股市往往是微观政策及消息面对其影响颇大，如更改交易方式，打开涨跌幅限制等，但宏观经济政策很少被人提及。

在深圳厦信证券部召集的一次大型股评会上，我有幸被邀演讲。同台演讲的有十名当时在深圳市场颇有声望的股评家，而女士仅我一人。在各位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高见之后，有位听众递条子指名要我回答：安妮女士，这股市跌到什么时候才是头？

当时深圳许多股评人士在公开媒介上表态，深圳指数 240 点是铁底，上海的许多股评人士则认为 777 点是铁底，简直固若金汤，并且发出“越跌越买”、“大胆抄底”的口号。

管理层为了安定投资者的情绪也频频亮相，呼吁大家不要惊慌失措，并暗示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投资者当然深信不疑，指数屡次触及这些敏感点位，都会有“神秘资金”出来托市。

但我不敢苟同，决定股市走势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大局，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业绩，深沪两地大牛市中最为出风头的是地产股，现在房地产降温，银行收回贷款，它们的业绩如何不令人担忧？创利能力和其它经济指标滑坡是肯定的。我觉得股市的大势并非是管理层的温情和投资者的善良愿望所能支撑，它后

◎ 安妮投资生涯路

面是冷酷无情的经济规律。要不要把这些和盘托出呢？这样说肯定会得罪满怀希望的听众，甚至得罪管理层，但如果不说实话，又和我做人的原则大相径庭。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深圳，在特区都不能堂堂正正做个人，那我来这儿干什么？！应该实话实说！

于是，我直言不讳地向下面的听众和旁边的同行亮出自己的观点：我个人认为，深沪股市止跌回升的动力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何时银行不再加息，而开始第一次减息，何时便是我们抄底买股票的时刻！

此言一出，嘘声一片。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股评界的同行均不能认同，当场有一大汉跳出来批驳我的“谬论”，指责我不懂中国股市，尤其不懂社会主义的国情，还用波浪理论驳斥了我的“误导”。

我被这阵“排炮”打得低头不语，当时正在我身边的《中国证券报》记者怕我难堪，一个劲儿安慰我，让我别在意。我非常感谢他的好心，但我为当时深圳股评界缺乏一种平心静气探讨的空气而深感遗憾。

吃晚餐的时候，九位男性股评家几乎一致地抱着某种善意规劝我：安妮，你太缺乏经验了，怎么能在大众场合说这种话，这样下去你会吃亏的！

我确实听说过，某位上海的股评家因为在牛市中唱空被人打掉了牙。中国的投资者都喜欢看好，并不喜欢看淡；喜欢多头股评家，不喜欢空头股评家，那么我在熊市中如实表达自己

四大利好强刺激 ⑤

的观点，会不会也遭此下场？按理说，我应该十分谨慎，尤其当心不要被人掴耳光，甚至是打碎牙之类。但当时的我没有声名所累，实在透明得可以。席间我非常坚定地说：银根收缩，股市下跌；银根放松，股市上攻，全世界都一样，难道中国就特殊？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大家可以走着瞧！

看我的这副倔劲儿，男士们只能摇头微笑表示大度，倒是刚才起来挑战的大汉，端着一杯酒过来对我说：安妮，240点你不抄底，以后肯定要后悔！

直到现在，我并不为当时的所作所为而后悔，倒是那位大汉屡抄屡套，屡战屡败，其后果不言自明。

为了挽救下跌的股市，管理层煞费苦心推出种种措施来稳定人心，激活市场。上海证交所于1993年12月20日（冬至）宣布，上市公司配股不能超过原有股本的30%，制止在市场上大量圈钱的做法。这条措施公布之后，股市没有反弹，反而从千点大关一口气跌到了八百多点；深圳交易所早在11月22日推出T+0交易，以便激活市场。然而股市在活跃了没几天后就一路阴跌，反而刺激了当天卖出平仓的力量。

由于深圳可以当天卖出，有利于回避风险，原来实行T+1的上交所不得不也实施这一交易规则。其实两地均在争夺资金和成交量，当时最少的一天日成交额仅在二千万至三千万左右。全国已有二百多家证券部，打开交易所的统计周报，有的偏远地区一周的成交量仅58元，如何养活这些券商？如何养活大批从业人员？两地的交易所均已亏本，日常运作费用严重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匮乏，市场到了一触即溃的危险关头。

一些小证券部顶不住了，开始向外承包或出售，有几家券商都曾经问我愿不愿承包，条件是打平支出后，每年上缴 30 万至 50 万不等。

条件很诱人，但我想，股市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谁也说得不准，在深圳，一个证券部最起码的支出在 200—500 万元，在这样死气沉沉的熊市中，谁能做出这么多的手续费呢？

“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从 1994 年 1 月份起，我受聘在农行的一家证券部任投资顾问，月薪加津贴为 3000 元，这工资比证券部经理还高。就在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赵嘉岭先生与我联络，邀请我以嘉宾身份每周五为全国的投资者作股市评论。这节目一做就是三年。通过电台这一纽带，我把自己的观点推向全国，最终接受市场与投资者的检验，以至后来我在全国巡回演讲时，许多投资者都真诚地告诉我：你的声音我们早就熟悉了！

面临每天下跌的股市，许多投资者的精神面临崩溃，有的人干脆不来，走路都远远地躲过证券部；一些号称百万元的大户只是中午吃盒饭时露一下面，其余一天时间都不见踪迹。我所在的证券部经理倒非常豁达，熊市时组织大家轮流旅行，用他的话说：牛市中谁也别请假！

1994 年 6 月份，我从云南昆明旅游回来，发现证券部的股民从 7 月份起悄悄地多了起来，套牢的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看也不动，不看也不动”；一些未套牢的，甚至从来

四大利好强刺激 ◎

没做过股票的投资者开始向我咨询：现在能不能买入？在此期间，我还碰到几位海外华侨希望我推荐股票，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股票太便宜了，而中国经济并不坏，两者反差太大。证券部管资金的经理也告诉我，这几天几乎每天有几百万资金从外面打入，这和1993年6、7月份每天有几百万资金从证券部转出正成对照。我的一位开发廊和饭馆的朋友甚至问我，现在能不能卖了发廊和餐馆买股票？我郑重其事地回答他：可以考虑。

种种现象引起我的警觉。这段时间我和一些股票同仁成立了“安妮投资顾问群”，编辑出版自己的第一份传真《股海信息飞船》。当时，我们正在建信深圳证券营业部开办一个“短线投资培训班”，从技术指标看，各项数据已经到底，它们发出的不是一个“短线买入”的讯号，至少已是一个“中线买入”的强烈讯号。我对当时的八十多名学员说：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快要结束了，学以致用，显示大家真本事的时候到了，请各位活学活用，在股市上一决雌雄！

三个月以后我和这批学员再度相见，他们的平均获利率达80%以上，基本上全部顺利逃顶，兑现为现金。而我们安妮投资群的五员大将——陈宁、孙志伟、成功、大毅、小桑的个人资产全部翻番。当时我们成立了投资顾问群，但尚未开办自己的公司，因为觉得扩大规模时机不成熟，在形势发展与自我准备不充分时应耐心等待。这和做股票是一样的道理。

当股市跌无可跌、投资者心灰意绝之时，自然会有利好消息来配合。7月底的时候，我就听说中央高层在开会，要挽救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中国股市。以前对这种传闻我是不会太相信的，因为即便出现利好，当股市尚未跌透之时救援作用不大。而现在当所有的多头都已死心，甚至有人认为深圳指数要跌到 50 点去，那么股市的合理存在便成了全社会关心的问题。假如管理层在此时推出救市措施，那将会非常有力度。即便如此，我在深圳指数跌破百点大关后仍未敢买股票，只是在《大户室内的谈话》（见 1994 年 7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中提醒投资者可以来证券部上班了，希望读者“注意盘面变化，认真分析周围形势，潜心选股，最要紧的还是回顾你的投资生涯，为抄历史大底做好心理准备”。

以后的事实证明，深圳指数 97 点、上海指数 333 点确实成了真正的“历史大底”。

8 月 1 日清晨，我的呼机一次次鸣响，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打来电话：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四大利好、三大措施，股市要起来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证券部，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一张《安妮传真》号外。这次，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几乎全是浦东板块：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传真号召客户满仓操作！

好不容易等到开市，四周是一片电脑键盘的敲击声，屏幕上传来“哒哒哒”大笔成交的报盘声，大户室里每个投资者都在倾囊买入。9 点 25 分，“哇”——大家惊叫起来，因为深沪两地股市指数一下子跳高 7% 开出红盘。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买到，几乎没有一张单成交。

四大利好强刺激 ⑤

许多手指拼命敲击键盘，慌不迭地撤单、输单，股价扶摇直上，众人一路追高，有人拍手笑了起来，伴随着得意的叫声：买到了！买到了！话音未落，抛盘骤至，特别是深发展、深长虹，有大卖单十万、二十万股地往下砸，试想：苦熬了一年多的套牢者碰到这么大的升势，哪个人不想立即抛售，入袋为安？多少天的煎熬挣扎才换来今天的一根长阳，痛快！实在痛快！持股者第一反应就是把烫手的山芋扔出去，扔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散户窗口有些本来填单买入的人犹豫了，有的开始改成卖出。散户大部分都有着大把套牢的筹码。

这时候，我的脑子反而清醒过来，反复提醒自己：理性分析是最重要的。

管理层本次推出的利好与救市措施，无疑是实质性的、破天荒的，在此之前，管理层还从未这么直接地干预股市，可见它是经过反复商讨，精心布置的。既然如此，干预必然有效！尤其对中国这个尚不成熟、规模极小的新兴股市而言，投资者的过度反应并不足怪，等第一阵抛售风过去之后，买气会稳稳地占上风。

这样打定主意之后，我们在指数回落之时大量买进，直至最后一分钱。买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心里有着必胜的信心。

市场情绪由急躁转为稳定，股价也由骤起骤落变得扶摇直上，我静静地看着买来的股票稳步攀升，心里觉得无比快乐。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幸好是电脑显示，电脑储存，否则每分钟市值都在增加，100元的大钞用两只手点数恐怕都点不过来。

8月1日收市后，我们在翻查成交回报的时候发现，某个很大的券商在深圳指数上冲到113点的时候，把自己在100点辛辛苦苦捡回来的股票全卖了，而我们恰恰捡了他们的便宜货。由此也证实了我们自己的操盘经验：不见利好不建仓，一见利好打满仓。即便此时成本稍高，但心态极好，可以一路持有直到升势结束，通吃一波升浪，把货卖给我们的券商虽则抄了历史大底，但容易满足，一有盈利就跑，等他们想捡回来，成本已升得很高。8月1日深圳A股指数大升29点，升幅达三成；上海的A股渤海股份则升了百分之百。做股票不光要踩对点数，更要踩准节奏；点数踩错了只要把节奏调整过来也为时未晚；但如果节奏踩错，那么任何点位对于操盘手而言都是陷阱。

我们在周一买入股票，到周五连拉五阳，指数从97点升至166点，深股总升幅达73%，我们的盈利已超过50%。这时我们预测股市将出现第一次像样的回档，回调幅度大约在总升幅的三分之一，即142点附近（见1994年8月6日《大户室内的谈话》专栏）。于是一致决定平仓，巧妙地躲过了第一次调整。

调整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分布仓位，分别从深圳的大盘股深发展、深深房（浦东板块8月1日未抢到）转向上海的公用事业股：凌桥与隧道股份，结果这两只股票不负众望，一路扬

升，令我们赚得盘盈钵满。

炒作的第三阶段进入刺刀见红的超短线时期，我们的资金从开始投入的二十余万已膨胀至一百万，由于当时实行 T+0 交易，这一百多万的保证金往往一天就做出一千万的成交量，从含权股炒到低价股，又从低价股炒到基金，一日三变，面目全非。那段时间真让人过足了短线快枪手的瘾头，但有些大户不谙此道手痒痒，结果常常被市场左一巴掌右一耳光打得鼻青脸肿。

一个月后，本次牛市以大成交量一举突破深沪两地的 200 天移动平均线，图表上走出上升行情中的第二个缺口——量度缺口。我根据两个缺口的情况预测“深沪股市主升浪的最高点应是突破缺口至量度的二倍，即指数 250 点附近”（见 1994 年 9 月 6 日《大户室内的谈话》）。时至 9 月下旬，深圳指数已冲至 230 点，两地累积升幅极大，上海达 200%，深圳达 100% 以上。我们的警惕性越来越高，一颗心像悬挂在空中。

9 月底的周六和周日，安妮投资顾问群同时接到四家券商的邀请，希望开设投资讲座。当时的点位极为关键，我们马不停蹄地连续做了四个报告，在每个讲座上唱空，希望投资者保持冷静，及时获利回吐。这一观点是经过安妮投资顾问群五个人集体讨论的结果，由于大家非常一致，所以态度也就十分坚决。

孰料，我们的讲座受到一些投资者的反对，他们向券商投诉，说我们已经空仓，要想吃便宜货，所以才叫大家抛空。在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我们做完讲座后的周一，深圳指数果然从 212 点反弹至 225 点，券商之一便找我去谈话，提醒我们不要误导，有碍形象。我听了微微一笑：其实我们自己还是满仓，点位越高风险越大。作为股评人士把真实的想法和研究结果告诉投资者，我想是负责任的表现，既然有人反对，那么只有让事实来检验了。

我们期待着公正的评判。

十二、无股一身轻

在9月29日的报纸上一下子刊出深圳有六只股票大额度配股，配股以权证方式在市场上先交易六个月。

这个利好消息是盼望已久的，许多炒家都想在短期权证这一新品种上展露身手。在这前一天，即9月28日，我们和上海W证券远道而来的操盘手们有过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聚会。

W证券总部的几位操盘手有两位在1992年、1993年曾经与我们并肩作战，记得那时大家都聚集在深圳友谊城特区证券部的大户室。那间大户室可能是全国第一个专为大户服务的房间，自然也成为全国股评家、投资家的摇篮。在大户室经常出没的有古思平、余昌力、王北方、白雪，司徒伦等人，现在应该说都已成为证券界的成功人物。那间房并不大，至多只能呆二三十人，但是这大户室内最后发生的分化及财富的两极走势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是比其它地方更加明显的。

与我相识的 W 证券操盘手作风稳健，手法娴熟，而且为人谦逊平和。所以，听说他们来到深圳，并邀我们前往相聚时便欣然应允。

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同时前来的还有南方、大鹏、国投等一批证券机构操盘手，大家都是熟人，共有二十多人，席设两桌，气氛热烈中又有些紧张。

三大利好刺激起来的这波行情，上海明显强于深圳，许多个股已有 100% 以上的涨幅，但深圳的行情较为滞后，个股涨幅也不大，这样一来，已从上海股市逃顶的主力就携带大量资金前来深圳，看一看有无希望再做一波。席间意见明显分为两派，深圳证券机构的操盘手普遍认为大行情即将兴起，深股上方目标至少在指数 280 点以上，因为沪股指数本轮行情已挑战 1993 年牛市最高点。深股目前的 225 点只是二浪调整区域，还有三浪远未走完。

安妮投资顾问群有三人参加本次聚会，我们是惟一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有以下几条：1. 上海人民银行已发出紧急通知，不得向券商透支，并限期平仓，沪股指数就是在此背景下见顶的；2. 深圳资金面相当紧张，已不支持深股再走出三浪。从我们每次在股市座谈会上调查的资料表明，深圳投资者有 95% 以上均已满仓，还有多少资金能推动这行情往上走？3. 三大利好刺激出台，正逢浦东新区获中央支持大力开发，有题材配合，而深股大部分为地产股，仍处低潮，依赖大量配股凝

聚的人气多为投机性，一旦大势有变，将“树倒猢猻散”，不能寄予厚望；4. 本次行情是在政策面基础上发动的，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面并未变化，银根没有放松，行情不会持久。这是最主要的。

在这次聚会上，我们坦然相陈：明天就是我们准备出货的日子，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然而大部分证券机构的操盘手们还是信心百倍，准备明日进场抢盘，并且极有把握地说，指数要创新高。

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上海 W 证券总部来深的客人却表示出耐人寻味的沉默。

席间有位证券界咨询人士悄悄地对我说：安妮，你明天要出货？不是骗我吗？

我一听差点喷饭：明人不做暗事，在市场上骗人有什么用？再说，走不走，主意自己定呗！

第二天，开盘前我们便将所有股票填低五到十个价位（当时每个价位为 0.05 元）预先卖出。9 点 25 分后，市场果然开出红盘，我们原先持有的深发展，桂柳工，武凤凰等股票均以最高价成交，比我们所填的价位高出 0.30 - 0.70 元不等。十五分钟之后，指数开始急泻，上午虽然有过一次反弹，但从下午开市后抛盘义无反顾地倾泻而出，多头难以抵抗，当日以大阴线收市，市场一片惊慌。

9 月 29 日、30 日，股市大泻两天，深圳指数一下子回到 200 点以下，市场多空分歧严重，到处都在讨论下跌动力来自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何处。

有些人归咎于上海主力打压，但他们其实还没来得及建仓，我们所持的股票加在一起不超过三百万，人为打压是不可能的；有人归咎于领导人健康问题，但深圳人当时尚未听到这方面的流言；我在《大户室内的谈话》中写道，并非是利空促使行情下跌，倒是利好一下子出得太多了，29日一天便有六支股票宣布配股，这要从市场上圈走多少钱？在一个资金严重失血，难以独立支撑大厦的股市，它将成为一根导火线，使大厦哗啦啦倒塌，归根到底也不是配股的问题，而是行情确实已经走完，基本面、政策面、资金面、心理面都已不支持它上扬。

在股市下泻的9月29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前面有客户投诉的某证券公司老总，告诉他股市马上会产生连续的下跌，请他们证券部的投资者清仓。这位老总非常有感触，觉得我们还是很负责，热情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成都营业部作一次演讲。而在26日晚私下问我们是不是出货的那位股评家，也打来电话感谢。他已顺利出逃。

国庆放假，我们一行三人来到蜀中成都为四川的投资者开设讲座，此时真是“无股一身轻”。

记得这天正好是10月2日上午，霏霏细雨打湿了成都的房屋和街道，使这个喧嚣的城市显得少有的宁静。一早来到证券部的楼上，那里已经挤满了七八百号股民。大家一见我入座，拼命地往前拥挤，热烈地鼓起掌，使我一下子感到成都人

火辣辣的热心肠。会议开始后又涌进很多人，会场挤不下，只好席地而坐。

在会场上，我们分别阐述了对市场的看法和预测，人群中不断发出“啊”，“啊”的疑问声，看来成都股民的脑子还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尚未从热火朝天的牛市中惊醒过来。

许多投资者纷纷往上递条子，总计有三四百张之多，为了使急性子的四川人莫心焦，我在开始演讲时就说：保证回答每一张条子。这才使讲座上的气氛稍稍安静。

有许多张条子都问到：安妮女士，请你告诉我们，这股市到底要跌到哪里？

我看着这些条子有些犯愁，应该怎样把真相告诉这些套牢的投资者呢？

我踌躇不决地看着下面一张张真诚而焦急的脸，问：“你们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下面一条声地回答：“听真话！……”

既然如此，我狠狠心，老实地告诉大家：“最小量度跌幅为总升幅的一半，即深圳指数 160 点左右。”

没等我讲完，下面一下子乱了套。大家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下跌幅度，有人大声地在下面议论起来，会场秩序有些混乱。

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慢慢悠悠地继续往下说：深股从 97 点起步上升到 225 点，累计上升了 127 点，升幅的一半即 64 点，所以 A 浪调整的第一目标便在 160 点附近。当然，股市也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是跌跌停停的，在跌幅三分之一处有次像样的反弹，点位在183点附近。这一反弹已在节前出现。

下面有更多的条子递上来了，其中有一张这样写着：“安妮女士，你现在是不是空仓，要吃我们的便宜货，所以才这样吓唬我们？”

我看见这样的条子，“扑哧”一声乐了，回答道：“如果你这样想，你完全可以和我反向操作，越跌越买！”

全场的人也一下子乐了，笑声淹没了场上的焦虑和愤怒，大家突然觉得像一家人一样，毫无阻隔。这股市下跌了，谁也没好处，它像一场游戏，捉弄了所有的人。

我手中还有这样一张条子：“既然股市要下跌，我们套牢了怎么办？”下边署名是：一位可怜的投资老。

当我读出这张条子时，台下又是哄堂大笑，当然更多的是苦笑。

“冒昧地问一句，类似情况的人有多少，能不能举手让我们看一下？”我经常在讲座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以便做市场调查。

台下“唰”地举起一片手臂，一边高举着一边相视而笑，连看门的保安也举起了手，看来成都人这次都成了“大闸蟹”，其实全国都差不多。

看到这种情况我的胸口一阵气闷，感到一种深深的忧虑：中国的投资者真是赔多赚少，中国的传统理念又是干什么都亲力亲为，长此以往将会有许多投资者因效益不佳，付出的比获

利的多，从而造成市场信心危机。对这些人失败的根源我想多讲也没用，现在关键是要他们果断斩仓，跳出来看市场，于是我的回答也就很干脆：“每种股票填低 0.50 元抛出，坚决斩仓！”

我这样说完以后，全场寂静，大概被我这种“豁出去”的气概镇住了，继而，爆发出噼噼叭叭的掌声。听到这掌声我几乎要流泪，这是怎么样的中国股民？怎么样的中国人啊！在两天中亏损已达 15% 的此刻，还能以这种大无畏的斩仓精神面对现实，面对自己，是多么的可敬啊！这使我把刚才一闪而过的怜悯之心变成一种敬畏之情，正是这些朴实无华的“股民”造就了我们共和国证券市场的大厦，他们用自己的钢筋铁骨支撑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在那次讲座上，我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回答每个投资者的问题，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钟。许多四川人拥上台来和我握手，用川腔反复叮咛：你以后可要多来成都，多来四川哟！

我连连点头，一口答应，我觉得与我相处的这些投资者，他们火辣辣的脾气正中我怀。

事后，四川当地的报纸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次演讲，题目是《安妮讲座的轰动效应》。

依我所言，第二天填低 0.50 元抛出股票的那位“可怜的投资家”，给我们打来了热情洋溢的电话，表示感谢。我对他说：“你都亏了，还谢我干吗？”那人在遥远的地方说：“你真心真意对待我，我真心真意感谢你！”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在电话中，四川的投资者很气愤地告诉我，有些股评家来说深圳市场要涨到 360 点，所以他们在 220 点买了股票，没想到我一来就说要跌到 160 点。他们不明白，都是深圳的股评家，差距怎么这么大？

我告诉他们：“并不是我与他们不同，他们来的时候是大牛市，股市正涨；我来的时候股市急跌；股评家总是涨时看涨，跌时看跌；如果哪个股评家在急涨转急跌时看不准，那你就自然倒霉。你们难受，他心里更难受呢！”由此看来，股评家这个行当是不好干的。1992、1993 年的时候在 30 种职业中它排在最受欢迎的前七位，1997、1998 年做民意测验时它则排在最不受欢迎的后七位，这足以说明问题了。尽管如此，股评家还是大量产生，因为市场还需要。

长期在股市上浸泡，无股一身轻的体会太美好、太强烈了。因为这样的日子又太稀有，弥足珍贵。一般而言，做股票的总不至于空仓，1994 年这样彻底平仓出场是要下很大决心的。有一位经济学家讲过：炒股的最高境界是“胸中有股，手中无股；手中有股，胸中无股”。做到这点很难，几乎是“股圣”，我还远远到不了那种境界。我认为，炒股的最高境界是拿着钱久久等待更好的股票出现，无论是熊市还是牛市。这样，你买卖的次数也许很少，但效率就很高，命中率也就有了把握。为什么我们老是不能空仓？就因为射击的次数太频密！

带着这种等待的心情，我们游了杜甫的草堂，青城山的索道，都江堰的大堤以及香火缭绕的大禹庙。

悠悠青山无声地存在，滔滔江水有声地流淌，面对诸葛亮隆中古迹，缅怀蜀都刘关张旧事，我仰天长叹：如果诸葛亮能识时务，顺潮流，何致于耗尽心智，动用军备，辛劳百姓，最后却落得个一败涂地？顺势者安逸，逆势者徒劳，历史的辩证法向来无情。

当场我们为这个万人景仰的军师下个结论：如果让他老人家炒股票必输无疑！

曹操虽为奸雄，但他顺应民族统一之大势终成霸业，一统江山。个人的道德品行也许只有放在历史大潮的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

国庆过后，股市正如我们预料“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三天内跌幅超过 27%，短短几天已到达我们所看的 160 点位置，在这一位置上我们重兵杀入，当天买入当天卖出，获利在 30% 以上。这一仗打得十分酣畅。

这一天抄底的投资者不少，一位股评界有名的“老法师”也在此点位抄了进去，但他没有平仓，两三天之后便已严重套牢。几天后，指数已下探到 140 点位置。

当时，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出？他叹一口气说了实话：就怪我的消息太灵通了！我打电话到北京了解到老人家健康没有问题，国庆节还在北京看焰火呢，于是我重仓加透支买入，心想等这消息公布股市肯定得强劲反弹，重上 200 点是时间问题。没想到——唉！

他用沉重的叹息结束了自己的话，消息灵通的人反被消息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误，这在股市上是经常发生的，我也挨过这样的棍子，消息时时有，关键是如何判断，判断之后你又赚了或赔了多少钱？

对三大利好刺激浪的判断使许多人犯了错误，错就错在对宏观面的把握不透，从深沪股市的这波行情力度上评判够得上是“反转”，但宏观面并未形成“反转”，其结果还是要拖累大势下行。市场分析人士包括券商当时都比较热衷于技术面，喜欢一味数浪，按照严格的波浪理论深圳确实还有三浪可起，但是行情不是数浪数出来的，它是有许多方面的因素酝酿组合而成，对宏观面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人们对它还是十分陌生，但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宏观面的分析是重中之重。

判断正确之后果断采取措施也很重要，有些人觉得大势不妙，但并未坚决离场，或者离场之后过早地杀回马枪，被二次套牢，心态就很不正常，结果屡抄屡败，屡抄屡亏。

在那波行情中许多人赚了钱，许多人又吐了回去，烂手烂脚的遍地都是，但是从1994年这一役中确实也有许多人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卖比买更重要，会买更要会卖。

这种“见利就跑”的信条久而久之在深沪股市形成了一种作风，以这种作风炒股的人把自己喻为“快枪手”，而且十分依赖T+0的交易方式。等到1995年1月1日，管理层取消了T+0交易方式之后，市场迎来了一轮更大的跌风。部分短枪手也只好含恨离场。庆幸的是，不久，他们又找到了比T+0更过瘾的交易方式——国债期货。

十三、操作室的诞生

在熊市中挣扎，许多投资者都向我们抱怨亏损沉重，不光无法捞回本钱，后面追加进去的钱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在当时的势道中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洗手上岸，坚决不干。无奈在深圳已有许多人成为“职业炒家”，你叫他罢手是不可能的，如果不炒股他们会每天在牌桌上赌大小，与其如此还不如练些短线技巧，以便在下跌市道中捡回一些蝇头小利。

券商此时的处境也很为难，客户少，成交量低，虽然一再裁员，但依然人不敷出。我原来开过咨询窗口的那家券商找到我，希望进一步合作。我在建信证券曾经开过一个短线技巧培训班，效果挺好，但大家没有机会一同实战总是感到遗憾。一些学员也常提出这一要求，希望可以聚在一起操盘，以便取长补短。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我把这一想法和盘托出，立即得到证券公司的同意，并着手开办中国第一家“短线培训实战操作室”，地点设在建设路中银大厦。中行证券为我们租下半层楼面，这儿的房租当时是深圳最贵的，能否开办顺利至少把成本拿回来，我和券商手里都捏着一把汗。“万事开头难”，我想只要全力以赴地去做，是应该可以成功的！

我们仅在报纸登了两次小小的广告，同时在声询电话中播放同一内容，结果报名者之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接待了整整一周才告一段落，然后根据客户的情况分门别类删去一些资金太少、路途太远，心态过于脆弱的，留下三十多人。这一操作室成立的日期为1994年10月。当时券商尚未着手大规模的研究咨询工作，全国仅有的几家咨询公司其业务也停留在传真及声询电话方面，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地辅导和培训客户的，在深圳也是首创。

当时，深沪两地指数十分低迷，到1995年1月1日起取消T+0交易，市场机会确实不多。此时，我们大胆地提出一个口号：风暴的中心是安全的。而这中心是基金及权证两大孤岛。

当时的深圳市场各大机构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依靠自营赚取手续费，由于基金及权证都不缴税，手续费相应低廉，往往一分钱便能打平，基金和权证成为大家“埋地雷”和“吊篮头”最好的目标。

早晨，我们和客户一起在买盘上埋一个低价地雷，同时又

操作室的诞生 ⑤

在卖盘上挂一个高价篮头，下跌时“地雷”炸了，上升时“篮头”中了，一天下来差价三四分，如果买十万股、二十万股就有 3000 到 6000 元的收入，我们把这称为“给自己发工资”。时间一长，基金和权证居然成了“热门品种”，成交量一直居于各板块前列。而我们操作室的成交量常常占深圳市场的 1% 以上。

1995 年 1 月 1 日后，短期权证得到“优待”，仍可进行 T + 0 交易，结果更加火爆，柳工权证从 0.40 元炒到 0.80 元，涨幅达一倍，厦海发也是连连发威，有时一天的成交量就达一千多万。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学员多少都有收获，特别是一家机构派来的三个年轻人，一百万的资金炒到 180 万，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使他们的老总大吃一惊。但是，客观地说，年轻的投资者做短线得心应手，年老的投资者就力不从心，成绩很不理想。

由此我们想到，也不能让所有的学员在基金与权证中兜圈，还是应该找到一两支较好的股票以便大家长线持有。

在学员中有位姑娘是常州人，她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及苏常柴，并说这家上市公司 1994 年开始业绩会翻番。我很重视这个女孩子说的话，一边让她回家继续调查，一边把材料找出来翻阅，发现果然不差。于是，我和我们的一些客户买进了这支苏常柴。这女孩买得最低，价格为 3.45 元，虽然她持有到七元左右就抛了，但在当时的熊市有如此一倍的涨幅已十分令人满足。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在这个培训班上我们干得十分辛苦，每天中午 12:00 到 1:00 解盘，下午 3:00 到 4:00 大家探讨一天操作的得失。一天两天还可以，但我们整整坚持了三个月左右，直到临近春节大家无心操作，都准备打道回府才结束。在这个操作室里我们几乎使出浑身解数，手把手地教学员操盘，但效果是否最好呢？

我认为并不是最好的。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

如果让不会操盘的学员过于依赖，过于盲从，久而久之会消磨他们的自信，不能从根子上培养人才。

我们总结了这一段经验教训之后，便采取新的教学方法，扶他们一段，上路之后基本上放开手，让他们自己去操作。开始大家积极性很高，想一比高低；过一段便发现许多人亏损增加，信心丧失。问题出在哪里？

操作室确实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儿，你面对的是几十个性格、年龄、爱好、知识层次不同的学员，怎么样让他们成材看来还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这样我们只能增加个别辅导，个别谈心，分别开小灶，这段时间我感到非常吃力，好像带着几十个水平不一的人在跑步，常常有人掉队，有人喊救命，我不得不停下步子来搀扶他。我当初碰到的这些问题想必现在开操作室的客户经理全会上遇上，经纪人确实不好当！

恰好，从 1995 年年初起国债期货节节上升，不久推出国债期货，上海市场的交易非常火爆，这一情形影响了深圳，深

圳的国债期货市场也终于启动了。

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市场情况，认为国债期货大有可为，可惜该证券部尚未开通，我们只能用电话报盘在其它席位操作。

这时，有些学员开始有意见，认为我们甩下他们不管了，只愿炒国债，不愿炒股票，自己闷头发财去了。

我向他们解释：由于国债期货的火爆，股市更会走下坡路，我们必须探索新的路子，否则会跟不上市场。

等我们把国债期货的操作大致摸清，并找对方向做多之后，负责操盘的陈宁跟我商量：这些学员一下子进入国债期货，心态必定受不了，但只炒股票不炒国债，1995年的利润哪儿来？

学员中年纪较大的李经理听到我们的议论走过来建议：安老师，你们不如把我们的钱集中起来操作，让我们在后面看，等搞明白了我们自己干！

李经理是位退休老干部，对我们的事业很支持，输了他从来不责怪，总是说：谁是圣人哪？但赢了钱他就高兴得像孩子似的，逢人便夸，他一心一意帮我们把这个培训班办好，同时也很认真地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增加一点股票知识，等于上老年大学。

他的建议获得大家一致同意，机构操盘手也准备把钱拿出来，一起观摩演习。这下，我和陈宁犯了难：这恐怕不合适吧？亏了怎么办？再说，二三十个人在后面旁观我们怎么操盘？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另一位学员赵叔在旁边说：放心！你们操盘我们不吱声，盈亏我们自己承担！

看到大家这样迫切和信任，我终于答应每人出 10000 元，我们自己也各放 10000 元做本钱，盈利照分，我们不提成；亏损不赔，各人自承担；这个小基金等大家学会便散伙！

说干就干，当时我记得一共凑了 20 万元左右，赵叔为了表示对小基金的信心，出了双份，然后大家就开始坐在陈宁身后“欣赏”。

国债期货瞬息万变，当时每一手仅取 5% 保证金，做错方向两块钱价位便打爆（指把本钱亏掉），风险是极大的。由于深圳市场窄小，振幅很大，上海方面有大资金介入，多空严重对立，常常会出现往下几个跌停板，反弹以后又几个涨停板。学员投入的 10000 元随时可能化为乌有。

安妮投资顾问群的成功看见陈宁在这种阵势下操盘，连连摇头：这怎么行？使不得、使不得！

陈宁悠悠地抽着烟，弹弹烟灰：为了同志们，我只能学黄继光炸碉堡——挺身而出啦！

学员们倒是很配合，陈宁操盘的时候大家一声不吭，在他身后站成一圈，只到万不得已之时才轻轻问一句：陈老师，怎么还不平仓呀？

陈宁俏皮地说：我的短线已够短了，一天打两个来回，你们这么着急平仓，想做超短线，一分钟一买一卖跑一趟是不是？

操作室的诞生 ②

其实，那时候的国债期货市场上确实有一分钟跑几个来回的，因为期货可以 T+0，许多股票上的短线高手都到这来练场子，成交量也就特别大，但他们赚到手的利润极少，倒成了期货风险的承担者。

这样干了几天，学员们一个个都成了“乌眼鸡”，陈宁更成了“乌眼鸡”的“鸡头”，我觉得这么干下去大家的神经都要崩断了，再看一看账面，每人 10000 元已赢了七八千，大家这几天看短线操作也有了不少体会，大体上已知道七七八八，尤其是对 KDJ 线和 RSI 揣摩比以前明确多了，便和李经理商量鸣金锣兵，把钱还大家。

当学员们拿到分来的本金及利润时都恋恋不舍地说：国债期货这样能赚钱，陈老师帮我们干下去好不好？！

陈宁连连摇头：太累！太累！你们都站在我身后，你们不紧张，我还挺紧张呢。咱们还是见好就收，回去大家多多操练吧。

在操作室的日子，所有的学员和我们几乎都成为好朋友，大家无事不谈，无话不说，成为朝夕相处的亲人。

我非常感谢当我在工作中，在生活上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时这些朋友给我的关怀和支持。有一次我碰到一件倒霉事，赵叔对我说：你遇到不称心不如意的事，就把它当作一块石头，搬掉它，忘掉它就是了。陈姐人在路上来不及下单，电话委托我替她操作，慌乱中我把“买入”打成“卖出”，使她白白亏损了 50000 元钱，她知道后没事一样地说：我不是也会打错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吗？说什么也不让我赔。

还有一位搞音乐的吴老师，每逢卡拉 OK 总要高唱流行歌曲《安妮》当场赠送给我。吴老师为人幽默，感情丰富，常常使我不知如何感谢。

过年的时候，证券部请我们和这些学员一起聚餐，四桌人一起举杯共贺我们艰苦跋涉，度过与熊市顽强拼搏的这几个月。学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安老师，你走到哪，我们打到哪！我们一定会等到大牛市来临的！

听到这句话，我强忍着的眼泪再也憋不住了！

我并不是一位很称职的老师，怎么样使这些学员走上股市致富之路也在摸索，我也明白他们的成功率并不很高，因为有许多局限使这一行当的成功十分艰难，再加上我们在下跌市道中，但是我还是被他们的真诚和信任打动，一仰脖子喝下了一杯白酒。这在我一生中几乎都是难得的，——我的父亲病危临终前曾嘱咐我：孩子，你不能喝酒，尤其不能喝白酒，你的肝脏在幼儿园时就生过病。你要记住父亲这句话。

我父母都是医生，我一辈子都恪守这一“医嘱”，但这次是例外。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和我的学员们并没有等到大牛市就分手了，原因是证券部后来搬了家，我转移到其它证券部重新开设第二家操作室，这家操作室被命名为“国债期货操作室”。

这家操作室的开张迎来了一批年轻人，它与第一家操作室

的人员构成是截然不同的，更年轻，富有朝气，敢于冒险。与其说我带领他们前进，不如说我与他们一同成长。

由于报名的起点金额为五十万，我记忆最清楚的是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留着分头穿着波鞋来到我这里。当时他的资金仅四十五万，我们不能录取。他为难地挠着头皮，一言不发地走了。

第二天他来到我这里，很兴奋地说：“安老师，我的保证金够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设法借了50000元凑足了五十万。

他是我国债期货学习班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学员，由于他留着一头黑黑的长发，我们都叫他“发仔”。当然也是“发财”的谐音。

当我问到他有炒过股票的时候，他点点头，谦虚地说：“炒得不好，现在想来重头学起，跟你们学做国债期货。”

一个不满二十的小青年怎么会来炒股票的呢？

他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他初中毕业的时候积聚了1000元压岁钱，他妈问他要买什么？他当时一心想买一双耐克牌的波鞋。他妈说：“如果你不买波鞋，单位里深发展的原始股可以买100股，好不好？”他当然不知道什么叫股票，只知道摇头。岂知这一摇头摇掉了40万，因为通过分红送股当时的深发展到1995年已上升了400倍！这一教训深深地烙在少年心头，于是变成他高中毕业后的实际行动。发仔就是抱着这样一股热情来到我们开办的国债期货操作室。

十四、火爆的国债期货

为了推动国债现券发行，从1993年10月25日起，上交所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开始，对此有认识的人极少，行情波动如死水一潭。1994年10月以后，央行提高三年期以上的储蓄存款利率，并且恢复了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享受保值贴补，以应付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那些月份每月的通货膨胀数字都扶摇直上，甚至高达18%以上。保值贴补率也水涨船高，节节高升，最高时到达20%以上，为炒作国债期货开拓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先知先觉，由股市涌入债市，个人专业炒家尾随而入，国债期货行情火爆，成交额屡创新高，每推出一个品种就成为一根导火线，使市场规模急剧扩大。

这时的安妮投资顾问群是第一个在深圳举办国债期货知识

讲座的团体，顾问群内的两员大将孙志伟和成功都在 1994 年底进入这一市场，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操作经验，讲起课来头头是道，有根有据，我们的讲座也就应接不暇。

当时孙志伟有一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投资者的心：如果你没有买到深发展、豫园商城这样的原始股，那么国债期货品种就是最好的原始股！现在做多，利润翻几番！有一次，在黑龙江证券部讲课，当场有二十八人开了国债期货户头，令证券部始料未及。

我们判断通货膨胀在 1993 年抬头，1994 年横行，1995 年正是其猖獗期，远远未达到调控目标，所以银行不断加息的可能性较大，储蓄贴补率也会因之上浮，那么国债期货各大品种只有开多仓才能赚钱。什么时候通胀被压抑，什么时候物价下滑，什么时候银行减息，那时才可以做空。

在大的问题上我们投资顾问群的看法总是惊人的一致，这次在国债期货上又是如此。所以 1994 年 10 月份在股票市场杀出之后，孙志伟和成功在国债期货市场上挖到了第二桶金，陈宁和我在 1995 年初加入，操盘中也找到了新的感觉。

当时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开辟《安妮看盘》的专栏，由于文章观点坚决看多，被人称为国债期货市场上最“牛”的市场分析人士之一。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根本不应该开设国债期货市场，有害无利。我想，这已不是市场分析人士争论的范围，“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我们的任务只是按照游戏规则去赢取利润，而且这是一种崭新的尝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试。

记得有一次，我去某证券部做国债期货的讲座，有一名大户听了我们做多的论述后站起来大声反驳：我专门去老家调查，近期米价已经不涨了，油价还下跌，你们还去说通货膨胀，这是不对的！现在应该做空，坚决做空！

我很赞赏这位投资者实地调查的作风，但我还是向他分析：“你看到的只是局部的现象和数据，我们要看的是全国的消费和物价指数，切不可一叶障目。”

这位投资者很倔，他认为自己没错，坚决做空，后来亏损了五十万，再后来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又成了我们的客户。

当时，327 国债期货品种是上海交易所成交量最大的品种，也是多空双方分歧对立的焦点。对于这只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众说纷纭，报纸上登出了连篇累牍的争论文章，还受到保值贴补率和是否加息的影响，价格前景扑朔迷离。

全国的多头和空头均在 148 元附近建立大仓，准备生死一搏。多头主力为中国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空方主力为上海万国证券（简称万国），一批中小散户出于对万国的崇拜尾随其后。

1995 年 2 月 23 日，空方万国证券为了挽救自己不被打爆的命运，在收市前 8 分钟内抛出 1056 万口卖单，这一数字相当于 327 国债发行量的三倍多，万国实际上根本无法拿现货交割。同时，万国在上交所也没有这么多的保证金，只有恶意打压市场。巨大的卖单将 327 国债期货从 150.30 元打压到

147.50 元，万国证券孤注一掷来减少巨大的空头头寸损失，被中国证监会定性为：蓄意严重违规。

第二天，上交所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最后 8 分钟交易无效，从 2 月 27 日开始休市，组织协议平仓，并宣布 327 国债期货这一品种退出市场。万国证券的老总，证券界的风云人物管金生锒铛入狱，接受审查。

327 国债期货对投资者的心理打击应该不小，但是随着市场不断推出新品种，又有新的资金不断加盟，许多人又将 327 的教训置于脑后。

在 327 之后，上交所又推出 319 品种，这一品种开市后震幅之大为市场罕见：一开盘连续出现八个涨停板，在下午收市前又连续出现七个跌停板，把保证金不够的客户打得哇哇乱叫。所以我们在国债期货市场上有一条资金原则：至多只进场 50%，还留 50% 备用，雷打不动。

国债期货市场的利润虽然看起来十分丰厚，但应了中国一句老话：本小利大利不大，本大利小利不小。理性一点的投资 者谁也不会拿出所有的身家去期货市场一搏，至多只拿资金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样赢多了开心，输多了不操心。有的投资者偏偏不服这个理，常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押上去。听说上海有个靠邮票发家的大户把自己辛辛苦苦在邮市、股市上赚来的五千万全放到国债期货市场上打滚，结果方向做错，一输到底。一夜之间，全部打穿，他一下子想不通自杀了事。事实上，这个大户如果不寻短见的话，家中还有两百万压箱底的

◎ 安妮投资生涯路

钱，何不用它生存下去，慢慢翻本？可是这老兄一下子便走了绝路，问题出在资金管理不当。

在深圳炒国债期货，一个最辉煌的例子是大鹏证券的某大户，从3000元起家一路做多，炒到数千万元。香港报纸还专门做了报道，把他封为“大赢家”。其实像这类赢家在深圳并不少，当时的L证券以炒国债期货出名，是著名的“牛棚”。“牛棚”里出来的人都很骄傲，因为大家做多全赚了钱，在那里的大户室你有一百万都进不去，算“小弟弟”。

但是，“牛棚”里出来的人也有非常谨慎谦虚的，有位在国债期货上赚了几千万的章大户经常找我们探讨行情，他的神经永远绷得很紧，虽然一路持仓，所增利润继续加仓，但他随时窥测方向，准备一走了之。用他的话来讲：每日持仓抱着这几千万筹码睡觉，没有承受能力根本睡不着。

我能体会他的压力，在国债期货如此激烈的波动中他能持仓几个月以上，确实有非凡的毅力和耐心。所谓：每个人成功都有他的道理。章先生的毅力并非来自愚勇，他对宏观面的分析可以说是条分缕析，十分有说服力。一个国债期货市场已把许多人变成了经济专业人士。

在国债期货最火爆的五月份，管理层推出种种措施降温，如提高保证金，增加手续费，涨跌幅限制，持仓量通报等等。从政策导向上我们都感到气氛不对，便与章先生商量逐步平仓，用在国债期货上赚来的钱买入低价股票。

恰在此时，深圳中经信证券部邀请我们投资顾问群做国债

期货的讲座。当时，我们已感到市场可能会转向，投资者应该采取应对措施。

在这次讲座上，我们预测了五种转向的形式，从技术图形上、盘口上、资金面上、平仓日期上、交割方式上作出种种考虑，认为有可能对多头不利，但也客观地指出：市场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依然是顽强向上的。

会后，我们投资顾问群留下来碰头商议，准备由我执笔写一篇《国债期货转向的五个形态》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大家畅所欲言，人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应该未雨绸缪了。

回到家里我赶写这篇文章，成竹在胸，几乎一挥而就。什么都想到了。不过，我偏偏没想到，国债期货转向的方式是：停止交易！

5月18日，鉴于我国开放国债期货市场的条件尚未成熟，国务院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

好在我们在5月17日前一直是且战且退，现在突然关闭交易，我们的仓位仅以前的十分之一，我们那个操作室的学员也大部分已平仓，夹住尾巴的只有一小部分。

还是发仔机灵，在协议平仓挂牌交易的第一天，他就把剩余的仓位放在跌停板的位置上全卖了出去。相比之下，我还没他手快，但最后也算平仓出局。这一单亏损达30%，但资金大头已安然撤退了。

在平仓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极有意思的事。孙志伟先生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代表证券部的多头到上海去找空头平仓，不仅空头“物以稀为贵”，而且多头均“饥不择食”，开出很低的价码愿意屈就，结果上海的平仓价格对多头十分不利，亏损高达 50% 以上。许多多头满腹牢骚：做对了方向反而赔大钱，这种事说起来都没人相信！

现在，多头应该相信了：政府干预在全球各大市场都很普遍，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更是可见一斑。

章先生听了我们的话，大部分仓位已出局。但是他筹码太多，还有一小部分的“尾巴”被夹住了，这一小尾巴足以使他回吐利润 300 万。他所在的 L 证券部是国债期货多头最集中的地方，几百个多头大户被关在里面，未想到平仓。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国债期货的风险。掐指一算，以前成千上万的利润如按上海协议价平仓，恐怕全吐回去还不够。

一气之下，他们便租了豪华大巴浩浩荡荡开到市政府，要求市领导接见。深圳市府领导十分注重这件事，以前处理“8·10”事件也有了经验，深交所接连派老总出面做工作。为了稳定市场，稳定情绪，深交所推出了多空双方的协议平仓价，其宗旨是：多头少赚点，空头少亏点，总算熄灭了这场风波。

我们操作室的学员全都获利了结，检阅成绩做得最好的是位大学教授。当时他每周要上课，偶尔来一下证券部，开了仓就放心回去教学，10%—20% 的波动也并不理会，直到国债期货交易关闭前我们通知他来平仓，他便老老实实在地平仓出局，

火爆的国债期货 ②

虽然区区不多仅几万元钱，但两三周内便翻了一番，教授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理解了，这证券市场为什么人满为患？一个月的收入都超过我当教授一年的工资！以后国债期货恢复交易，请千万通知我。”

还有一位小伙子阿前也做得不错，他牢记我们所言，国债期货要做多，逢价格下跌时倒头便睡，每回醒来睡眼惺忪地问一下：涨了吗？并嘱咐同伴不到涨停板，不要叫醒他。所以，只要阿前目光炯炯地坐到电脑前，行情肯定大涨。

小伙子刚从澳大利亚打工回来，看到国内的钱这么好赚，说：早知这样根本就不用出国，祖国太可爱了！

“是啊，如果在中国赚不到钱，你到哪儿去也白搭。”操作室里的人一致认为。这更坚定了阿前在证券市场长期扎根的信心，他母亲看到孩子这么有出息，一下子拿出二十万私房钱追加投资。

众多学员中惟有许小姐性子太急，受不了价位波动，今天做多，明天做空，常常跟自己过不去，好在她有一个体贴的老公，亏了不吭声，赚了直夸奖。许小姐有时一天在几个不同的品种上分别又开空仓，又开多仓，既不是套期保值又不像跨市场操作，而且她的仓位从来不过夜，不过，最终她也没有亏。因为，歪打正着，她在最后的几天开了不少空仓，多仓亏损平掉后，这些空仓让她赚了三个涨停板，赚得她眉开眼笑，不知如何是好。更令她得意的是：证券部里空仓户绝无仅有，所有的多头都拉她私下平仓，今天这个请喝茶，明天那个请吃饭，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忙得她成了大红人，不亦乐乎。

这下，轮到她神气了，逢人便说：国债期货为什么关掉？太不公平了，再开下去，我准能赚大钱！

没错，因为中国经济最后还是“软着陆”了，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

十五、期货市场大练兵

国债期货在 1995 年 5 月 18 日戛然而止，搞得一大帮专业人士和职业投资家无所适从，但是眼明手快者立即在股票上打主意，尤其是在期货市场平仓出场的投资者这次十分主动，有的早已在低位买入超值的股票。

5 月 18 日国务院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的当天，深沪两地股市跳高开盘，三天之内沪指指数上升 59%，深股指数上升 42%，许多套牢者拍手欢笑，觉得老天爷很公平；低位抄底者双手拥护，认为政策的转向又给了他们赚大钱的机会。只有在国债期货上尚未协议平仓的户头才心急如焚，看着一波股票行情白白远逝。

我们的资金 90% 在外面，所以在“5·18”公布消息的当天毅然入场，《安妮传真》再次增发号外，在早晨九点钟前传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到客户手中，这一次推荐的均是上海小盘股：亚通、凌桥、上菱以及梅雁。开盘后这些股票一路上冲，我打电话祝贺孙志伟不失时机又立一功，发号外的主意就是他出的。在这样的時候，最理性的投资者也无法安坐家中，何不潇洒“疯一回”。

由于行情走得过快，我们安妮投资顾问群再一次对行情进行研讨：国务院暂停国债期货交易是为了抑制过度投机，但没想到市场像跷跷板一样，这边才熄火，那边的投机之风又煽了起来。股市的急涨急跌包含着某种“因祸得福”的盲目兴奋，按照当时管理层压制通货膨胀，收缩银根的政策，国有资金坚决不能流入股市及期市，过急的升幅一是技术面跟不上，另外政策角度干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心中的警钟已经敲响。

股市大升三天之后，我们号召客户一起平仓，这一波行情大家做了一个“短平快”，平均有 30% 以上的利润，在 5 月 29 日基本清仓出场，当天下午我们离场之后，尾市指数上翘，以最高点收市。有部分投资者心痒难忍，又再度杀了进去，沾沾自喜的晚上便听到了新闻广播。

各大媒介刊登出国务院证券委召开第五次会议的新闻：一是宣告抑制过度投机，加大监管力度；二是出台 1995 年新股上市计划。消息公布后，两地指数一下子跌落近 20%，大额游资毫不犹豫地退出股市，在场外虎视眈眈持币观望。

过早庆幸自己解套又未采取行动的投资者发现自己仍是“套中人”，29 号尾市抢反弹的投资者发现自己主动“买套”。总之，人们议论纷纷，被这几天的急涨急跌刺激得惊魂不定。

既然已从股市上出来，我们的心态变得较为平和，该赚的已赚到了，股市上已没什么可留恋的。在1995年5月31日的专栏中我写道：弱市不抢反弹，下围棋必须“舍小就大”，做股票更须“大处着手”，其中的道理如出一辙。

然而，巨大的游资总要寻找出路。早在1993年5月28日郑州商品交易所就开设绿豆期货交易，开始只有一些供销社、用货单位、仓库以此作为套期保值的工具进行小量交易。1995年初国债期货火爆之后，许多人对期货市场开始入门，并注意到这一商品期货市场的盈利机会，我们也是其中之一。

打开绿豆期货的历史图表有过几次很大的起伏：最显著的是1993年的6月份由39200元一张急跌到1993年8月份的25000元的水平，空仓利润惊人；而后，又于8月份的25000元急冲至39991元，多头赚的是盘盈钵满。1994年9月份郑州绿豆从29780元一路下行，至1995年2月到达23000元左右，日K线图上差不多出现了连续9个跌停板，我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觉得有利可图，立刻去深圳中包期货开户，反射时冲了进去。当时的点位记得是24800元，由于是生手，开户资金仅五万，实际上仓位很轻。

但就是这么轻的仓位也被折磨得不轻松，我接货做多之后，绿豆二次探底，再度到达24380元，经纪人要求我增加保证金，加倍开仓。这一建议现在看来是对的，但是他在我没答复之前就贸然在24500元处开了仓单，使我认为很不可靠，并且差价也太少。一气之下我去中包平仓撤户，这一方向做对的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买单非但没让我赚大钱，反而还让我亏了 2000 元手续费。说到底还是心态太脆弱了，绿豆不久便一路扬升，一直走到 1996 年 5 月份的 49780 元。

从此以后，我们决心去期货市场自己下单，决不请人代劳。并非不相信别人，而是觉得既然付了学费，那就非要把本事学到手不可。

国债期货关闭后我们重新去深圳中期公司开户，安妮投资顾问群的大毅在那儿当投资顾问，捎带帮我们盯盘。

在这里我们结识了一批市场精英分子，有做外盘的浙江人，也有专做香港恒指的深圳人，更有许多在国债期货上赚了大钱仍滞留在中期闷头乱炒的个人及机构大户。

每个人操盘都有自己的套路。那位浙江人每年做几次外盘总能稳稳赚钱，而且他的目标大都是美国芝加哥的粮油棉品种，用他的话讲，这些品种有季节性，打开它的万代图就能找到规律。这家伙白天睡觉，晚上十二点后起来上班，精神抖擞，年复一年，居然能稳稳当当地在老外手里赚钱，大家很佩服他。

在他的启发下，我们专攻美国大豆。

美国大豆的万代图极有意思，每到收获的秋季，价格便一路下滑，但是每年的夏季，尤其是七八月份总有一次高点让你捕捉。如遇到水灾、旱灾表现各异，价格波动也极大。1995 年的夏季，美国产豆区遇到水灾，这对于大豆的价格来讲是一次很好的机会。那段时间，我们每天注意美国的天气预报，仿

期货市场大练兵 ①

佛就生活在西半球。在多次讨论确定无误之后，我们在一个相对低点抄了进去，这张多头单的数字不小，在深圳中期也算得上大单，许多人都注意着它的命运。

由于美盘开市均在深夜，下单之后，我们干脆不再理会，让大毅第二天上午给我们报一个价位就行了，外面还有一半资金等待，随时补仓。一个多月之后，美国大豆果然狂涨，临近秋季我们将它平仓出场，这一单我们赚了 50%，而且全是美金！（如果不平仓继续等待，最多利润可达 200%）

旗开得胜之后，我们开始介入国内的商品期货，当时选择的第一个品种是海南棕榈油。说实在的，以前对棕榈油的使用价值一无所知，这回为了做它的期货把棕榈油的各类知识“普及”了一下，也好。

1995 年夏季的棕榈油由于国际市场供大于求，价格接连下跌，已有十三个跌停板，中期公司所有的客户和经纪人都认为“抄底”的历史时机到了！无论是传真件还是喇叭里都在鼓励大家大胆入场。

这一天，我很准时去中期上班。刚一开盘，许多客户包括我便将买单递了进去，众人拾柴火焰高，买气极浓，棕榈油的价格来不及下跌便封在了涨停板上。第一天买进就获得一个涨停板，这滋味甭提多美了。我一看盘面封的很死，心里稳稳当当，拎着包不等收盘就离开了交易所，这天我们开了 100 张多仓。

那时的海南期货每天只开盘两小时，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十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一点，所以做期货虽说紧张，但紧张的时间不长，等候的时间都太长。

等我回到家里，大毅在那边打电话过来：棕榈油的涨停板打开了，问我要不要追加？

我当时觉得苗头不对，十三个跌停板，刚一个涨停板怎么就打开了呢？难道跌势未尽？我对着电话说：不要加仓，再看看情况吧。

阿宁在一旁插嘴：我看要平仓！至少平掉 50 张。

我略加思索，同意他这个观点，吩咐大毅：先平掉 50 张再说。

大毅填了单就送窗口，因为要排队，不久就告诉我时间来不及，马上要收盘了。

我一看确实只有几分钟，报单输单全是手工，已经木已成舟。

第二天，海南棕榈油开盘几分钟再次跌停，以后的日子跌跌爬爬，再无上升。

我们和中期的许多客户都因做多面临亏损，有些客户是全额杀人，我们好在外面保证金很充裕，便让它继续飘单。有时我也去中期看一下，那些大户不服气，说要联手做多干预市场，问我参加不参加？我连连摇头，市场的趋势一旦形成，只有顺势而为，万不可逆市而动，我们何必不自量力呢？

据说那些大户已不断买多，但越买越亏，棕榈油走出了顽强的下跌行情，因为大家只注意技术上超卖，都忽视了基本面

上的一个因素：由于走私猖獗，国内棕榈油受到马来西亚油价的大幅冲击，一时很难恢复元气。

陈宁见到这一局面，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提出：主动解套，挽救颓势。

他每天按时到中期上班，干了整整一个多礼拜，每逢棕榈油价格反弹便坚决做空，这样积小胜为大胜，减少了不少亏损，最后等到一次较大的反弹。早晨因流传马来西亚油价上涨，出现短暂的涨停板，因这消息不确定，陈宁立即决定平仓。他“咚”地一声站起来叫大毅赶快奔到窗口下单，大毅像一颗上膛的子弹冲出去，跑得太快把电话线都扯断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原来的仓单全部平仓，大毅回来直叫道：“可惜，可惜，明天可能还会涨停板！”我们已不考虑这些，只强调资金的安全。第二天价格迅速滑落，当天即告跌停板。这一漂亮的“双飞燕”一时在中期传为美谈。因为棕榈油获胜出局的非常少，平仓时我们的盈利达到100%，然而手续费很昂贵，折去68%，纯利仅32%，但已使很多人感到诧异了。我们平仓之后半年，棕榈油的价格仍然迟迟未涨……

平仓出局后，大毅闲聊中问陈宁感觉如何？陈宁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我的感觉不是胜利出场，而是捡了一条命逃跑，看来这国内期货真的不好玩！

做国内期货的感觉就像在黑箱子捉迷藏，而且你永远不是那个雄赳赳的黑猫警长，你始终只是躲在风箱里的耗子，处处被人捉弄。每个期货交易所的规则频繁改变也叫人无所适从，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常常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关键看交易所站在多空哪一方。

在国内期货市场上出来，我们还玩过几次恒生指数。指数毕竟不是股票，玩香港股票可以“隔山打牛”，但玩恒生指数最好要在香港，尤其在盘整市道，走势飘忽，难以下手。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恒生指数容易被机构操纵，可能一两年才有一次趋势改变的大机会，不宜沾手。

中期公司也有一家机构恒生指数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前往切磋取经。这位机构操盘手三十出头，沉着机敏，下面有好几位大学生，帮忙记录数据，做 OX 圈，盯美国纽约股市，因为香港股受美股的影响很大，必须盯盘至深夜。几个人轮流值班，晚上就睡在中期的操作室内，俨然文革中的战斗队，每个人眼中都布满血丝，脸色疲惫。

即使是这样的勤勉与敬业，该负责人认为炒恒指基本上像走钢丝，走得好赚钱，走不好赔本。若干年后我再到中期，那儿的经纪人告诉我这家机构最终还是以亏损收场。

谈到这些，谁都不免黯然神伤，但令人振奋的是期货市场上那些年轻的经纪人，永远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欲望，有一股不把客户抓到手誓不罢休的劲儿。

我在操作室里经常会接到一些经纪人的电话，约我去吃饭、去聊天，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在上海的期货经纪人。凭着一面之交，他不断地给我作投资建议书，不断地打长途电话，有一次还从上海飞过来邀请我去做期货，

期货市场大练兵 ③

要不是股票有“5·18”行情，我差点被他打动。面对这些不屈不挠的年轻人，我常常感到：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还有一位财经期货的经纪人也令我十分难忘，这个小伙子黑黑的脸，戴着一副眼镜，大热天也是西装革履，穿得毕恭毕敬。他不止一次地来找我，向我推荐热门的期货品种，同时也在报刊上发表期货评论拿给我看，不管他评论得对不对，但有一点：我觉得他会成功。好几次我都婉转地告诉他，我有许多股票客户，所以我离不开操作室，很难到他那儿开户，但是他总是说：开不开户没关系，我只想从你这儿学点东西，如果我有什么说得不对，做得不对请你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纠正我。

久而久之，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执着地做一件根本就是没希望的事呢？

有一次过年时，财经期货在深南东路的大酒店召开一次盛大的 PARTY，他给我发了邀请，一般来说期货公司的聚会我不会去，但出于感动我这次没有拒绝，甚至应他的要求带了几个朋友一起前往。

晚上到达酒店门口，他早早在瑟瑟寒风中恭候，然后热情万分地把我迎到里面的一张圆桌边，他的一批手下一看到我到达立即全体起来鼓掌欢迎，他在旁边很虔诚地鞠了一个躬说：各位，不用我多介绍，这位就是我最崇拜的安妮老师！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从年轻人通红的脸上我一下子读懂了许多东西。

小伙子在我入座后悄悄地告诉我：安妮老师你是我的偶像，从我踏进证券市场的最初就买了你的《股市通宝》这套

② 安妮投资生涯路

书，这已成为我的启蒙教材，我一趟趟往你那儿跑并不奢望你成为我的客户，只想在这次年前请你赏光参加我们的聚会，我要让大家看看，连安妮老师也成了财经期货的客户。今天你给了我最大的面子，谢谢！

我从眼镜片后看到年轻人目光闪闪，对我来讲举手之劳的这么一件小事他居然这么看重，谜底已经揭开，原来他是想利用我制造一个“轰动效应”，我不得不为他的匠心所折服！

青年人用他的真诚和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后来在我招募客户经理的时候常常想起的，如果这位小伙子来应聘，我一定会首先录取他。可惜，后来我便失去了与他的联系，这些年轻的经纪人在市场上的成活率很低，大概只有2%—5%，但能够坚持下来的必成大业。

这一点，通过期货市场我深有体会。

我在期货市场上陆陆续续地拼杀了一年，虽然没有亏钱，而是赢钱跑了出来，但心情却十分沉重，这一市场的压力和需要付出的精力恐怕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有的人只有巴菲特的本事却要去做索罗斯，那肯定不会成功。再说我辈要练就巴菲特那样的功夫，差距还有十万八千里，人各有志，还是要切合实际，量力而行罢。

期货市场的浸润使我仿佛置身于环环相扣的海洋生物链世界，海洋里的微生物被小鱼小虾小蚌吞吃，而小鱼小虾小蚌又让中鱼、大鱼果腹，中鱼、大鱼又成鲨鱼的最佳目标，鲨鱼的背后有人类的长矛和短枪在等候。所有的海洋生物最后都逃脱

不了市场的巨网。正如操盘手可以在某个时候击败某个商品期货品种，但却无法击败期货市场一样，这情形很像美国三十年代一位老资格的交易商杰西·里弗莫所言：一个人可以胜一场跑马，但他胜不了跑马场。而在中国的期货市场最令人头疼的是，你不知道何时跑马的游戏规则突然又改变了。

放弃期货回到股票市场后觉得一切驾轻就熟，心态是这样平静，小输小赢对于见过期货大风大浪的炒手而言简直只是小菜一碟。

期货市场的风浪锻炼了我的心智、心态和心情，为此，我觉得这番闯荡也算“不虚此行”吧。

十六、咨询公司新开张

1995年年关将近，由于股市呈现出极度的低迷，一度火爆的期货市场也因传出暂停开设异地交易的消息而走向低潮，证券部门可罗雀，投资者纷纷离场，许多券商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我们的传真《股海信息飞船》客户大量减少，成本相应增加，快达到入不敷出的地步了。原先合作的财务顾问公司打电话来说，与其苦熬，不如停办。

我接完电话，咬咬牙说：“既然如此，不如我们接手过来自己办！”《股海信息飞船》开办两年来凝聚着我们安妮投资顾问群一伙人无数的心智和血汗，犹如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怎么舍得把他割舍？

这时，残留下来的只有十二个客户，而这十二个客户几乎都是最早订我们传真的老熟人，兀然关闭如何对得起这些朋

友，对得起这些最信赖和依靠我们的人？

即便为了这十二个客户，我也决意要把传真办下去。为了他们，我必须开公司自立门户！

原先的《股海信息飞船》由安妮投资顾问群撰稿，然后交另一家有牌照的财务顾问公司打印、发稿，至于印发传真及收费等均与我们无关。这样的做法虽然减轻了我们的压力，但不利于和客户直接交流，不利于反馈各种信息，实际上也是传真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

想当初，这些传真客户基本上都是我亲自发展的，他们也是冲着对我们的信任而来，一旦发展之后便只有纸张往来再无感情交流，这样天长日久客户的流失日益严重。

在这件事情上我要感谢我的丈夫，他坚决怂恿我开办自己的公司，并且对我说：“要把事业做大，没有自己的牌照怎么行？办公司并不困难！”

我迟迟疏怠不愿开办公司的深层原因就是怕麻烦，既要面对大量员工又要面对工商税务，这绝非自己所长。我的特点是研判大势和选股，而非管理才能，这一点鄙人还是心知肚明。

我丈夫知道我的心思，颇有感慨地说：“在现代社会，不做一回老板，对人生的体会是不完整的。”他自己也是由作家下海开公司、当老板，苦头吃了无数，居然还乐此不疲，终于打动了，我也想试试个中乾坤。

为了办事顺利，我向一家专业公司交了手续费，一切委托代办，执照在一个月内就批了下来。当时证券市场委实太凄惨，别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说没人开咨询公司,连证券公司都想打烊。当工商局通知我去存注册资金的时候,我抽时间来到银行从自己的活期存折上打出 10 万元转入注册专户中,开单的小姐看看我们的公司名称,问:“安妮投资咨询公司? 这公司是干什么的?”我迟疑了一下,答:“是咨询买卖股票的。”“现在还能买股票?”她一脸的不屑和疑问。我肯定地点点头,浅笑:“看买什么股票了。”

“我看买什么亏什么!”旁边有个人怒气冲冲地插进来,仿佛是我害得他倾家荡产。深圳 80% 以上的人是股民,谈起股票谁都没有顾忌,这是一个最广泛的公众话题。

“靠咨询能赚钱吗?”那位小姐很怜悯地看着我,只差没给我施舍一碗冷粥。

“试试吧!”我又不置可否地一笑。

想想不对,我赶忙加上一句:“看怎么做了。”

“喔”,旁边看着我的人无精打采地瞥了我一眼,走开了。

对于我这公司起什么名称,我和陈宁有过一番争执,我想起一个较为平常普通的名儿,而陈宁却坚持以安妮打品牌,并说:“你已在全国有名,为什么不乘机扛起大旗呢?我当绿叶,你当红花就是了。”对于这一点,我深感到陈宁的豁达和大度,这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做到的。

安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开张了,当时实际上只有四个人,我和陈宁是股东,各出 50000 元钱,陈宁的太太小雪是打字员兼传真员,另外聘了一个兼职会计,办公地点就注册在陈宁家中。我们买了一台传真机就开始工作,时间是 1995 年 12 月 20

日。

虽然当时只有十二个客户，但我们立下雄心壮志，争取在一年之内发展到 120 名客户，增长十倍！

听到我和陈宁的这个宏图大略，小雪睁大了眼睛问：“那我怎么服务得过来啊？”

我跟她打趣说：“那时你就成了传真头儿了，手下至少有几个马仔为你打工，你只管数银子便是了。”

说归说，笑归笑，传真的现状实在不令人乐观。一是需要改版，在内容和质量上狠下功夫；二是需要出外联系，发展大批新客户。我们决定把《股海信息飞船》改为《安妮证券市场传真》，把原先的期货版删减，大量增加股票市场的内容，尤其突出个股推荐，每天深沪两地各推五只股票，供客户充分选择，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少见的。深圳股市由陈宁亲自执笔，上海股市由万国证券的伟君执笔，我则负责写安妮论市，在全国首家推出好淡指数及简明的一句话投资建议，使每个读者拿到传真后一目了然，对今天的操作和明天的走势毫无保留地亮出我们的观点。

改版之后的《安妮证券市场传真》受到读者及客户的欢迎，我们乘此东风走访了在深圳的一些证券部及机构。当时正值元旦过后，有关单位正考虑重订传真，看到我们的新版本后一致说好，并且对我们亲自上门推销觉得十分亲切。

其实，真的是万事开头难，如果你认真地想把一件事做好，拼命地想点子、出力气，在深圳这个地方还是很容易成功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的。

想起来 1995 年的年关好难熬！这一年许多人房地产套牢，股票套牢，生意套牢，实业套牢。有的亿万富翁因还不起利息东躲西藏，居无定所，成了“三无人员”。我碰到一位潮州的“豪客”，他曾在深圳龙岗大量建房，红火的时候有六辆小车、上千名工人。可当时为了发工资，连续卖了三辆车，还有三辆有行驶证没汽油钱，逢人便问谁要二手车，样子好可怜。有一次他实在没办法，打电话给我要挪 50000 元钱。我问他干啥，他在电话里幽幽地说：“买盒饭！”全没了以往颐指气使的口气。我叫他后天来取，因为卖了股票要第二天才能取现金，可是他居然再也没有来。过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他性急之下一跺脚去了澳门，赌得一贫如洗再也没有回来过。

正是在这样的黑暗中，我逐渐对市场恢复了信心。1995 年 12 月底，安妮投资顾问群开了碰头会，我代表大家在传真上发表了一篇《1995—1996 年市场盈利大机会》的年度汇报和计划书，这篇文章对 1995 年传真的咨询内容做了检讨，全年的五大机会我们抓住了四个，它们分别是：国债期货做多、“5·18”井喷行情、大盘股石化上扬、基金普遍升温，同时提醒投资者注意一级市场的选择，惟有对十月份北旅的收购兼并及板块效应思想准备不足，失之交臂。

文章对 1996 年的市场机会也大胆作了预测，明确指出：“根据周期理论和江恩理论的双重测算，我们估计在 1996 年 3 月份中国深沪 A 股会达到相对低点，引发一轮中级上升行情。

不管契机在何方，到时的低点上海方面可能在 524 点区间，深股重返综合指数 112 点附近，与一年前的相对低位形成 ‘W’ 形双底，有望在消息与政策的刺激下重聚人气与资金，给投资者造成一次盈利。”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以上所言均成为事实，并非我们有什么预测大势的特异功能，只是股市应了“物极必反”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同时也说明历史大底或大顶的技术数据较难突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剖析过 1995—1996 年的市场盈利大机会之后，我们发现赚大钱的时机正在向我们靠近。春节之后，市场依然毫无起色，指数一直在最低点徘徊。这时，新股认购的潮流渐渐兴起，迫在眉睫的是广州钢铁的新股发行。这只股票发行价格并不算高，每股 3.60 元，共发行 4300 万股，招股说明书刊登时已近春节，一般人忙于采购年货，并未注意到它。许多老牌绩优股如深发展都已跌到 6—7 元钱水平，谁还会对一只 3 元以上的钢铁股产生兴趣呢？该股发行的形式采取“全额预缴，比例配售，余款即退”的方式，这在当时也是十分新颖的，投资者非常害怕中签率低，扣款时间长，结果在二级市场又得不偿失，所以市场反映冷淡。

我们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对这只股票抱有兴趣，春节过后立即筹款打入该公司认购专户，这时才发现与我们抱同样希望的人数不多，但钱财汹涌，而且大部分是券商、机构、财务公司的巨款，这使我们既担心又惊喜。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担心的是这么多钱前来认购到底能中签多少，惊喜的是买
家大部分为机构，看来该股上市以后肯定有戏！

反正目前二级市场没有盈利机会可言，就在一级市场碰碰
运气吧。

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没错，广钢股份在 1996 年 3 月 28 日
上市，价格一下子上冲到 5.90 元附近，我们全部平仓之后获
利回报到达资金量的 15% 左右，这一块宝贵的盈利终于为我
们迎接 4 月 1 日启动的中国股票大牛市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说起来非常可怜，我们当时全部拥有的人民币不到一百
万，因为另有一百多万人民币换成了外币分别购买了深沪两地
的 B 股。B 股市场非常不争气，新股不断发行，老股不断掉
价，入市以后难得有一次行情，被人喻为：“解放三天，套牢
三年”，比 A 股还痛苦。

如何把这一百万人民币翻成五倍、十倍甚至更多的倍数，
是我们日夜谈论的主题。为了具备更多的原始积累，我们一边
在二级市场上辛勤地操盘，一边扩大客户，做好咨询服务。每
天早出晚归，乘着中巴回宝安，路上来回足足有三个小时以
上。至今想来我还是无怨无悔。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任何得到
都是有代价的。相比之下，现在一些大学生一毕业就进入证券
公司操盘，拿国家的钱锻炼自己的本领，真比我们幸福和轻松
得多，但他们中有些人缺乏我们这种强烈的拼搏意识和献身精
神，所以一旦从操盘的宝座上下来，就很难赚大钱，变得平庸
消沉。市场上永远有两种成功者，一种是需要别人为他组织舞

台、为他包装宣传的，一上台便能赢得满堂喝彩，他们是社会生活中的“歌星”和“影星”，是亮点人物；还有一种是靠自己组织舞台，自我包装“上市”，能否得到市场承认还有待检验，他们是生活中的导演和编剧，是组织“亮点”的人物。当你没有先天条件成为前者时，只能发挥你的后天条件勇当后者。这种不幸也会成为“有幸”，使你比前一种人在竞争中活得更顽强，更精彩。

那时候为了在二级市场上博取短差，我们再度选择了基金为主攻方向，尤其是尚未上市的南山基金和半岛基金，盘子小、质地好，价格不到一元，成为我们最好的短线对象，也再一次丰富了我们对于短线技术指标运用的心得。

操作室里的发仔也跟着我们来回跑短线，毕竟是年轻人，一来二去便上了手，看盘本事还特灵，被我们和客户誉为“短线高手”。发仔这时最大的牢骚就是不能使用T+0，如果T+0交易，至少每天能赚五次钱，这毫不夸张。而其他客户面对这个只能短线投机的市场一筹莫展，股市如果再这样萎缩下去，我们和发仔这样的短线客也难存活了，因为赚钱越来越难，套牢实在太容易了，基金由三分钱的差价缩到两分，由两分缩到一分，有时甚至一天不波动。我们在内心深处大声呼叫：“牛市，你何时才来？”如久旱的禾苗期盼甘霖，如炎热的酷暑渴望凉风，每个人的耐性都似乎已经到头了！

我们公司这时在传真上发布了：“三年不开仓，开仓吃三年”的豪迈宣言。

十七、函授与面授

1996年初，就在股票行情即将启动之前，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时间差——在海南与海南教育学院合作举办了全国第一个证券知识函授班；在广州与广东省电台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个操盘技巧面授班，函授班学期三个月，面授班学期一个月，由安妮公司提供全套课本及辅导材料。

感谢海天出版社赶在1995年12月底之前把我们撰稿的股票投资丛书一大套四本全部出齐。

这套丛书的构想与策划得力于武汉的汪海平先生。1993年，他是广州君信投资顾问公司的老总，而我曾是他手下的部门经理。汪海平先生向我绘声绘色地讲起出一套“股市通宝”丛书的愿望，我被他的计划深深打动。当时，中国尚未有一套囊括股票、期货、国债三大市场的专业丛书，而我一向愿意做

前人未做过的事情，于是当场表态加盟这套丛书的撰稿与编纂。

汪先生给我们拟了三个题目：一个是《看盘与操盘》，一个是《寻找最佳买卖点》，还有一个题目他试探性地问我：“你愿不愿写《股票技术分析方法与应用》？”

我觉得这个题目虽然理论成分多了一点，但还是可以拿下来，《看盘与操盘》更是没什么问题，至于《寻找最佳买卖点》我觉得让擅长操盘的陈宁来写最合适不过了。

陈宁又要操盘，又要做咨询电话，每天还要赶写 5000 字，结果超负荷工作之下大病一场，但终于把《寻找最佳买卖点》这本书如期完成。

没想到这套丛书在面授与函授中还真派了大用场，许多学员收到这套丛书后如饥似渴地学习，并写信或打电话与我们交流，其发奋程度不下于通读毛主席的雄文四卷。在眼下流行的股评家队伍里，我也经常能发现一两个我们过去的函授或面授的学员哩！

在广州开办函授班的过程中，有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那已是 1996 年 4 月份，我们的面授班每周六下午开课，为了让学员觉得通俗易懂，证券部搬来了大屏幕电视机让我们举例讲课，而我们讲解的恰恰就是深发展。我们解剖了这只股票潜伏、启动、扬升的全过程，当时面授班的学员共百十号人，几乎人人受益匪浅，许多人因此买了深发展，与这只大牛股结下不解之缘。其中有一位学员仅这只股票就赚了一百四十万，后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来成为我们的会员。

面授班是收费的，四期共计 100 元学费，在艰难的熊市，我们不忍心再向学员收取更高的学费。没想到学习结束之后，许多学员握着我的手说：“安妮老师，你们的学费太便宜了，应该收 1000 元才对！”

我笑了，心里感到很欣慰。学员觉得在函授班真正能学到东西，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和夸奖。1996 年牛市中，我们在深圳举办的初级、中级、高级股票实战操作辅导班收费就是 1000 元，结果人满为患，必须限额报名。

在办班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许多堪称精英的朋友，这几个班开办的地点均在南中国，所以有许多是内地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大学教授、工程师、管理人员，还有一些研究生，他们希望学习第二专业的欲望如此强烈，使我深为感动。在深圳开办的初级、中级股票操作辅导班由于想参加的人太多，不得不开办第二期，当时行情已经起来，操盘与咨询已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在办完高级班后就宣布结束。

高级辅导班上我们请来了北京国民经济研究学会的秘书长樊纲先生，他在课堂上对中国经济的一席谈使大家胜读十年书。当时我们的传真已和他的研究所携手合作，由他们每月三次供稿，为我们的传真撰写宏观经济形势、热点分析及大事记载，这样既提高了传真质量，又节省了研究力量，被同行誉为“强强联合”的有益尝试。

樊纲先生三十有余，风华正茂，满腹经纶，他刚从国外学

成归来不久，他的某些观点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真有“振聋发聩”的味道。

他在黑板上划了一条斜线，然后潇洒地勾出几根曲线，说：“对于股票而言，政府的利率政策、宏观经济、外部环境只形成股价曲线的波动，惟有上市公司的业绩才形成股价的上升、下跌和盘整的趋势。”这观点在1996年大众投资者刚刚重视宏观经济之时是十分精辟的，当然，现在已被众多研究人员及机构采纳，但市场大众的思维已经走过了一些弯路。那时的投资者还是以股票盘面分析为主，看盘决定一切。

另外他在讲课中提到，考察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主要指标不是居民的物价指数和消费指数，而是生产资料、基础材料的价格波动。这一点对于我以后的思考问题也大有裨益。1997年底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国内需求不足，就是受此启发，并因此提出五类股票可能受此影响会出现下跌：一、百货板块，尤其是投入巨资装修豪华的高级商厦；二、价格竞争激烈的轻工家电行业；三、出口地为东南亚的上市公司；四、高成本建造的商品房地产公司；五、一哄而上盲目扩张形式重组的上市公司。我的这些预测在1998年得到了证实。

学会用先进的经济理论来思考问题非常重要。辅导班中我还聘请了其他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的研究人员、操盘人员一起来授课，所以开班的过程中既培育了人，又提高了自己，真可谓教学相长，各得其所。

开办的过程中许多学员提出能否经常保持联系，以便继续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提高，当然这里的“提高”更多的是指保证金的“提高”；因为当时已慢慢进入大牛市，我们在每期辅导班中总是推出几个股，反映奇佳，以至有些学员花了一千块学第一期，继而又花一千块学第二期，问他为什么，他说 1000 元找一匹黑马不算太贵。

此时，安妮公司的工作人员日渐增多，深圳本地已有十几人，信息部的一位经理不失时机地提出是否可实施会员服务。建议提出后员工反映热烈，个个跃跃欲试，准备接受挑战。

我召集员工开了一次会，大家商议出服务的原则和方式，当即在辅导班上接受会员报名，报名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第一期辅导班就报名二十三人，许多人当场交钱，第一号会员是来自海南的一位医生。他原先是我们函授班的学生，这次专程来深圳听课，听完课又成为我们的第一号种子选手，准备享受我们的系列服务。这位会员入会之后的 200 万元在两个月内赚了 150 万元，至今还逢人便夸。

安妮投资俱乐部高级会员很快增加到 70 名以上，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我们在深圳新地酒店召开了投资俱乐部成立大会，高级会员从全国各地纷纷乘飞机前来参加，时间是 1996 年 10 月。我们的老朋友，深圳大学的书法家特地书写一条横幅，上有“腾龙”二字以示祝贺，因为我生肖属龙，为这暗含的巧合高兴。他的夫人特别机灵，向我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喜得我们全体抚掌大笑。

成立大会上有一位高级会员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我一看在座的会员除台湾之外可以说全国各省都有，面对着他们充满希望和信任的目光，我的眼眶湿润了。因为要去赶电视台录制节目，我简短地发了个言，并且推荐了两只股票：一只只是深振业，当时是8.90元。我直截了当地说，不到15元坚决不抛；另一只是南山基金，当时是1.03元，我说不到1.50元坚决不走。台下掌声一片，都说“我们听安老师的”，气氛热烈祥和。

半年之后我再问这些会员时，很少有人持有到那一价格，振业一路走到了18元，南山基金走到了1.80元，许多会员向我诉苦：“我们真要听你的就好了！”不过，他们也很满足，毕竟还是骑上这两匹黑马颠跑了一阵，谁让自己先下马呢？没有谁说乘飞机来一趟深圳不值的。

高级会员发展到最多的时候，我们的客户经理一个人要为15名左右的会员服务，手机、直线电话响个不停，犹如传呼台的小姐与先生，也真难为了他们。面对不同的脾性，不同的资金，不同的组合，要使会员在惊涛骇浪中赚钱，安妮公司的客户经理付出了最艰辛的劳动。有些会员为了获得较多的信息，同时在全国参加几个投资俱乐部，最后他们的结论几乎是一样的：“还是安妮投资俱乐部最好，不光给黑马，更重要的是给理念，不光帮我们打理，还教打理的办法。”这些会员许多成为我们最亲密的私人朋友，有事帮忙，无事不谈，最后分不清是我们为他们服务，还是他们在为我们服务了。有一次我因头痛回家休息，杭州的女会员闻讯后专门乘飞机来家里陪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我，帮我烧吃端喝，弄得我不知如何感谢；许多次我外出讲课，都是我们的会员帮我提箱护送，怕我路上不安全。我们公司的总经理陈宁患了急病，是一位马鞍山的客户连夜把他接送到上海，日日夜夜地守护直到他开刀后出院。想起这些常使我深感惭愧，我为他们做得太少，他们为我们做得太多！

股市是人生的交际场，现代信息社会的信息交流越来越多，而心灵的互访却越来越稀疏，然而正是通过股市上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所引起的灵魂冲撞才更加可贵。这么多年来我因工作繁忙经常住在办公室，但我几乎没有一天感到寂寞和冷落，我生活在一群信任我、爱我的朋友和员工中间，我觉得此生不虚，股市给我的回报何止是金钱！

一个只有钱的人老来是会很孤独的，但是我不会。有这么很多朋友，我永远有这么多事可以做——更多地回报他们，答谢他们。这些也就是我最宝贵的人生资源了。

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有钱并不让人羡慕，有钱同时又有朋友，那才是令人眼红的事。

十八、牛市的伟力

1996年4月5日，深沪两地的股市分别达到最低点，这一天也正好是中国的清明节。以这一天为分界线，中国股市行情悄然启动，在宏观经济及政策的配合下，逐步进入了一个大牛市。

在这一年的元旦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1996年中国投资市场畅想》，快人快语，真刀真枪。在结尾时我总结道：“在多元化的市场上保持多元的思维，会使你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机会。这一年你的脑力花得比别人多，思维比别人多变，结果就等于双倍地获得了1996年的365天！”

现在回想起来，1996年的365天真可谓“一日三秋”，一天等于平时三天的效益，绝不止双倍的效益。

首先是这一年的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春节前还是龟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奄一息的股市在阴历年后开市第一天便“大红灯笼高高挂”，给投资者一个满堂彩。北京召开了“政协”“人大”两会，委员们为第九个五年计划献计献策，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准备迎接新的经济增长。股市在开市的第一日便有大量新资金涌入，与1995年的“5·18”井喷行情非常相似，但仔细辨别还是有许多区别——“5·18”井喷事件最主要的契机是关闭国债期货交易，但春节后3月4日的跳高行情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通货膨胀被有效抑制，中国经济终于有望“软着陆”。当时许多投资者对这一点都缺乏心理准备，以为大不了也只是一轮B浪反弹，市场上还在期盼C浪下跌，所以许多人在熬过漫长冬季之后略有盈利便纷纷抛售，害怕股市上的“狼”又来了，最后落个套牢的下场。

我们经过对宏观经济的仔细分析以后断定：3月4日的跳空缺口不会有“5·18”那么巨大，但因之而来的上升行情也不会如“5·18”那么短命。

从新股广钢上市以后的良好走势来看，人气正在聚集，当时又恰逢两会召开期间，经济发展及与之配套的金融改革，企业转制都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利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虽然均是远景规划，但股市需要的就是这种心理憧憬。同时，春节后国债发行的利率第一次开始走低，使许多人预感存贷款利率的下调必不可免，利率哪怕是象征性的微调都意味着资金要另寻出路，股市憋足了三年的劲就在等这决定性的转折。

3月份国家银行兑1100亿国债的本金与利息终于酿成一

波大行情的导火索——资金面的变化成为最根本的变化，一些在高通货膨胀期间存入银行的资金终于出笼了。

似乎为了配合这波行情，一些经济学家或有关管理人员开始在电视、电台、报纸上竞相宣传，要把间接投资转化为直接投资——股市的春天悄悄来临。

阳春三月虽然是莺飞草长季节，但中国疆域之大却呈现出南国春浓，北国风寒的对比，相应在股市上也出现了“深强沪弱”的局面。

我们最早在 1996 年 3 月 2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撰文《深强沪弱 非同寻常》，引起市场广泛注意。文章列举了深股四大异常现象：一、成交量深沪比例出现大幅扭转；二、大盘股深发展的走强连续维持 20 多个交易日；三、新股上市高开高走令人瞩目；四、一批低价股联袂而起，题材千姿百态。这与上海依然死气沉沉的现象形成强烈对比。

通过现象看本质：三年的熊市深股跌幅超过沪股，市盈率也比上海低，矫枉必须过正；其次，1997 年香港回归题材重大，最主要的是深圳证券市场管理层痛定思痛，拿出一系列整改方案——“全面服务，二次创业”，首先在精神上改变了沪强深弱的局面，使后来者居上。

当时，有许多上海的股评家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与深圳的股评家打起了笔仗，到底是深强沪弱，还是沪强深弱，成为投资者在下单前的一大困惑。我写过上述文章之后，再也没有卷入此类笔仗，因为道理很简单——哪里有钱赚，哪里好赚钱便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到哪里去，与其在报刊上争论不休，不如到市场中搏击风浪。每当同行们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或是投资者在讲座上频频发问，我的回答很简单——资金是没有性别，没有阶级，没有国籍的，它只有一个目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四月初，上海推出了本地股张江高科和申达新股认购，一下子冻结了 200 亿元人民币，拉开了投资者迎接新股发行上市的帷幕。

当时的这 200 亿元人民币引起市场大哗，因为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多资金进入一级市场了，其实这些区区小数和以后新股认购动辄冻结 2000—2500 亿的数目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张江高科不久上市便创出了新股获利 2.72 倍的天文数字，使整个资金市场为之一振！从此，大量自有资金，拆借资金，生产资金包括居民资金浩浩荡荡开入一级市场，大展拳脚。有时候我想，牟其中其实很傻，他有这么巨大的融资能力，如果不去搞什么喜马拉雅山通道，不去胡乱收购项目的话，凭他拆借来的二十亿资金只需在一级市场认购，二级市场不断套现，循环往复，不成为中国头号富翁才怪！当然这属于题外的“财经闲话”。

正是新股上市的轰动效应引起了闲散资金大量入市，所以在不合理的现象背后蕴藏着市场义无反顾地走向扩容这一历史必然性，也蕴涵着成千上万投资者对扩容促使市场成熟和壮大的理性认同。

黑格尔曾经说过：恶推动历史！

这一哲理在证券市场有最精彩的演绎。当许多投资者，特别是正人君子、知识分子对证券市场上的某种投机现象如机构作庄，资产重组，包装上市，内幕交易深恶痛绝而失去信心的时候，常常忽略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理性的、成熟的股市正在痛苦地分娩。重要的是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他们总是期待市场尽善尽美，合乎理想，到那时仿佛才具备心安理得入市的条件，实则不然。一个高度理性化、规范化的市场上散户极少，大部分由专业人员互相干仗，这要在中国股市的后期才会出现。而在它的早期，市场的活力及不规范是同时存在的，惟其如此，才有各色人等蜂拥而入。投资者的队伍在1996—1997年急剧扩大了三倍，资金扩大了四倍，显示出牛市对整个古老中国巨大的吸引力。

被牛市的伟力所震撼，我奋不顾身，不假思索地投身进去了。

当然，牛市并不如现在回过头来想象的那么好赚钱，那么轻松。牛市是紧张的，也是残忍的，就像西班牙狂怒的斗牛既能使跟随它的人群感到热血沸腾的快感，也能毫不留情地踩死一些跟不上趟的“勇士”。

说起来也许叫人不信，在1996年牛市的初期，许多人并没有赚钱，倒是许多人抱怨亏了钱。这些人的做法在市场上很普遍：高进低出，左右抽自己的耳光。我在牛市初期开设讲座，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特地从蛇口“打的”过来听我讲课。讲课结束时他执意邀我们去吃麦当劳快餐。我见他急得满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头大汗只得跟随，未等落座，他便向我大诉其苦。此公入市两个月，五百万已亏了两百万，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是大牛市，怎么干也不至于这么惨的。

听他仔细道来我便明白，此公只要买入的股票三天不涨就坚决斩仓，重新换股换马。促使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人家的股票都在涨，而他的股票只要不涨自己便怎么也沉不住气。高进低出的结果便是：心态越做越坏，资金越做越少，借贷来的五百万现在只剩下三百万，还问我怎么办。

我认真地对他说：最好的办法是停手！你像一个蹩脚的舞伴，跳起舞来专踩自己的脚怎么行？

没想到他委屈地说：你以为我容易吗？高位买进来的股票低位斩出去，一般常人是做不到的，我是狠着心肠才做到这样的呢。你叫我怎么办？

我啼笑皆非：中国居然有这么可爱的股民！如有庄家在旁绝对可以庆祝一番了。

我苦口婆心地说：你千万不要再做下去了，你这样的心态千万别再做下去。人不能重复同一错误，在股市中尤其不能重复高进低出的错误，炒股走上这条不归路也就完了！

他垂头丧气地叹了口气说：我回去试试吧，只怕到时控制不住自己。

我望着他的背影，从心坎里觉得此公是不宜炒股的。但我不忍把这一真相告诉他，这时我忽然想到：如果我能帮着打理，他决计不会再赔下去，相反会把亏损补回来的，现在毕竟

牛市才开始啊！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敢叫住他，一是中国人可能不接受专家理财的概念；二是我与他萍水相逢，谁知他会怎么看我呢？遗憾的是，一直到大牛市结束，我也再未遇到他，不知此公是否依然行走在股市上？

牛市初期，投资大众的高抛低吸已成顽习，这是三年熊市留给股民最好的训练。上海人的“吊篮头”，深圳人的“埋地雷”，反正对付日本鬼子游击战的那一套全用上了，结果不是战绩辉煌，而是业绩乏善可陈。

有一次我到上海讲课，把上海人这种牛市上的短线行为讽喻为“菜篮子”工程，只赚一两毛钱就走，引起场内大哗。等到我从讲台下来，便有几位里弄大嫂把我围得水泄不通，你一言我一语地“教育”起来：依不好讲阿拉上海人“菜篮子”的，这个市场不跑得快就要套牢，套牢就要割肉，割肉痛喔！你晓的迭（注：上海方言，同这。）个味道哦？

我觉得这些大嫂们可爱又可悲，便用上海话回答她们：“熊市中割肉，牛市中割啥肉？再割只剩骨头，牛市中应该赚大钞票，不要只盯牢蝇头小利不放，我是讲真心话！”

几位大嫂听我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互相点点头，说：“安妮是上海人，不是深圳人，不会给我们当上的。”一边说一边笑着离去，一场不愉快这才烟消云散。

我心里一阵苦涩。其实，操作股票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地域文化影响的。北京人称为“炒股”，他们身在首都，心向天安门，政治性强，消息灵通，意识到中国的股票是做差价，所以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牛市中的高位套不住北京人；深圳人称为“玩股”，一个“玩”字活脱脱描摹出他们重在参与，轻于得失的潇洒心态。历经几度熊市的深圳人心理负担却并不沉重，依然敢于在股海浪尖做弄潮儿；上海人则称为“做股票”，一个“做”字充分浸透了沪人的勤奋和辛苦，把买卖股票的历程描绘得精细而又沉重。做差价，做短线，做个股，做资产重组，股市上的一切都是“做”，上海的股民如何不累？如何不敬业？

至于四川人操作股票可戏称“爆炒”，湖南人可谑称“辣炒”，东北人是否可叫做“冷炒”？它不仅和地域文化心理有关，或许和饮食及语言特色都有牵连哩。由于我以前是搞文学创作的，尤其注意人的心理因素对市场的反作用。这一概念我早在1995年便在文章中提出，后来在国际大炒家索罗斯的一些言谈中也发现他极注重人类认知的反作用，在证券理论界独树一帜。为了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刻研判，我们专门请人全文翻译出索罗斯所著的《金融炼金术》，时间是在1996年。不为出书，只为自用，为我们对市场的把握寻找理论依据。最后我们得出牛市会升过头、熊市会跌过头的结论，原因在于心理反射。

后来，我曾经因为在文章中抨击上海股市中的“亭子间文化”遭到非议，但在遇到上海的一些政府官员或媒介、经济界人士时他们都非常真诚地说：“你对‘亭子间文化’的评析很中肯。上海要走向全球，与国际市场接轨，一定要形成新的海派文化。”从这一点我觉得上海管理层及社会精英已经意识到

地区原有文化的局限，正意欲构造新的大上海精神。这方面的准备是漫长而坎坷的，这在 1996 至 1997 两年沪市落后于深市之后管理层及证券界奋起直追的身影中有最好的解释。

不管是深强沪弱还是沪强深弱，最主要的差距并非外部环境，还是体制、人才，最终是精神风貌的竞争，是内因的竞争。

十九、发展，发展，再发展

从1996年春节起，我与公司负责操盘的陈宁就研究，“三年不开仓，开仓吃三年”，我们开仓的话要吸纳的是什么股票？这是非常郑重而关键的一役，打得好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命运，打不好那就会白白错过即将而来的大牛市。

牛市行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的人一生中也就遇到过几次，如果失之交臂那就不能怪上帝不公平，只能怪自己太弱智。

我们两人同时把目标放在深圳股市的老龙头——发展银行这家公司的股票上。这只股票从1993年的60多元高峰一直掉到1996年年初的六元钱水平，其中虽然经过一次十送二派现3.00元的分红，然而通过除权摊薄这只股票也已整体下跌达80%。在长达两年的漫长惨跌中，市场主力及散户凭着对它的

发展，发展，再发展 ◎

一往情深，屡次进去“抄底”，结果屡抄屡套，屡套屡斩，屡斩屡赔。最严重的一次是1994年，有关管理层动员各大券商入市护盘，每家买入一百万股深发展，买入价为18元，但一年之后便跌至八元，响应号召的券商亏损严重，平均每家在一千万左右，托市之苦，苦不堪言。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尤其是国库券利率下调的信号使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上市公司中最受惠的将是全国惟一的银行股——深发展。这家公司把1995年的一些亏损作了撇账处理，剩下的资产质量优良，经营方面也因是股份制企业较为灵活，经过两年的超跌，我们估计深发展这只股票价格已近谷底，即将展翅起飞了。

当我和陈宁的意见空前一致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建大仓，而且几乎每次都有辉煌的战果。春节后我们决定倾囊而出，把所有的钱全部买成深发展，并且一路持有！

这一次我们前所未有地将所有的钱买一种股票，这在投资管理方面是犯大忌的，而且以前我们从未这样做过，一般总会买上三四只股票作一个投资组合，以免过于集中，分散风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衡量：当时盘口的深发展已微微启动，从最低价的六元钱慢跑到6.60元，升幅仅10%；即便再度下挫，该股向下的空间也仅10%；但如果一旦启动，它上升的空间至少会有100%。拿一成的风险和十成的盈利相比，我们坚决拍板：就是它了。

当时，抛售了广钢股份之后，我们将所有的钱分两三个交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易日在 6.70 元—6.80 元的水平吸仓，“多头部位”已成功建立，余下的就是等待它的来回震荡了。

我们建仓发展的动作是很公开的，一起与我们做股票的客户在我们影响下也纷纷买进，当然没有我们那么集中。

也许是在短短几个交易日里升得太快了，发展股在 6.80 元—6.90 元左右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所谓剧烈，其实也就五毛钱来去。但是这也吓坏了刚从熊市里走出来的股民朋友。听我们劝告买入发展的亲戚朋友，客户纷纷打电话来报告：发展跳水喽！

我听了没好气地说：发展跳什么水！也就五毛钱，这都守不住，还做啥股票！

那时候的人特别沉不住气，熊市把他们的心态折磨得极坏，不超过半小时就问一次：套牢怎么办？

这下我换了一种口气，幽默地调侃：“别急！你套牢的是金项链，不久还会变成钻石项链，等股价翻了 50% 再来问我怎么办呢？”

当时没有一个人把我的话当真，穿久了棉袄的人不敢打赤膊，就像吃着西瓜的人不敢抱火炉，他们中许多人悄悄地把发展股卖了。有的甚至还是亏了本卖的，好一点的也只赚了几毛钱，这些人事后都捶胸顿足地遗憾。

有一位客户最可惜，她买的发展套了整整半年，一到 7.80 元刚解套她就迫不及待卖了，等她一出手，发展一口气涨了一年，真把她的“肠子都悔青了”。很难想象，深发展的

众多股东中还有比她更不幸的投资者。

自从深发展在 1989 年问世后，只要耐心持有它的人几乎个个赚钱，而且越耐心赚得越多，所以全国投资者，特别是深圳人对它感情十分深厚。当时我在深圳电视台做节目时就这样推荐过深发展：“作为一个深圳人，来深圳可以不买房、不买车，但一定要买深发展，否则就是白来特区跑一趟！”这段话我说过后也就忘了，谁知许多人若干年过后还记得它，并且满怀感激地说：“就因为当时听了这话，1996 年买了深发展，现在已成为百万富翁。”还有的说：“安妮，你什么时候再穿那件红衣服上电视台号召大家买深发展，我什么时候再倾家荡产买进去！”

他们连我当时穿的什么衣服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逢周六下午是我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股市传真”节目的日子，那段时间我连续三周推荐深发展，并且自编一句口号“发展—发展，再发展”，一时传遍全国，“享誉大江南北”。许多人都是在电台的节目里听惯了我的声音，纷纷给我写信，打电话，直至做讲座时激动地跑到台上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当我面露怀疑，深感不解时，他们便会大声地说一句：“还记得吗？发展—发展，再发展！”接下来的当然是双方会心的大笑。

有一次，深交所的工作人员听到我在福建举办的讲座上号召大家购入深发展，当时该股股价已从六元水平跃升到 12 元，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股价已翻番，可我还是热情万分地推荐它。会散之后他不安地对我说：“安妮，发展已升得这么高了，你还去推荐，不怕套牢别人吗？”

我胸有成竹地说：“放心！推荐别的股票我不敢这么大胆，深发展我有十分的把握，除权前准能跑到 20 元以上，12 元买发展至少还有 50% 的升幅呢！”

“你这么肯定？”他还是抖抖忽忽。

是的，我们就是这么肯定！因为发展股流通盘大，没有谁能做得了它的庄，它的股价上扬完全是价值回归的过程，充满了必然性。

从 4 月份到 6 月份起，我和陈宁分别发表多篇文章，从各个方面阐述发展的投资价值。陈宁在题为《发展不倒 大市向好》的文章中预测发展股除权后可到 16 元以上，因为按发展 1996 年每股盈利预测 0.70 元计算，该股市盈率仅二十余倍，与当时深沪两地平均市盈率三十倍相比，仍低一大截。我在《投资股市的“马家军”》一文中则写道：“发展在分红前的最高价可以看到 20 元以上，除权以后的发展其股价完全有可能填权，重新弹升到目前 16 元以上的位置。据此计算，发展股的上升空间依然在 100% 以上，而这一目标乐观估计在今年年内达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日期是 1996 年 5 月 2 日。

话是这么说，我们拿着一大把的发展股票，情绪上也是飘忽不定——不是怕它跌下来，是怕它升得太快了，账面利润丰厚，老怕煮熟的鸭子要飞了，真想赶快获利了结。

发展，发展，再发展 ◎

尤其是我，女人的弱点总希望落袋为安。每当发展升上一元钱，我心里就打起了小九九，掐指一算又赚了几辆奔驰，可别像 1994 年的上海大户把一辆辆桑塔纳都开到黄浦江里去啊！

有意思的是，跟我们一样坐寝难安的大有人在。深圳有位股评界的老法师对我感慨：“我以前的股票市值都可以买十几辆奔驰，就因为牛市没走人，现在连一个轮子都没有了，你说惨不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怜悯地看了看他，觉得我也可能自身难保。证券市场就是这么一种地方，你永远无法确认自己是胜利者，只要你继续持仓，继续在这个市场生存，就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是赢家。

怎样来克服这种心理上的摇摆和情绪上的不稳定呢？

在牛市中我提出一个理念：经济学家的脑子加傻子的心态。

为了大获全胜，我们更多地把时间花在研究经济宏观面与股票的基本面上。4 月 1 日，国务院领导在听取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当前股市情况的汇报后，提出了“稳步发展，适当加快”的指示。我们对此反复咀嚼，文章就在“适当加快”四字。以前的口号是规范化、法制化、自律、监管等等，而现在的立足点是“加快发展速度”，这里面我们觉察到党中央思路的转变，深圳股市也就是在此基础上连拉十四条阳线。4 月 22 日各大媒介公布了这一新的指标，更增加了我们坚决做多的决心，手中的发展股就抱得更牢了。

5 月 1 日央行宣布第一次减息，消息传来，市场出现震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荡，有些人反手做空，认为“利好出尽”，发展在此点位上也出现大量抛盘。但这时的我们牢记用经济学家的眼光看股市，久久期盼的利好突然降临，尽管会有获利盘汹涌而出，但降息毕竟能把闲散资金吸引进股市，在剧烈的震荡之后必然是持久的上扬。

那几天我们拼命克制着做短线的强烈欲望，从短线角度讲我和陈宁完全可以做得很漂亮，打短差也许能赚几十万，但是我们担心发展一旦卖出就没有勇气全部拿回来，如果价格升高就更不敢追高去买。短线虽好，但不是大家手笔。既然看好发展股的后市，在第一次减息时就将它脱手，无论如何是愚蠢的。

陈宁的心态比较好，也许是非常喜欢下围棋的缘故，他从小练就了镇静、谨慎、平和的心气，每当发展急涨，我忍不住要与他讨论后市的时候，他就打开音响，自娱自乐，闭目养神，在沸腾的市场上保持着一种远离尘嚣的宁静。过一段时间他就拿出计算器算一算，他不算我们已经赚了多少钱，他算我们还能赚多少钱，这一点正是我与他思维的不同之处，对于纠正我的偏狭极有好处。

我看见周围有些与我们一样买入发展股的新股民买入之后从来不担心股价会跌，因为他们从来未遇到过熊市，所以一直幸福地持有，心情好轻松。有时我很羡慕他们，觉得他们的幸福完全来自于“傻子”的心态，我们虽然不能学习去做这种“无知无觉”的傻子，但在牛市中倒是要做“有知有觉”的傻

发展，发展，再发展 ◎

子，这样才能每天抱着飞涨的股票睡觉，犹如 1995 年抱着涨停板的国债期货一味死守，只要形态不变坏就坚决不出局！

在每天与自己顽强的斗争中，我们终于将发展股一路持有到除权后 16 元以上才了结，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发展一直到 18 元以后才出现较长时间的调整。当时发展的方案为十送十，16 元等于除权前的 32 元，仅这只股票我们就赚了 500%，几乎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两个多月弹指一挥间，但在这 80 个日日夜夜里我和陈宁所共同忍受的煎熬、压力、折磨加起来比一年的熊市还深刻，还严重。这一经历也更使我明白了投资者在熊市中熬过来不容易，在牛市中挺过来也是难度极大。

上帝为了把你锻炼成合格的投资者，必让你经受十次大水的洗礼，再经受十次大火의 焚烧。阿门！

二十、“五朵金花”

发展股在 1996 年 5 月 23 日十送十除权，一路填权至 16 元以上，我们按照原来的盈利目标顺利出局。“拔剑四顾两茫然”，新的市场热点在哪里？深沪股市还有没有能翻番的股票？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其实，在发展股尚未出局前，我们就把眼光放到了本次牛市启动前发行的新股上。由于市场尚在热炒价值被低估的老股，如深发展、川老窖、四川长虹、湖北兴化等绩优股，刚上市的新股往往被忽视，盘口显示出价格低、交易少、换手不充分等特点，新股被大家当作冷门股。

举黔轮胎为例，该股发行价格为 4.50 元，于 1996 年 3 月 8 日上市，上市后股价一直在 5.00 元左右徘徊不前，成交量非常稀少，一是投资者对股市没有信心，对情况不明的新股更

“五朵金花”◎

是不敢沾手；二是该股上市后宣传不充分，许多人认为这家公司不过是贵州的“老少边”企业，盈利低下，生产落后，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再加上深发展等绩优股四月份开始启动，当时也不过六元一股，谁会来注意一只贵州穷山沟里的股票呢？

另一只股票是4月30日上市的青岛双星，发行价每股4.90元，上市后一直在6—7元左右震荡，曾经有家券商因做它的发行承销在上市有所拉动，无奈没人跟风，只能自拉自唱自落蓬，结果在七元左右全面出货。

只有1996年4月25日上市的光明家具在市场上一枝独秀，因为它是当时深圳股市十分低迷时惟一愿在深交所上市的新股。深圳证券管理层及大券商对它倾力扶持，深圳市政府甚至还推出了低息贷款的优惠政策，使这只股票上市之后如脱弦之箭跑得飞快。在这只股票上市前，我应邀在吉林演讲，讲座上认识了这家公司的老总冯永明先生。冯先生朴实却精明，谨慎却大胆，几种不可多得的品行竟然能在同一个人身上融合得这样完美，就像他们打造的原木家具一样，浑圆而有棱角，朴素而有灵气，给我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吉林的讲座期间我去参观了他们的门市部，和光明家具厂的中下层干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孔雀东南飞”，放弃上海而到深圳去上市时，这些员工都对自己的老总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我们冯总决定的，他做事总是出乎市场预料，效果当然也出奇的好。”看来冯总真是得了“深强沪弱”的风气之先。须知，他做出这一决定是在1996年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元月份。

光明家具一口气在中国五大城市开了新股上市推介会，上市之后受到全国人民的追捧。最后一个推介会放在深圳召开。来自兴安岭的东北汉子的坦荡与豪爽深深地打动了深圳人。当深圳的投资者问我，光明家具能不能买时，我毫无顾忌地说：“买，坚决买进！”

从这只股票凌厉的升势中，我觉察到投资者对新股的热情渐起，那么其它已经上市的新股命运如何呢？为了把它与刚上市的新股区别开来，我们公司替它们起了一个新名字——“次新股”。有一次在讲课时，有些学员还问我们：“什么叫次新股？”我回答：“即已上市二三个月的新股。”

“为什么要买次新股呢？”有些学员又问道。

“因为次新股上市生不逢时，价位低廉，主力容易收集低价筹码，上市后在箱体内容幅徘徊，套牢不深，上档压力不大，再加上次新股一般仅二三十万流通盘，容易控盘，所以操作起来比较轻松。”

当然，次新股最大的特点是价廉物美，熊市末期上市的股票往往主业鲜明，具有较好的成长性，为各省市的优秀企业。我们公司在推荐次新股时着重推出了五朵金花：黔轮胎、蓝星清洗、青岛双星、华意压缩、国际大厦。

值得一提的是，这五家上市公司我们几乎全部亲自跑过，实地进行了考察，惟一没有成行的是华意压缩。人已到了江西但正逢发大水，道路被淹，只能打道回府。所以早在 1996 年

“五朵金花”◎

我们已经开始走访上市公司，依靠基本面的调查研究选股。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成功的，受到了客户的好评。

以上所推荐的五朵金花，股价在不久以后的日子里至少都有 100% 以上的升幅，特别是黔轮胎一路扬升，我们在 5.30 元左右建仓，一直持有到 21 元以上平仓，获利四倍。

说起黔轮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只股票是我们的客户发仔首先发现的，缘由很偶然：他意外地看到一张六月份的《贵州日报》，那张报纸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黔轮胎在 1996 年上半年业绩优异，产量翻了两番以上，尤其是他们生产的子午轮胎解决了高速公路回形轮胎连连爆胎的问题，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发仔把这张报纸带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我看完之后立即和黔轮胎的有关同志联络，开始他们还是很有顾虑，吞吞吐吐不肯讲出实情，但后来我们把这张报纸念出来之后，对方便承认记者报道属实。

仿佛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了一叶扁舟，我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就联络贵州的熟人去黔轮胎走访，了解事情真相。当时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卖完了深发展之后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能翻番的股票！在老股当中虽然也有，如深科技等（我们也买了一些），但该股建大仓的时机已过，大量买入非常容易将股价打高，只有被人忽略的边陲地区新股才比较容易低价位买入，“暗渡陈仓”。不久，贵州的熟人打电话来说：“黔轮胎产品供不应求，拉货的大卡车都停在厂门口排成队，生产热火朝天，子午胎利润十分可观。”我们摩拳擦掌，看来黑马即将横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空出世！

看准了就要重锤出击！这次我与陈宁又是不谋而合，一致决定买入黔轮胎！

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不久 Y 研究所通过实地考察也向投资者大力推荐该股。

为了推广该股，Y 研究所专门开了黔轮胎个股研讨会，并从北京化工部、交通部请来了一些专家，专题分析黔轮胎的行业前景。这一做法我认为是非常积极和有效的，推动了当时理性投资的风气。研讨会从我国高速公路发展的前景，结合轮胎行业的现状进行剖析，从而得出鲜明的结论：黔轮胎将在一两年中成为我国生产子午胎的生力军，利润因此将获得高增长。这样的研讨会别开生面，比起股评家滔滔不绝地讲起某某股票的阻力位、支撑位、庄家动向等高明多了。我也获益不浅，更加坚定了持股的信心。

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 Y 证券公司操盘的 K 生，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巴菲特的道路》，这本书当时尚未有中译本，后来我们托人去香港购买。这本书对我的投资理念起到相当大的震撼作用。

K 生在会上的席话也十分发人深省。他说：Y 证券公司的操盘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做庄，把股票一路拉高，有一次尾市一拔就是四元钱，早晨又低开，把小股民震得哇哇叫，我们很得意。后来才知道这么做是愚蠢的；第二阶段是研判指数，每天开会预测行情，猜点位，搞得很累很紧张，其实

这也是没有用的；第三阶段才是跑上市公司选股，事实证明这才是最有效的。

中午吃饭时他跟我开玩笑说：“安妮，听你的声讯电话让我们掏了不少钱，你看你每天还在说 KD 线、RSI、看技术指标，而我们已什么都不看了，这样轻松得多。”

乍一听，我觉得 K 生是在讽刺我，但仔细一想，我觉得他的话里包含着辛辣的真理，我们的这种做法确实快过时了！

K 生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也许已看出我的尴尬，赶忙补一句：“不过我还是挺愿意让安妮赚我的声讯费，因为她的电话里信息量很大。”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后生可畏，我的思路确实应该更新了。

记得一年前某券商在熊市中招人，招聘人员有次在飞机上碰到我，曾提出一个象征性的问题。他说有许多股评家应聘，并带来大量发表文章的报刊以示渊博，而且对股市各有各的预测方法，真是五花八门，如果是你会怎么介绍自己？我听了莞尔一笑，说：如果我到你们那儿去，我就会说股市是测不准的。

招聘人员点头赞同，说：“如果有人对我这样说，我更愿意录取他。”

时间是最会改变人的魔术师，证券界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大起大落，有的消隐，有的改行，有的锒铛入狱，谁能料到一些曾经红得发紫的人物会被打至“跌停板”呢？究其原因，股票市场赚钱的诱惑实在太太，它常常使一些人头脑发热，忘乎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所以，最终摔大跟斗。

在这个魔术师暗中操纵的舞台上多少人粉墨登场，又有多少人饮恨退出？证券界确实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个场所，同时也是最磨砺人斗志、心智、毅力、才能的地方了。

在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上榜人物中，我最佩服的是原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当他卸任之前曾邀请我、曹海、野岛深圳一行三人去上海开座谈会告别，光从这一举动上便可看出此人的人情味有多浓！当时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上海的应健中、瀚民、金学伟等，由《上海证券报》主办。

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他是从《上海证券报》的专栏上知道我的。那天下午匆匆从深圳赶到上海，一到会场座谈会已经开始了。我正想为自己的迟到道歉，他指指旁边的座位邀我入座，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读你写的文章。”

我们小声攀谈起来，原来他与我是同龄人，早年的经历也相仿，而且他很喜欢读书，也很喜欢文化人。《上海证券报》就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不过，不打不相识，一开始他曾为《上海证券报》所刊登的一些批评文章很恼火，后来通过几次接触，反而认为写这些批评文章的股评家率直而可爱，逐渐交上朋友，相知恨晚。

对于自己的辞职，他是这样解释的：“我是中国股市的一个历史人物，我的使命和作用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也就应该主动退出。这是一件好事。”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坐在他身旁，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七

尺男儿泪光闪烁。

尉文渊为证券场所所做的一切，中国投资者是不会忘记的，这个有棱有角热血磅礴的男子汉凭着他的赤诚和人格魅力，带着上交所上上下下百十号人为中国股市创业立下汗马功劳，而现在却能有这样的胸怀和肚量主动下台调整，我想他确实是证券市场上的强者，但同时他又何尝不是幸运者呢？

在证券市场上，花无百日红，人无三年运，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局限，急流勇退的人何尝不是真英雄？只有那些不自量力、一意孤行的“盲流”最终才会落得被历史淘汰的命运。1996年股票市场上我们曾经炒过的老股票深发展，次新股五朵金花，现在都已时过境迁，成为明日黄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这一市场上我们比别人更迅速地看到了新旧交替，多空嬗变，因而保持着更深重的危机感。

所以，当有人说你们在股市上赚钱好舒服的时候，我常常冷不丁地刺他一句：你来试试看！也不知是哪来的无名火。也许是前面倒下的人太多了吧？

二十一、来自北京的声音

大牛市中次新股的炒作开始是较为理性的，随着“五朵金花”的灿烂开放，百花吐艳，竞争风流，一些低价垃圾股开始出现不正常的狂升。

股评界当时出现一种舆论，即：做足低价股的补涨行情，抓住牛市的主升浪。甚至还有人鼓吹，一天抓一匹大黑马，一天抱一个金娃娃。

当时的市场确实已近乎疯狂，有些低价股的日涨幅动辄10%—20%，最典型的是深华发、深益力、深深宝、长城特钢等一批市盈率高，盈利能力低的三线股，涨得叫人看不懂。

我们公司的投资理念向来是“理性投资，长期收益”，当然不排除炒垃圾股能赚钱，但这种钱我们一般不赚，主要是因为风险太大，投机成分太多。

来自北京的声音 ◎

有一次在酒楼吃饭碰到一位熟识的股评家，他因推荐股票出名，被人誉为“黑马王子”，名噪鹏城。他热情地对我说：现在炒低价股最赚钱，我推荐几只你可以试一试。

我感谢他的好意，客气地摇摇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炒三线股不是我的特长，我还是不沾手为好。”

他很奇怪地看了看我，像观赏某种稀有动物，摊摊手跟我告别了。

他推荐的股票确实涨得不错，但在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后，几乎每支都“享受”了五个跌停板。要是当时我也跟着追进去的话，也许现在就没资格在这儿写书了。

在市场热火朝天的短炒中，我们越来越感到不妙，虽然指数还在涨，成交量依然在放大，但是有关管理层已举起了三道金牌，先是在市场上广泛进行风险教育，要求各券商、各媒介作好宣传；二是1996年12月9日证监会发出加强风险控制的通知；三是1996年12月14日公布涨跌停板制度。

在第一道金牌出现之后，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我们首先响应了号召，把各种零零碎碎的股票全部平了出去，空仓观望，尤其在12月1日那天，狠下决心帮所有的客户平仓，并把钱款还给他们，表示“金盆洗手”。

在第二道金牌出现后，市场居然不为所动，所有三线股依然报复性地疯涨，好像在和管理层较劲儿。惟有绩优股四平八稳，不涨反而有所下跌。这时我们终于沉不住气了，大量资金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留在场外实在是一种浪费，最后决定在 19.70 元的位置上重新买入发展股，一可以抵御风险，二可以享受高成长的利润，三可以免受踏空之虞。

我们是在 1996 年 6、7 月份抛售的深发展，资金跑到外面做了“五朵金花”的主升浪，现在回过头来再吃发展，虽然成本高了三元钱一股，但在“五朵金花”上我们至少有两倍以上的收益，想起来还挺成功。这个时候，这个价位买发展一定万无一失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买完深发展没几天，即 12 月 14 日，各大媒介就报道了中国证监会实施股票交易涨跌停板限幅为 10% 的通知，而在此之前的 12 月 13 日，许多股票在尾市出现巨量抛盘，投资者开始并不在意，因为在那疯狂的日子里股价经常出现强烈震荡，而且均是发生在个股身上，指数的升跌还不明显。12 月 14 日通知发布的当天，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正好在我那儿拍电视，大家忙着试镜头、录音，没来得及看盘面。中午吃饭时一看电脑屏幕我大吃一惊，一些君安证券所持有的股票，如武凤凰、大连冷冻、粤电力等一下子跌去了几元，莫不是君安证券在出货？为什么有这样的异常？

下午我非常想盯盘仔仔细细观察，但中央电视台还要来拍片，根本无暇顾及。我一边拍片一边与周围的人交流看法，我认为涨跌幅限制对市场不形成决定性打击，因为这种限制涨时限涨，跌时限跌，只是一把双刃剑，是一种调控的工具，尚不足以扭转股市本身的趋势。记者们大部分也持以上看法。我的

来自北京的声音 ◎

心里反而踏实了，当天下午一股未买，一股未卖，按兵不动。

第二天是星期六，根据和国家广电部签定的合同，我必须去北京华夏证券录像，这是全国第一部股票技术讲座的录像，我做第一盘录像带，足足讲了一整天。周日，我必须参加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大型股评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了上海的文兴、瀚民和北京的股评家一同上台演讲，我和深国投的一位研究员是深圳方面的代表。那一周的日程表每一天都是排满了的（这大概也是牛市到顶的迹象吧？），头脑里塞满了乱哄哄的杂事。在演讲会上，深圳和上海的股评家认为大势并未发生决定性的转折，虽然管理层已发出三道金牌，也只是要市场降温，抑制投机而已。惟有最后一位北京的股评家一上台就说：明天股市要大跌，大家一开市就坚决卖出，不要犹豫，不要放过最后的机会！

他的话刚讲完，全场轰动，许多人一下子站起来，想看看这小子的模样。开始我也和听众一样，认为这青年人想哗众取宠，叫人刮目相看。事后才知这一讲话绝非空穴来风，这位年轻的股评家已得到某方面的信息，怪不得说北京人政治觉悟高呢。

晚上，几位北京的客户硬邀我去吃饭，来到北京热闹的燕莎饭店，不知吃哪种菜式才好，到处都是人头攒动，大概股市上赚了钱，消费者出手都很阔绰。

我看了看，说：还是简单点，吃西餐吧。

我们移师西餐厅，一行六人要了一张长台。刚上完头盘，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手机响了起来，深圳公司里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说：安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股市明天要大跌！

这儿手机刚刚放下，客户们手里的 BP 机、手机此起彼伏，传来的消息全部一致，面对丰盛的西式大餐谁也无心进食，一个个呆若木鸡。特别是我在北京的这些客户，有几位刚刚入市，投入资金较大，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利空毫无经验，更无准备。看着他们灰头土脸的样子和刚才神采飞扬的神情判若两人，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说：“吃饭，吃饭！哪怕明天枪毙，今天先睡一觉，肚子总要喂饱的！”

几个平时食欲特旺的男子汉实在吃不下去，等我慢条斯理地把饭吃完（其实我也不知这顿饭是啥滋味），匆匆结账，赶回宾馆去看电视。

回到我下榻的客房，中央电视台正在一遍遍地播放《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最近的股票市场充斥着投机之风，已经丧失了理性，应该教育投资者，刹住歪风，树立正气，并列举了国外市场过分投机之后造成的种种后果，最主要的是文章提出，目前中国的股市二十倍市盈率才较为合理。

如此对照，当时深沪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已在四十倍之上，股票下跌空间大得很！这已是明摆着的了。管理层也适时推出 1997 年发行 100 亿新股的措施，而 1995 年到 1996 年只发了 50 个亿的新股额度。

最大的利空终于横空出世。我们曾经做过多种预测，但股市确实是测不准的，就像当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国债期

货交易最大的利空是关闭市场，而今天最大的利空是舆论反击！而且是来自中央和政府的指导意见。

只有到这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证券市场的风险有多大，因为有许多因素你预先是根本无法设想的。就像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 年的特大洪水，哪位先知先觉曾经预测到？数浪也好，易经也罢，还有所谓江恩理论、螺旋历法，其实都是事后对股价运动的评论和解释，无人能够测算出某些特殊事件对股市的刺激，力度有多大，发生在何日何时何刻？这永远是一个谜，正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人知晓，所以对所有的人才有吸引力，有诱惑。如果每个人都能知晓自己的一生怎么走法，什么时候去死，那么生活本身就没有意思了，更加不需要求助于算命先生。正因为如此，预测行情的股评家是不可或缺的。

我把这个道理向在座的客户讲了讲，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喂镇静剂。

客户们神情呆板，他们最关心的是——明天怎么办？

“很简单，打在跌停板上全面出货！”我的回答用北京话说“崩儿脆”。

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都瞪得铜铃般大，茫然地看着我，“有那么严重吗？”“至于吗？”一对夫妇同时发问。

“我想会有三个跌停板。”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脸部肌肉也是麻木的，在座的谁也难逃厄运，但我必须说出真相。

这时，有一位帮我们公司翻译索罗斯文稿的工程师挺沉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着，因为他从未买过一股股票，不管我怎么劝说，他就是不碰这玩意儿。他倒很镇定地说：我认为你们不用害怕，股市经过这一次挫折会好起来的，中央政府也不是要把股市打下去，只是要刹一刹过于投机之风。索罗斯最喜欢寻找大市转折的契机，我认为这一次还不是真正的牛市转熊市的“契机”。

“是的，我承认这依然只是外部力量，关键是风暴来临之际我们如何最大程度地减轻损失？这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最具体的。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今晚早点睡，明天一早赶到证券部下单卖出才是最要紧的。”我毫无余地地总结道。

好说歹说才把我那些惊慌失措的客户送了出去。

回房后我立即给陈宁打电话，他跑到山西五台山拜佛去了，直到晚上十二点才能联络上。

在五台山求神是很灵验的，据说毛主席进北京城前也请五台山的和尚算了一卦，结果只有四个数字：8341。后来这数字演绎为一段又一段的神话，直至载着 8341 号码的纪念手表放在一个卫星内上天后又神秘地消失，等等。

也许已经和“佛”联络上了，陈宁听完电话之后倒很镇静，我们俩谁也无法赶在早上开市前回深圳，只能请家里的交易员下单。

此时已是深夜一点，我给深圳公司人员打电话，首先请他们通知所有的客户第二天早上不计成本抛出，同时通知下单员，在证券部九点钟开机后将所有股票全部挂在跌停板上卖出。

交易员很努力，所有的卖单从早晨 9 点一直下到 9 点 30 分全部挂出，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开始挂出的全是零碎的，数量不大的小股票，最后一单才是几百万股的深发展，本末倒置，次序颠倒。

当然，这不能怪他，我事先没有通知详细，而且人在慌乱中是很容易出错的。

值得表扬的是为高级会员服务的客户经理，那天晚上他们一直打电话至深夜三四点钟，许多高级会员还在睡梦中，根本不知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这回事，叫醒之后才哇哇乱叫。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 12 月 17 日，我跑到中央电视台去看行情，我们所挂出的股票中仅有一单成交，好像是亚通，成交十几万股，其余全部白搭。因为一早开盘，指数便先下跌 7.8%，最终以 9.8% 的跌幅收市，几乎所有的股票全部跌停板，这时我才恍然悟到：12 月 14 日管理层为什么要推出涨跌停板制度，原来预防在先的了，可惜我当时竟这么茫然无知，这么大意！

第二天等待我们的依然是全部的跌停板，第三天有个别股票打开跌停板，它们是四川长虹、深发展、天津磁卡，这时我和陈宁已回到深圳，酝酿如何反败为胜，扭亏为盈。

几天的下跌使我们的总市值已跌去三分之一，亏损巨大，局面十分严峻……

二十二、高位套牢 低位换股

美国投资大师索罗斯有一句名言：“如果你自认为成功，那么，你将会葬送使你成功的机会。一个人必须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勇于接受痛苦。相反，如果你犯了错误不承认，知错不改，不愿接受痛苦，甚至不再感到犯错误的痛苦，那么，你将会再犯错误，从而葬送胜利的优势。”

仔细体会这段名言，使我对自己在1996年度岁末所犯的错误刻骨铭心，即使在4月至12月一路顺风的投资生涯中评价尚可，但在12月顺利从深股转向沪股后片面认为沪股安全空间大，下跌的幅度有限，在消息面上多次吹冷风后仍持股不放，导致两个跌停板的遭遇，应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虽然最终顺利出局，但在操作上仍犯了高位持仓的错误，是政治性、政策性不强的后果。要改正这刻骨铭心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

然而收获更加巨大。说起来，这一跨年度的投资主要是依靠低位换股而获得成功。

在深圳股市成分指数 4200 点以上，我和负责操盘的总经理陈宁已经一再互相提醒：深股风险巨大，应尽快考虑脱身。为了避险我们不约而同地转向上海的 07 板块，卖掉了深圳的所有股票，只留下金融股深发展。自以为是万无一失，进可攻，退可守。然而，大谬也！

由于政治性不强，对以后出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及伴之而生的涨跌停板制度毫无准备，当时我在北京，陈宁在山西，虽然在周一（12 月 16 日）嘱咐交易员以跌停板全部挂出，但已无济于事，错过了第一个亏损 10% 就平仓的机会，此时的账面亏损每天都以 10% 的速度在无情扩大，虽然心急如焚，但也只能冷静面对。美国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曾经说过：“假如你不能在亏损了一半本金之后，仍能从容不迫地规划或执行计划，那么你不适合做股票投资。”

这时，我对陈宁说，考验我们能否成为股票投资家的时机终于来了。我们一致认为：沪股会出现三个跌停板，深股则会出现四个跌停板，这将是本次下跌的极限，而有些股票居然出现了六个跌停板，这对于垃圾股而言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没有一只垃圾股，但是我们必须忍受 30% 以上的亏损，这对于一笔基数渐大的资金来讲是痛苦的，主要我们还有些客户也套在其中，有的打电话来甚至痛哭流涕。

如何改变这一被动而难堪的局面？经过两天彻夜的思索，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我们终于决定：低位换股。

虽然手中的股票包括深发展这样的绩优股都已出现两个跌停板，由买入价格 19 元跌至 15 元，亏损达 20% 以上。但也有些业绩甚好的股票已出现了三个以上的跌停板，为了弥补亏损，惟一的办法是换入比深发展和上海 07 板块更好的绩优股，以壮士断臂换取今后的上升空间。要忍受这一亏损并在低位换股，心理压力挺大，换得不好会“驼子摔跟头——两头不着道”。但是作为主动型的投资者必须忍受这一风险来弥补持仓下跌的更大风险。

此时，我们平时积累的个股资料产生了巨大作用，我们心仪已久，但因价位过高而不敢介入的海南股“琼民源”以最大的清晰度显示出来，这只股票在短短的几天中由 24 元跌至 14 元，跌幅达 41%，是发展股跌幅的 2 倍！如果它在 1996、1997 年的业绩好于深发展的话，那么在中位卖深发展，而在低位建仓买琼民源将是获利 20% 以上的好主意，至少能把发展股上的亏损全部拿回来。这一念头使我们分外激动而充满渴望。

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非常惊心动魄。琼民源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一直是只交投活跃、股价异常坚挺的股票。从 10 月份至 12 月份，尽管其它绩优股不涨反跌，但它一直顽强攀升，市场主力吸筹现象十分明显。12 月 11 日它以 22.78 元收市，最高价直冲至 24 元。但在 12 月 12 日开始它就灵敏地抢先下跌，所谓一叶知秋，大势不妙从琼民源身上已见微知著。这天最低跌至 21.50 元，13 日再度下跌，以 20.80 元

收市，可见持有琼民源的机构非等闲之辈。

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后，它出现了三个跌停板，就在第三天出现顽强的反弹，成交量放大十倍，扩大至一千五百万股。在这一天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居然使这只股票收出阳线，这在当时的个股中是极少见的。第四天继续出现下跌，成交量缩至九百万股，我们一直在耐心等待最佳入市时机，准备等股价再度平稳之后徐徐介入，这时千万心急不得，要像一名老练的猎手等待猎物精疲力竭时才出击——因为它是一个庞然大物，流通盘已达1.8亿股。第五天，时机终于成熟了。一早琼民源在大盘下跌的惯性带动下出现了第四个跌停板，但成交量已明显萎缩，下午一时开盘以后我们率先打入二十万股，这二十万股如同一声进军号令，带动买盘陆续出现，原来还有与我们抱同样想法的人在等待这天赐良机，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正从多个地点在诺曼底登陆。至下午一点多钟琼民源的跌停板被打开了，在此情况下，因差价仅一两分钱，我们继续顽强吸纳，十万股、五万股，十五万股鱼贯而入。

由于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琼民源的套牢者一看下面有接盘，纷纷争先恐后抛出，于是再度出现跌停板。我们意识到琼民源的上升空间巨大，我们的计划利润是20%—30%，也就不在乎几分钱，继续奋勇接盘，就这样三次打开跌停板，又三次封在跌停板14元上，最后收市前以微弱的14.07元报收。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建仓任务。本来准备三天的计划结果一天便完成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少有的，但在三次跌停板后三次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冒死冲入，这种勇气也是罕见的。

第二天琼民源便以一条带下影线的锤头阳线收市，从此后一马平川地连升七条阳线，股价从 14 元升至 19.80 元，被当时极度低迷恐慌的市场认为是一个奇迹。

周日的报纸杂志几乎没有一家不在谈论琼民源，股民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琼民源。

稍事休整之后，琼民源成为当时股市的龙头，股价一路高涨，于 1 月 22 日直达 24 元收盘，最高曾瞬间冲至 26.40 元，与 14 元相比已有整整 12 元以上的盈利，升幅高达五成，全国股民都被这一奇迹而陶醉，我们也在其中。

17 元出深发展，14 元买琼民源，顺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像当年红军从江西根据地转战延安，我和我的客户终于都松了一口气。

琼民源被我们打开跌停板如雨后春笋节节拔高，成为一月份涨幅居前列的股票。市场已有许多人对这只股票抱有兴趣，有些是较大的机构，再加上年初《中国证券报》等指定刊物大幅刊登了 1996 年苏物贸、琼民源、四川长虹等股票业绩大幅增长的报道（大概也是为了挽救股市过于下跌的颓势），终于被全国人民认同。值得回味的是当时的苏物贸也有十分惊人的表现，但到 1997 年就市况日下。

一月份深圳指数仍在 3200 点中位盘桓，我们的市值又回到了 4500 点以上，三个跌停板的亏损全拿了回来。我蛮有把握地为此作评：“股票市场就是这么一个产生奇迹和神话的地

方，关键在于如何去把握。”

“现在回想这惊心动魄的一周，回想起我们在这一周内的表现，我觉得自己仍可宽慰。”

要是有人问我：“你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我会回答他：“一部分还是，一部分不！”

为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认识还在深化，最主要的是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原因大家都知道，琼民源公开刊登的财务报表居然是虚假的，它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处罚，直至入秉最高人民法院。琼民源董事长马玉和现在已成阶下囚。

1997年春节前琼民源是最早刊登1996年年度报表的上市公司，该公司在报表中披露1996年每股业绩税后可达0.867元，比1995年主营业务增长361%，利润增长849倍，净利润增长1291倍。对于如此的超高速增长，公告书说“实现超常突破性增长的原因是投资北京的战略决策获得巨大成功”。对于这一点，媒介及专业证券公司都予以高度赞扬。公司同时推出了10送9.8股的分红方案（其中10送7红股，资本公积金转赠2.8股），成为首家推出分红方案的上市公司。

该公告在1997年1月22日见报，当时市场仍然低迷，投资者的态度尚未从急跌中平定下来，琼民源优厚的利润和分红方案成为市场热点，每个投资者包括机构都是依赖公开信息进行投资，谁会想到这其中也有诈骗？！也许正是我们太幼稚了！而发展中的中国股市不规范之处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的多！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琼民源在北京建造的民源大厦据公告称前景十分诱人，为了实地考察，我们前后去了两次，第一次没找到，找了记者开车去找也不知在哪里。第二次找到了，还实地拍了照回来，确有其事。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大胆投资，敢下重仓。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一直未直接见到琼民源公司方面的代表，对方不是推说工作忙，就是电话无人接，这也是严重疏漏的地方，值得作为重大教训记取。

“不见兔子不撒鹰”，这虽然只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但在股市中又何尝不是至理名言？审视琼民源的建仓过程，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是不充分的。

1997年2月28日琼民源在海口市举行股东大会，讨论1996年度业绩报告和分红方案，上海方面我们有一位客户自告奋勇去参加大会，公司本部也准备派人前往参加会议，以进一步落实该公司的发展前景。

二十三、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恰在这一段时间，报刊上不断有人撰稿对琼民源的暴利质疑，并因此展开了讨论。尽管琼民源董事会振振有辞，也在报纸上作出解释，但这些文章似有欲盖弥彰之嫌，使人疑虑加重。

这些文章也引起了管理层的密切注意，市场传闻北京方面对琼民源的分红方案不予批准，同时对它的高成长也表示怀疑，有可能进行全面调查。

2月1日应深交所要求，琼民源刊发1996年报补充公告，从公告中看出，琼民源的业绩似乎并无问题。中国证监会是否还会作出进一步的监管？

我们作了种种猜测，我认为有两种可能：先作出中性姿态——开展全面调查，重点在财务方面。结果，不出所料。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调查的结果无非有两种，一种对琼民源有利，一种对琼民源不利，而我们持有琼民源的股票；如果有利，股票价格将会疯涨；如果不利，其价格当然惨跌。后果是如此对立，简直水火不相容。

作为一个决策者，必须做出明确的决断。

没有来得及让我们作出结论，2月26日琼民源出现了一根带下影的阴线，股价在冲至26元以上后一路回落，至25.21元收盘，当天走势意味深长。

2月27日琼民源以24.80元低开，盘口出现了汹涌的抛盘，有些是二十万，甚至是四十万的大单。市场还没来得及反应，瞬间每股已跌去二元。琼民源在那段时间是市场的大热门，28日那天更成为万众瞩目的股票。整个证券部的人，无论大户散户都在看琼民源的“跳水表演”，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

即便琼民源出现大幅震荡，但下档支撑极强，仿佛为了和空头唱对台戏，下方不断出现二十万、三十万的大买盘，把卖盘一口吃掉。过瘾，确实过瘾！我也忍不住在22.80元的次低价再吃进两万股琼民源，这时候的人脑子有点发昏，完全被盘面上大进大出和市场内人声鼎沸的气氛搞乱了头绪，所以情不自禁地加入了抢反弹的队伍。果真，琼民源从22.70元的最低价一下子又回到了24元以上，场内一片欢腾，我的“短线”也赚了块把钱。

反弹之后盘口又出现了坚决的义无反顾的抛盘，我赶紧打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

电话到海南，打听琼民源有没有出事？公司的人员回答说：有可能会修改分红方案和利润报表，把十送 9.8 改为十送八，把每股 0.876 元利润减至 0.65 元利润，但消息无法证实。

在这个时候，我强迫自己的脑子镇定下来，静心思考如果出现这一改动，琼民源的命运会如何？——市场的第一反应会是下跌，虽则是些小的修改，但与市场预期不符，一些获利盘会首先夺路而逃，如果比传说的还坏，那么市场又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我不敢想象下去了。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句话特别清晰地展现在我脑海里，潜在的危险正在逼近。现在持有琼民源，上涨的空间有限，然而下跌的风险已远远超过其盈利。

中午休息时，我立即召集公司员工和客户经理开会，把琼民源的这一情况及我们的判断告诉大家，并让他们分头通知客户，让客户自己做出决定，切切不可延迟！

以上决定和午间的紧急会议使我们的许多客户免于厄运，但也有不少人仍沉醉于琼民源不死的神话中，那天没有出局，最后一套两年。

我们自己的账户除了那天抢反弹建仓的部位当天不能 T+0 出局外，大部分安然撤退，并未受到伤筋动骨的损失。

所以，后来有许多好心人问我：安妮，你的琼民源套牢了一大把吧！

我只能遗憾地说：“是的，还有两万股。”其实这与我们以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前的持仓相比，仅为一个零头，也算是作纪念吧。

1997年2月28日，琼民源股票停牌，市场大哗。没有跑出局的投资者懊悔不迭。3月1日，琼民源公司公告：股东大会延期举行，公司股票将于3月3日下午复牌。

琼民源在海口召开的股东大会非常热闹，可能比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任何一届股东大会都更有戏剧性。

首先是董事长马玉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总结了公司辉煌的超常发展和优异的业绩，展望1997年将进入高速增长期，同时将在房地产及通讯领域大展拳脚，尤其是在北京收购的凯奇BP机公司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财务部门也出具了1996年度的报告。这些材料当天晚上全部传真过来，使我们看了分外振奋。我深深为自己找到这么一匹一日千里的黑马而庆幸，如果正如董事会所言，那么琼民源的利润即便大量送红股之后也不会稀释，预计仍在一元左右。当时24元的琼民源不是股价太高而是太低了，至少还有100%的涨幅，因为除权后即便填权至24元，也仅二十多倍市盈率，仍符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提出的标准。

正是在此背景下，琼民源董事会成员草拟了一封给中国证监会的公开信，对管理层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和抗议，并在股东大会上传阅（股东大会群情激奋，股东们见自己利益可能受损，纷纷发表意见表示拥护）。

这封公开信如实地传真到我们公司，当时看到之后我的头脑“轰”地响了一下，内心深感不安。

多年政治运动的经验告诉我，琼民源这只股票有可能捅大漏子，因为这家公司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证监会，同时又将矛盾公开化、扩大化，使自己无退路可走，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关照交易员每天密切注意琼民源的走势，并和海南的公司员工取得联络，要他尽快查清琼民源这封公开信的背景和后果。

海南方面的信息很快反馈回来，原来马玉和是个个性很强的人，恃才自傲，想通过股东大会向管理层施压，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面子。他当时在股东大会上表态：“我宁愿得罪上头，也决不得罪股东。”似乎便是最好的诠释。董事会方面口气硬，一再表白在财务上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他们来检查！最后，董事会提出辞职，大会未提出任何决议，股票也未能如期复牌。这在中国股票史上是空前的一例。

琼民源这只股票后面的命运已经众所周知，它被停牌、停牌、继续停牌，终于到了1998年12月才出现了该公司被北京住宅开发建设集团接管的消息，北住集团将负责行使琼民源第一大股东（持有琼民源38.92%股权）的权利。1999年1月5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的决议。

在此之后，琼民源前董事长马玉和及财务总监因伪造财务数据触犯刑律，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及两年。

琼民源的事情在写这本书时已尘埃落定，下一步只是新的大股东北京住宅开发建设集团如何重振旗鼓进行操作的问题了。沸沸扬扬的琼民源折腾了中国的投资者整整两年，许多人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为它寝食不安，牵肠挂肚已足足 700 多个日日夜夜，如按其流通股本 1.87 亿股计算，全国所套牢的资金高达 43 亿，这其中有许多是散户的钱，而且是高位追入的，虽然说“股市风险自行承担”，但作为中国股市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桩财务报表诈骗案，它给人的教训确实是深刻的。

不管是投资者、上市公司还是管理层，落实到我们这些曾经做过咨询或者还在继续做证券咨询的人士头上，虽然我们和琼民源没有任何内幕交易，也不认识他们任何人，一切都是靠公开信息进行推荐，但这么多人被套牢了没有出来，难道我们能够保持心灵安宁吗？

证券咨询责任重大，犹如医生开刀，一刀不慎就可能送了人命，而且有时候并非医术不高明，而是出在消毒、麻醉、氧气、器械、药物等其他问题上，可谓防不胜防。在这方面我越来越觉得不堪重负。

犹如外科医生不肯为亲人动手术，对我最亲密的亲朋好友，我一般都不建议他们炒股票，尤其不想为他们推荐个股，因为亏损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可以用等待、换股或斩仓从容应付；但他们不是职业投资者，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对我的期望又过高，往往容易吃套或操作失误，又不知道改正。这个时候我就会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深感不安。我现在选择了新的道路，可以为亲朋好友理财，但决不支持他们亲自下战场，这也是我成立投资管理公司的由来。

最近的例子，就是我的堂姐。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

堂姐因为从小有病，每周都要去苏州做治疗，父母对她比较呵护，她也十分听话，向来是一个“乖囡”的角色，而我的叛逆性就比她大得多。

选择中学的时候，她听从父母的教导进了女子中学，而我摆脱父母的影响征求辅导员的意见进了全市最好的男女混合中学。这所中学因为招不到女生，有的班干脆全是男生，称为“和尚班”。从此姐妹俩的生活道路拉开了距离。

文革中我一马当先成了红卫兵，用造反精神影响全家，使本来是铁杆保守派的父亲、母亲、堂姐最后全部反戈一击，跟我走上不归之路。其结果当然十分严重，他们三人全被关起来进了学习班。惟有我当时年龄太小（才16岁），工宣队开办的学习班才未把我收编进去。漫长的冬季里我一个人给他们送衣物，回来独自睡在床上蒙头大哭，我觉得自己害了他们，还逍遥法外，真不是东西！

总之，我走到哪里不是“害群之马”，就是精神领袖。在小学里是大队长，在中学是班长，初二时学校就找我谈话让我准备接学生会主席的班，领导全校95%的男生和5%的女生。文革中居然代表一个城市的造反派赴京告状，当时我才十五岁。武斗中还保护过一批老干部，领着他们东躲西藏，避开对立面的迫害等等，等等。我常常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好好干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别人。

这种性格的我，一旦当起投资咨询公司的董事长，怎么能不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呢？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我堂姐原来是一家公司的经理，经济宏观调控以来，她的业务很清淡，我劝她不妨改行做股票，反正有我教她。

她是1996年12月份入市的，入市的第一只股票就是跟我买了深发展，每股19元，这里面还有他人的钱。我想，对于初入市的堂姐而言，买发展是最好的选择，既不会套住她，又能培养心态。

没想到才买一周就碰上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展跌至17元时她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守，别卖！”我自己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壮士断臂，低位换股，但我的堂姐是没有这种承受力的，我也不敢给她这种建议，因为她才入股市十天，完全是一个“婴儿”。

没想到几天后她就打电话过来说：她把发展卖掉了，是在第三个跌停板上卖出的，才15元。

我一听，气得声音都变哑了：怎么回事？谁叫你卖的？

堂姐在电话那头说：“我做得真臭！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惨，每天跌停板，三天就跌了30%，我一辈子还没赚到那么多钱呢，把妈的钱都亏进去了，叫我怎么办？”她一边哭一边检讨。

我一下子原谅了她，一个新手要承受股市上的这种打击确实是不容易的，有些白酒能喝一斤的东北大汉在这次跌市中还哭得像个泪人呢？何况她这么个弱女子？

既然已经卖出也不必责怪，我让她在目前的位置赶快换入琼民源，当时才17元多，堂姐没有及时告诉我她的情况，已

错过了一些时机，但还来得及。

这次她非常听话，不顾别人的反对坚决买入琼民源，但在2月27日大震荡那天，我打电话告诉她琼民源情况有变，最好要卖出时，她一再犹豫，一遍遍地问我：真的要卖吗？

我重复了两次：最好是卖出。

结果她总算卖了一半，一半未卖的套牢到今天。

虽然在1997年她的成绩好转，获得了50%的收益，但到1998年市道反复时仅仅只打了个平手，这比一般新入市的投资者已经好多了，基本上可以说成绩优秀，但是那些凭我们的传真、电话、文章辅导的客户又怎么可能那样熟悉我的思路，那么紧紧尾随，最后取得骄人的业绩呢？

师傅引进门，修行靠自身，能不能在这个市场上获胜并且长期生存，还得靠自己的修炼，靠自己的造化！这一点恰是散户忽视的。

然而，以上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关键在于从1991年到1997年中国股市的规模尚小，股票仍处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往往需求大于供应量。1997年管理层推出新股300亿的额度以来，大量新股的上市使市场的资金面越来越捉襟见肘，指数的上落也越来越吃力。中国股市正由需求型转向理性选择型，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大批散户小民难以适应这种新局面，而大量咨询机构还在以老办法，如技术分析、指数数浪、消息传闻等引导股民，其效果也就每况愈下。这时候我们公司从证券投资咨询转向企业管理咨询和企业诊断，力图从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企业体制：文化、战略、品牌、营销等诸方面去探求它的活力和成长性，以便寻找真正值得投资的股票，这将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

有一位上市公司老总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市场并不在意你在顶峰阶段多么风光，逗留的时间有多长，市场只关注你从顶峰跌落下来之后反弹能有多高。

确实，随着现代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新陈代谢之快是以前物质经济阶段所不能比拟的，企业在竞争中为了不被打跨，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尤其要提前预备突发情况出现后的应急方案，即便像美国微软这样的企业，其总裁盖茨也一再告诫自己的员工：“微软随时有可能在半年中倒闭。”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迫使许多有远见的企业家为公司订出长远的五年规划，甚至更长的十年规划，这样才产生了像美国通用电器这样优秀的百年企业。

一方面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一方面是危墙如果轰然倒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于我们这个投资咨询公司的前景和后期操作，我越来越感到忧心忡忡，因为某些市场或政策风险确实不是我们所能预测和承担的，随着各种媒体、各大券商进入咨询行业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大，作为民营的咨询企业，经营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并保持个性品牌，这已成为我经常思虑的问题。

也许，办公司最大的乐趣也就是如何把压力变动力吧！我常常以此自慰。

二十四、马背上的“牛仔”

1997年2月19日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和伟大领袖邓小平同志逝世，举国哀悼，十二亿人民在心中向这位划时代的伟人致敬。

这消息是在深夜播出的，顷刻之间传遍神州大地，我也是在午夜被电话及手机声叫醒。噩耗传来，黑暗里我徘徊了几圈，静立，向北方默哀。这消息来得并不意外，但对一下子失去这位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内心里还是觉得十分突然。春节之前社会上已流传小平同志身体欠佳，报纸上也曾见到他在病房的报道。一重久久挥不去的阴霾时刻笼罩着投资者的心，全国人民都仿佛生活在凝固的空气中。我们考虑再三，在春节前全部清仓离场，以免噩耗传来市场急跌。春节后扬州和南京方面邀请我去开讲座，我都是建议投资者：“空仓以待，掌握主动”。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春节前后的股市果真一蹶不振，毫无起色，这与往年是大不一样的。

安妮公司每天早晨从 8:30 到 9:00 都有一个晨会，一是讨论大势，二是研究决策，三是推荐个股。晨会一般由公司总经理主持，最后由我负责拍板，信息部及高级会员俱乐部按照公司统一口径传达给自己的客户，不得走样。

在 2 月 19 日的晨会上，高级会员俱乐部的部长建议开一个追悼会悼念邓小平这位伟人，此时离开市时间仅半个小时，我看了一下腕表，说：“还是用实际行动追悼小平同志，擦一把眼泪，买一把股票，立即通知客户买入！”这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

一声令下，客户经理们立即各就各位，操起话机、手机纷纷与对方通话，我们公司有十部电话但仍然不够用，几乎每个客户经理都持有手机或 BP 机。客户们在听到这一操盘建议后几乎都有些犹豫，许多人估计当天开市所有的股票会跌停板，并且如 12 月 16 日评论员文章出现之后连续三个跌停板。为什么安妮公司要让大家买进？

事实上他们猜对了一半，当天开市后两地指数果真跳低开盘，连发展、长虹这样的龙头股都抛在地板价上，且不说其它股票了，市场重演了 1996 年 12 月 17 日的那一幕。也许噩梦太可怕了，许多人尤其是散户迫不及待地抛售股票，其实这时主要只是一种心理压力，市场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空。中国的政局很稳定，经济也走在快速道上，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已运

马背上的“牛仔”◎

行了几年，成绩卓著。但脆弱的投资者往往经不起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市场气氛，慌乱中作出错误决定。现在与12月17日最大的不同是股价在低位而不是高位。

我嘱咐交易员迅速入场扫货，“天有不测风云”，我们所在的证券部那天的电脑设备居然坏了，一部机都操作不了，连行情都看不到。客户们急得哇哇乱叫，我们一边等待维修一边和其他证券部联络，以便及时了解行情。

十点钟以后发展及长虹率先打开跌停板，开始有些买盘羞羞答答地进入市场，后来越来越多，我们多么想在此时下单，空仓多日等的就是这一刻！“屋漏偏逢连夜雨”，证券部的电脑还在“罢工”，当时恨得我直想把电脑们“解雇”了！

一直等到十点半，隔壁的客户“噢”的一声叫了起来，电脑总算启动了，这时发展与长虹已经翻成了阳线，遗憾！错过了一次跌停板建大仓的机会，时间不等人，立即输单还来得及。这时我们被迫实施第二方案——全线买入新大洲！

为了等待这一天利空的到来，我们预备了A、B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即在跌停板上大量买入发展与长虹直到满仓。如果情况有变即实施第二套方案，购入经调查论证1996年业绩优异的新大洲。这只股票的调研我先生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他在《海南日报》上发现一则有关新大洲的报道，上面写明该公司业绩有大幅度增长，出口及内销两旺，品种增加等等。后来他又根据报道去参加了1997年新大洲摩托车产品的订货会，亲眼看到订单爆满，甚至许多单位当场付款，订货量是

◎ 安妮投资生涯路

1996 年的两倍有余。他把消息反馈回来，我们根据平时掌握的资料加以核对，发现新大洲极可能成为 1997 年的明星，于是决定买入。

无奈那天已错过最好的入货时机，只能在大盘已经还阳的情况下逐步建仓。新大洲流通盘不是太大，所以当天没有完成建仓任务，直至两三天后才全部买完，成本稍高。但我们还是比较满意。亲身经历过这场“快仗”以后，我们才明白事先制订好周密的作战方案有多么重要，如果不是有 A、B 两套方案选择的话，我们势必只能在发展、长虹上打高建仓，事实证明它的最后效果远远不及新大洲。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证券市场确实是机会大把的地方，错过了再好的机会也不要懊悔与抱怨，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你总能找到下一个更好的机会。

我们的客户见市场在当天收市前企稳，个个如吃了豹子胆一样，第二天大胆入市，根据我们的建议买入新大洲和其它股票。这只股票在两个月中升幅惊人，上市公司不久推出十送十的方案，除权又填权，累积升幅超过 100%。大家心满意足，共同感谢新一届领导人治国有方，新年以后便给全国投资者发了一个“大红包”。

其实，当时股市上扬股民赚钱的意义还在其次，股市是信心的体现，主要通过这一点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前程是美好的，全国人民对新一届的领导人充满了信赖。每个能吃透这一“大势”的人自然也就赚了“大钱”。然而，对

马背上的“牛仔”◎

这一点没有思想准备，理解错误的人甚至还亏了“大钱”。他们的毛病主要是对这一波行情的重大意义缺乏认识，政治上过于谨慎和保守，忽视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一贯性才是最重要的；技术上对股票在低位区的上涨动力缺乏判别，尤其在超卖之后把这波行情仅当作一波小反弹；心理上则不敢“有风驶得帆船尽”，在牛市中不敢做马背上的“牛仔”。

所有这些问题的焦点便是：对于趋势的确认，即 12 月 16 日的评论员文章及邓小平同志的逝世是否已改变了原来的牛市大趋势？

我们的结论是：由于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向好，评论员的文章意在抑制投机而非打压市场；邓小平同志的逝世只是个别领导人的退出，不能改变引发 1996 年牛市的主要因素，尤其不能改变因降息和银根松动之后大部分上市公司生产出现转机这一基本事实。

基于以上情况，我在 3 月 11 日发表了《走在曲线前面》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投资者一定的震动，现在还有不少人提到它。

当时的深沪两地股市中，许多证券公司包括咨询公司仍然靠预测股市的点位进行投资或引导投资，但我认为在世界股市史上获得成功的无一例外是选股专家，而非数浪专家。因为股市的曲线波动是无法预测的，不如放弃预测市场上升和下跌的时间和点位，坚定地抓住市场的趋势，找出趋势转变的契机，而不是随波逐流。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投资家索罗斯在这方面有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市场有连贯性与不连贯性，当市场是连贯的时候，你可以顺从它的趋势，继续观察和耐心等待；当市场出现不连贯性之际，便是你大展拳脚之时，应当抓住转变的契机，重锤出击以求大胜。

形成曲线转折的原因是事物的内部规律，只有当内因发生深刻变化之时，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而外部因素仅是促成曲线的波动可以不加理会。

邓小平同志的逝世便是促成曲线外在波动的最好例子，造成我国股市波动的内在因素只要不变，深沪两地股市的曲线运动仍将向上。

至于个股运动的曲线，决定其上升或下跌趋势的是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产品前景和管理水平，而非市场投机者的买进与卖出。对于个股暂时的波动可以不予理会，相反应着力研究上市公司的销售和技术创新、资产重组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找出其经营转变的契机。

所以我认为：技术指标只研究了市场曲线运动的表面现象，而基本分析才研究了市场曲线运动的内在实质。

个股相对于大市更容易把握，无论大势上升或下跌，选准个股永远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这几年的心得总结，所以也可以看出我已从技术指标派不知不觉变成了基本分析派。这一反叛是一大转折。

这个道理虽然我在公司内部反复讲，天天讲，但要让每个人接受，实际上还是非常困难，休说外面的客户了。

马背上的“牛仔”◎

市场的惯性力量太大了！中国的投资者从一开始就习惯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盘”操作，天天上班，没有了曲线的波动也就没有了刺激。他们很难想象巴菲特的办公室里怎么可能没有电脑终端，他的助手们又为什么不看行情。这叫什么做股票？中国人在证券市场的投资是以“炒”为主，不炒则不成方圆。

在我们重点推出新大洲这只股票后，较有代表性的是公司内两位客户经理。他们都刚从大学毕业两年，本来在机构内操盘，资金量在千万以上，慕名而来公司应聘。我很看重他们在证券市场一年以上的操盘经验，大胆录用，放手让其操作。当时还在1996年大牛市，交给他们操作的千万元资金，第一位亏损二百多万，第二位亏损一百多万，最终只能由我亲自接过来，通过两个月的操作填平亏损获得盈利后才告一段落。

对于此事他们应有较好的教训，但是许多人都非常容易重犯同一个错误。在我们公司推出新大洲这只股票后，他们反复叫客户做短线，赚几毛钱便跑，遇到较为剧烈的震荡甚至斩仓出局。我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严厉地在晨会上批评他们，小伙子虽然服气却不身体力行，还是我行我素，专门给客户推荐些道听途说的所谓“黑马”，以期填平亏损，闹得某些会员向我告状。经过了解才知道许多股票并非公司推出，无形中给公司声誉带来影响。他们两人也承受了来自客户亏损的心理压力。

“生铁不炼不成钢”，其中有位小伙子因而发奋读书，决心痛改前非。现在 he 已从一位“短线高手”、“消息灵通人士”变成一个长线买家和行业分析专家。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在 1998 年的市场上这位小伙子的出色表现连我都十分佩服。一只“长春兰宝”他居然拿了十个月，不管东南亚金融风浪的袭击还是八月洪水的冲击都巍然不动，最终获得了 80% 以上的收益，受到客户的好评。要在以前让他的股票持有一周都非常困难。事后他颇有感触地对我说：“我在公司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投资的‘理念’，这够我一辈子受用的！”

我们的客户发仔在这方面也极有感触，他觉得我们教会他最大的本领便是选股、选股、再选股。

看到年轻的一代在成长、在超越我们，我心里的喜悦比自己获得成功还要高兴。我常常为这些小伙子骄傲，中国的巴菲特以后就出在他们中间！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理念“理性投资，长期收益”的威力和影响，这八个大字将成为我终生的座右铭，也将成为安妮品牌的精髓。

二十五、九七香港回归

1997年三月份以后深沪两地股市一路上扬，深圳方面尤其出色，尽管媒介上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但深强沪弱的局面基本未变。这里最主要的因素便是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归祖国毕竟是本世纪末最大的题材。

为了等待这一天，中国人民忍受了百年耻辱，扬眉吐气的情绪需要找到出口宣泄。在香港，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都创出历史新高，国外资金蜂拥而入，中资机构大显身手，尤其是红筹股成为最抢手的股票。北京控股、上海实业的发行都创下超额认购的历史纪录，上市之后北京控股及上海实业升幅惊人，裹挟不少散户入场追捧。

影响到中国，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可谓热火朝天，尤其是房地产板块在1997年上半年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独

◎ 安妮投资生涯路

立行情”，与上海方面仍然十分疲弱的地产股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介绍过如何在高级投资俱乐部成立大会上推荐深振业，在这一轮地产股行情中它确实成了领头羊，如果一路持有的话，有 100% 以上的收益。在它的带动下，深深房、深星源、深物业、深金田都有大幅度的上升，但后面这些股票主要是市场炒作的因素，并没有实质性的业绩增长支持，所以后来的走势就不妙，也套牢了不少高位追进的投资者。

香港的回归使深圳港口概念一时红透半边天，深招港和深赤湾成为两大明星，对此我们一直持有异议，并发表文章进行论述。

香港的地产股上升本身有极大的泡沫成分，因为据我们的了解，不少外资尤其是英资机构纷纷出售物业以便套现，而一些中资机构盲目估计香港前景，大量在高位接进现货并在股市买入地产股，形成虚假繁荣。如果说香港的地产由于 1997 回归还有一些中资机构接盘的话，那么深圳在 1997 回归后桥头堡的作用将减弱，一些外省市办事处不是撤离就是干脆搬到香港办公，哪里会有什么新的买家？另外，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深圳在 1997 年由于前两年的房地产热潮所遗留的空置房至少在两万个单位以上，按照当时的进度要销售三到五年，楼价不是应该上升而是应该下调，何来超额利润？

对于港口股而言更加名不符实，由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原因，深招港和深赤湾近几年利润下降，仓储量降低 30%；香港的 1997 年回归使大陆口岸的前线由二线深圳延伸到香港一

线，这样的股票不应上升还应下跌才对。

我们的意见开始并没有受到市场的理会，但是我们坚持不变。这两大板块在短暂的繁荣之后终于归于沉寂，因为我们深信价值规律是不可逆转的！

当然，我们一直坚持以上观点，也有人与我们争论和唱对台戏，我嘱咐员工不要与之争锋，不要与之对垒，一切以事实说明问题。

如果说香港回归对深圳有好处的话，那么最大的受惠者应是深发展。当时深发展恰好被央行批准开展离岸业务，其外汇方面的收入将超过本币收入。对于这一点我还是十分乐观，所以始终认为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买入的发展股可以赚大钱，最终这只股票从19元一直跑到了40元以上。

在市场热烈的气氛中，许多从来不做股票的同学、朋友、亲戚都打电话来咨询，问我应该买什么？我觉得非常难以回答，一些市场上炒得过热的股票我不敢推荐，但冷门股同样没有把握，所以开给他们的“处方”几乎都是一样的：“不是买发展就是买长虹吧”，我想只有这两匹大黑马才不会把他们颠下来。

就是这样，结果也令人啼笑皆非，就像外国人所说的“你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些从未做过股票的“尝鲜者”大都尝到了套牢的滋味。

一般来说，他们总是在刚入市的时候战战兢兢，也就是在刚推荐的低位买入很少，然后这只股票越涨越高，他们便越买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越多，最后甚至借贷全军杀入，落得高位套牢的下场。这些朋友在上涨的时候是不打电话咨询的，直至跌去了 20% 到 30% 的时候才会心急如焚地追问：我该怎么办？

一波行情结束，如果这只股票还未来得及出局，应在亏损 7%—10% 的时候毅然抛售，但只有痛尝亏损滋味的股市老手才办得到，才下得了这样的狠心。而要叫新股民在行情结束时出局那简直是要了他的命，大部分人总是宁可套牢也决不斩仓。这下可好，在 1997 年 40 元以上买入的发展和长虹在 1998 年双双跌到 15 元附近，这就是 1997 年香港回归带给某些人的“跨世纪的礼物”。

既然绩优股都已升高，最后一波行情当然是垃圾股的“盛大节日”。

五月初以来深沪两地的股市重演 1996 年 12 月的火爆，涨停的股票每天有十几只，那光景似乎遍地黄金，只要你肯屈尊弯腰拾捡。两地成交量也屡创新高，甚至远远超过香港股市，令这个世界金融中心自叹弗如，这时，我都纳闷，到底是 1997 年香港回归还是深圳回归？在此背景下，管理层又连发三道禁牌，抑制过热的市场。

第一道禁牌：1997 年 5 月 10 日公布股票印花税由千分之三提高至千分之五。

第二道禁牌：1997 年 5 月 15 日公布 1997 年新股发行额度为 300 亿元。

第三道禁牌：1997 年 5 月 21 日传达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

公司炒作股票的通知。

在第一道禁牌出现后，深沪股市不为所动，继续惯性上扬。过了两天，即5月12日，上海方面到达本次牛市的最高点1510点，深圳方面到达本次牛市的颠峰6103点，值得注意的标志是，指数创历史新高时成交量已出现明显的下滑。随着第二、第三道禁牌的出世，买方力量遭到严厉打击，指数开始一路下挫，大牛市的多头情绪在此受到重创。

1997年5月22日央行出台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6月5日央行再次发布禁止银行违规资金流入股市的通知。6月13日管理层严肃处理深发展等一批机构和负责人，兰州查封十家期货公司。那段时间正是通知精神传达最多的日子，大概党中央又感觉到了股市过于投机的危险，决定给予严惩。

现在看来，利空的消息是如此明显，上头的精神写得明明白白，众多头就是不服，舆论界甚至迟迟未予配合，给头脑发热的市场多泼些凉水，一些股评家还在鼓噪“三浪三”，“大牛市赚大钱”等等。

这一次我们保持了充分的警觉，特别是汲取了1996年12月16日的教训，我反复在公司内部讲：像去年那种政治性不强的错误，作为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只能犯一次，不能犯第二次，因为实在犯不起，代价太大了！

然而，也要客观地看到，当时的市场十分诱人，即便指数已经滑落，但个股行情依然魅力十足，令人难以收手。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在这段时间里管理层为了抑制投机，向市场投放大量新股，4月份上市新股九只，5月份上市新股十五只，6月份上市新股二十一只，是新股上市最多的月份，平均每个交易日一只，创历年新股上市的最高纪录。回顾5、6月份的中国股市，与其说二级市场赚得多，不如说一级市场利润更可观。1997年全力以赴认购新股者利润在40%以上。觉察到这一趋势后，我们且战且退，再不恋槽。

由于资金较大，我们的股票边走边撤半个月之后才全部抛完，出货的过程使我想起一位股民对我感叹的话：买进容易，卖出太难，就像商品贸易进货便当，推销辛苦，要人家吃你的货是不容易的啊！这一次是非常彻底的清仓，在此之前很少这么做，斩草除根，一股不留！资金撤出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认购新股，同时走南闯北到各地参加存款认购新股。

从二级市场撤出后我们的心态很平和，虽然那时每天的盘面上还有许多活蹦乱跳的个股，但我对自己说：让别人去赚钱，多积点德。留一点利润给别人，自己才会在市场上活得更长久，千万不要把别人的成功当作自己的失败。“无欲则刚”，没有非份之想的人才是最强大的人。

从二级市场这波行情出来，我们检点行囊，盈利高达50%，6月份以后通过转入一级市场认购，利润率又达18%。从陕西到山西，从西藏到湖南，凡有新股认购的地方便有我们的身影，乘机放松身心，浏览祖国大好河山，享受大自然美丽的馈赠，这种馈赠是金钱不能比拟的。那段时间有些投资

者看到我们公司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上市公司十大股东之列，打电话来问：“这只股票是不是你们做庄？”大有跟庄之意。

我笑了。这些投资者太不了解我们，我们公司从来不做庄，持仓量大一些也只是一级市场存款认购的缘故罢了。切莫“与庄共舞”呀！

来到山西的五台山，易经协会的两位高手替我算了一卦，说我的运道是上上大吉：1991年开始走上成功之路，1996、1997年大发展，1998年调整，1999年以后又是一路上扬。听起来不像个人的命运，倒像股市行情似的，令我不得不猜测是否算命先生也炒股？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自己干到哪一年可以结束？我想知道自己终点在何时？这几年驰骋沙场实在太累了！

两位高人告诉我：“你要干到六十五岁！”

听到这个结论我张开嘴巴，半天回不过神来。就我原来的意愿，干到五十五岁，国家干部退休的年龄就已足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名吃皇粮的干部，怎么居然要到六十五岁？

两位高人微笑颌首：没错，这是你的命！

如此算来，我的投资三部曲才完成第一部，后面的路还长着呢。又该记住我的座右铭：“理性投资，长期收益”了。

我想起美国小镇上有这么一群老太婆，都在七八十岁的高龄，其投资成绩却远远超过华尔街的优秀基金经理人。我乐不可支地笑了，临走送给两位高人1800元现金大洋，喜得他们直点头直致谢，一再嘱咐：如果灵验，千万别忘了上五台山还愿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哟!

我连连应承：那是当然。

7月1日是香港回归的日子，举国庆贺，香港更是成了欢腾的海洋。许多深圳人这一天谢绝应酬，围坐家中收看百年难遇的良辰美景。而我当时则在外地出差，吃饭时东道主打开电视机让我们一起欣赏盛景难再的电视录像。看着那一簇簇的礼花在天空怒放，又星星点点地洒落人间，飘散在海面，我仿佛看到了股市上那些被炒得过高又跌落到地上的股票。当你面对星光灿烂的夜空时，你一定要记住明日太阳出来时你将面对真实的世界。在香港回归之夜像我这样轻松地收看录像的投资者也许并不多，许多人心里甚至是苦涩的，包括香港的股民，因为香港的股市也在“价值回归”。

7月1日之后深沪两地的股市连拉长阴，指数从最高位计算，跌幅达25%以上。众多投资者惨重套牢，大呼上当，机构没有出货的也尽在多数。如果仔细回想，管理层其实已发出多次警告，市场也早已出现危险的先兆，只是许多人沉浸在香港回归的美好憧憬中，抱着一腔爱国的拳拳之情，满心想在股市上实现理想，结果事与愿违。

股市是信心的预言，更是先知先觉者的天堂，同时也是后知后觉者的坟墓。当你在众人之先敢于炒作香港回归题材，在邓小平同志2月份逝世之后入场进货的话，何至于到了6月30日还在接最后一棒呢？

在7月1日之前三天，股市确实往上跳了几下，对那几天

九七香港回归 ②

奋勇入市的人，我不敢恭维他们的政治觉悟，只是慨叹他们的“革命热情”罢了。

二十六、机构操盘研讨会

1997年6月初，由我们公司独家发起，在深圳举办了《机构操盘研讨会》，这种会议在外面很少举行，我们的这次会议由于属内部交流，在外未做广告，但来的人特别踊跃。

股市行情正在转折关头，是继续向上走，还是一路下沉，市场舆论看法大相径庭。抱着与同行互相切磋，商讨看法的初衷，我们召开了这一研讨会，当时正逢深圳上市公司举办董秘培训班，所以也邀请了一些上市公司代表旁听这一会议。

会议在深圳新地酒店举办，宽敞的可容纳一百多人的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深圳市的一些大券商、挂牌基金、专业机构均派人参加，大家畅所欲言，观点迥异，但气氛自由而热烈。

这次会议的召开使我想起自己在1995年底参加上海亚商举办的一次大型研讨会。那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市场主力何处

去?》，主要讨论 1995 年底 1996 年初机构投资策略。那次到会的人数很多，我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认识了杨百万、邬医生、文兴、简直等一批上海证券界风云人物，并由此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但那次会似乎股评界的人士多一些，机构操盘手尤其是上海主力操盘手到场较少。我们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没有邀请股评人士和媒介记者，所以这方面的人来的非常少。我们需要倾听的是真正在第一线操盘的这些机构人士的想法，不是对未来行情的预测，只是对目前走势的判断，最主要的是现阶段如何进行投资决策。

会上，我首先发言，对各路群贤毕至表示感谢，并且对当前行情判断的重要性简短地说了两句。大意是目前的选择非常关键，我们不是套牢在历史顶部就是逃顶在牛市最高峰，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一争高低。

一番话直接点燃了导火线，会议上的火药味顿时浓烈起来。DP 证券的操盘手接着发言，他们认为股市要进入一个调整期，时间可能延长至 1997 年 8 月、9 月份，下跌幅度在 20% 左右。这一看法从中线的眼光来看是基本准确的，因为从 5 月 12 日的高点一直到 9 月 23 日的低点，两地股市跌幅大约在 25% 左右，以后逐日回升，出现了一次反弹。但总体大市还是下沉。GX 证券的研究部人员则认为在中期报表全部出完前，股市会出现结构性调整，幅度在 15%—20% 左右，至少现在不宜满仓操作。

赞同以上观点的操盘手占大多数，由此也可看出主力机构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已意欲减磅。

有位基金经理人对此执不同意见，这是一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在市场上颇有声望，操盘业绩优异。他认为股市会下跌，但个股行情远远未定，还可继续操作。席间他还列举了大量例子。他以前有一观点我颇为赞赏：他认为做股票就是做项目，项目没做完，收益没拿到，就不应该卖掉。我们选择好的股票就等于选择了好的项目，一旦选错宜于改正，宜于兑现，这是投资证券市场优于投资实业的地方。凭着这种心态做股票，他对个股行情的追踪是非常执着的。

中午休息时我们移师办公室就此问题与他继续探讨，我们认为中国股市毕竟有波段特色，为了资金安全及周转效率，不如全体高位出局。因为这次牛市行情累积升幅实在太大了。对此，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只要有信心便会有行情，本轮行情调整的时间不会很长。

对此，我也讲了一条针锋相对的意见：信心与行情，非常类似鸡与蛋的关系，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仿佛永远争论不清，但有一点应该承认——先有单细胞，才有双细胞乃至更复杂的生物体。所以不妨把引发行情的基本因素放在第一位，如果这些基本因素没有到位，那么信心与行情便是无本之木。诱发 1996 年行情的是减息、银根松动，诱发 1997 年行情的是香港回归，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在股市上发挥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个股行情只有在指数平稳的窄幅震荡或平衡市中展开，如果出现指数下跌趋势，在中国新兴的股市上还是应从回避风险为主

的。争论的要点还是对趋势的判断。当时在研讨会上确有两种派别，一是指数派，一是个股派，指数派倾向于全部清仓，个股派倾向于继续操作个股。

研讨会还对认购新股及可能的中签率及盈利率作了详细计算，有位券商对此十分有研究，他列举大量数据，如按5月份新股上市数量和开盘价格，全年盈利可达50%以上，看来这位券商已在一级市场大尝甜头，他的发言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更坚定了我们认购新股的决心，并且应以存款认购为主，因为这里的赢面更大。

来这次会议的许多上市公司代表并不十分关心股市行情，倒是对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的中国经济趋向感兴趣。

下午，我们又就普遍的经济局势进行了讨论。一些上市公司的代表踊跃发言，总体的感觉是大家比较乐观，对即将来临的国内经济滞胀问题和东南亚经济风波浑然不觉。从以上方面我们也可认识到券商也好，咨询机构也罢，对国际及国内的宏观面研究依然是十分肤浅的。但是一些基金经理长期做资产管理，时间充裕，在这方面正努力向国外同行靠拢。有位经理人的发言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还是充满了忧患，尤其觉得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差，1997年的中期报表未必如何理想。他从这一方面详细阐述了六月份指数再难创新高，我觉得他的意见是非常有见地的。

会议较为重点的部分是对个股行情及板块的研究，这方面不得不佩服深圳券商敢为天下先，研究工作走在了前面。一些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券商及基金都带来了自己的研究报告，从行业到个股，又从个股到板块，条分缕析，面面俱到。

大家当时共同看好的一些板块分别为：电子信息行业、生物制药、商业板块及农业板块，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

从这次聚会中我深深感到：深圳的券商、基金、专业机构水平大致相当，利润也在平均化，在这一批高手中要想脱颖而出，技压群芳是不太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竞争意味着公平，双赢和利润平均，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同行业的相互交流学习，不断提高水平，携手合作，共创辉煌。在这一点上确实应具有“大将风度”和“大家胸怀”。想穿了，我们是赚市场的钱，尤其是股票市场，不必像期货市场那样多头和空头拼个你死我活的；相反，市场的共同繁荣才是大家致富的惟一途径。所以我也一再强调，我们要赚的不光是一波牛市的钱，更应该努力营造中国证券市场的春天，让更多的投资者赚到钱。具备“有容乃大”的眼光和操守，才会在这个充满风险与竞争的市场上活得更好，更长久。

会议最后由总经理陈宁发言，阐述我们公司的观点：1. 本轮牛市历时两年，目前已告结束；2. 作为机构操盘手，在获利巨大时应彻底离场，不可贪恋；3. 一级市场依然有较大获利机会，应该牢牢把握。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大家举起香槟酒为牛市中的胜利和友谊频频干杯！

我们是在6月3日举办的研讨会，6月5日央行就发布了

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通知。从那天起股市节节败退，像患了瘟疫一样，多头也落荒而逃，上海指数短短一个月中从 1300 点一直跌到 1066 点，而此时我们已带着汇票在存款认购新股的旅途上。

对于一个进攻型的、积极主动的投资者而言，在证券市场学会放弃，激流勇退是一件极为困难和痛苦的事。我们虽然在旅游，但并不感到轻松和惬意，我还没有从原来的自我中彻底解脱出来。在我的性格之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似乎是主流，是压倒一切的，我常常感到竞争的危机和时间的催迫，社会责任感又像无形的鞭子鞭策着我，使我像一头疲于奔命的弩马，不断地向前奔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似乎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所谓“这一代人”，老三届是也。

我们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形成，一要归功于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在那些阶级斗争“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岁月里，谁不轰轰烈烈地革命，勤勤恳恳地工作是要被斥责成“修正主义”的；二要归功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后无来者的上山下乡，两场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使我们每个人成了“狼斗私心一闪念”的专家；三是感谢知青回城之后工作的繁重和生活的艰辛，正如民谚所语：70 年代下乡，80 年代下海，90 年代下岗。该轮着的我们全轮着了，一个也避免不了。

人生最美好的年头长期处在压力与困厄之中，怎么能不令人奋发图强以便在大千世界争得一席之地呢？——这便是我主动进攻型性格的由来。这一性格确实使我在证券市场上拳打脚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踢，赢得许多机会。现在，当我在自己的投资生涯中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时，却要学会放弃机会，岂不是本末倒置，从头干起？

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居然要和根深蒂固的本色性格作斗争，这真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需要一刻不停地责问自己：生存？还是死亡？为了生存就必须克制想抓住一切赚钱机会的冲动，做到金盆洗手。“宁可放过，不可做错”，这条格言在那段时间里成为我们处事的诫律。这时候我才痛感到学会放弃与学会争取，与人而言是同样困难的，激流勇退与力争上游是一样难以做到的。

历史真会开玩笑，强迫给最勤奋的人一个放长假的机会……

二十七、我和非非

1997年6月份以后，我从二级市场上退出，稍觉清闲我便决心抽出时间来偿还欠债——主要是应邀参加全国各地的股市演讲会。牛市两年来我几乎没有周日和周六，节假日的日程也总是排得满满的，不是去开辟操作室，便是跑上市公司，或者两件事同时进行。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非非是初中一年级时来深圳念书的。因为我没有节假日，每个星期的周六和周日是他最难熬的日子。初来乍到的非非在深圳没有一个小朋友，刚来时又听不懂广东话，有时还受欺侮，非非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有一次他对我说：“妈妈，你知不知道，我刚来时的那两个月想跳楼自杀？”这话吓了我一跳，我摸着他的头问：“你现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在还想吗？”他像大人一样沉着地说：“我已过了孤独关了。”由于公司的事务忙，从儿子初一到初三我只去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但这次家长会上儿子让我这个当母亲的露了脸。他刚刚转学过来时成绩是第六十多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进入第十二名，成为初一年级分数提高最快的学生，老师在总结汇报时着重表扬了他，这一表扬简直使我无地自容。用目前流行的标准看，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作业，几乎不过问他的学校生活，让孩子完全处在自我发展，自生自灭的状态。当然，这也是我一贯的教育观念，也就是我经常对儿子说的：任何情况下都要争取独自面对。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希望儿子也有独立性。

结婚前我和我丈夫曾约法三章：我可以放弃一切全力支持他的发展，他也应该在我需要的时候支持我，但不能要求我为他生孩子。我的先生一口承诺。这样的男人在中国还真不多。

婚前我的身体非常差，一直是在长病假中。父亲逝世前嘱咐我，现在不能考虑结婚，以后结婚了也不能怀孩子。我含着眼泪答应了他。

我父亲死于亚急性肝坏死，他的肝炎病史很长，要追溯到飞跃年代。文革中的批斗和劳动改造又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使他英年早逝。在他病情恶性发作的三个月中，我这个作女儿的日日夜夜地护理着他。当时他还是一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药物，由我出面和工宣队交涉。我的姐姐和母亲都没有肝炎，而我早在幼儿园就患上此病，下

乡后为生产大队外出采购柴油机时又再一次染上黄胆急性肝炎，休养了好一阵子。父亲认为还是让我料理他较为安全，免得全家都成为“肝炎病区”。

我父亲的大病房里住着几十个病人，几乎每个病员都教育他们的子女要向我学习——尽职尽责，不屈不挠。有时候我为一颗急救药可以跑遍全市的药店，甚至拍电报求人从北京空运过来；有时候又为护理上的一些问题豁出去和医生护士据理力争。这些事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而言是过于沉重了。

我妈是一个劳动模范，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又是一名党员。在她的脑海里永远是党的工作第一，家庭第二；完成任务第一，照顾自己第二。即便我父亲病得如此严重，她也没有因此请过一天假。

我对于担当起护理父亲的这个责任是心甘情愿的，在我的脑海中，父亲是我所认识的男人中最好的和最优秀的。他凭着自学攻读了五门外语，脾气和善，为人宽厚，像一头老黄牛似的在医务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了一辈子。但是好人偏偏不得寿长，年仅四十九岁的父亲于1974年元月撒手人寰。送葬那天来了很多人，一见父亲的遗像就流泪痛哭，我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哭。路人瞪大眼睛看着我，窃窃私语：这家的女孩自己不哭，还不叫别人哭，算咋回事？我的亲戚暗示我不能这样做，我理直气壮地说：生前尽心尽意地对待他，死了再哭也没用了。为了伺候父亲，我体重掉了十几斤，瘦得像纸人儿。

父亲死后，我的验血报告出来了，转氨酶和我父亲一样居

◎ 安妮投资生涯路

高不下，医生认为我已被严重地感染。

我该怎么办？此时的我像林黛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前来安慰我母亲的杭州阿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妈的负担已经很重了，你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病自己医，跌倒自己爬。

这句话点燃了我的生命之火，我跑出去找遍城里有名的中医西医，请他们想办法让我避免走上父亲的黄泉之路。这些医生都为我父亲看过病，他们认为有两个办法可以一试，一是吃中药（我父亲就是不愿吃中药），一是打辅酶 A（一种激活素，打了以后会有些副作用）——而我，全认了！

当时，我虽然已从插队的农村回城分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工作，但肝病复发使我无法正常工作，我不得不请长假。当时我每月工资为人民币 14 元，长病假还得打六折，按现在的标准只能吃两个盒饭。

为了节约医疗费，我把需要输液的药物开回来每天自己给自己打静脉针，一连打了半年，体重增加了二十多斤，中药则一吃四年，奇迹终于发生了——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肝功能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我又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去工作，去写作，去恋爱。这才发生了我和丈夫的“约法三章”。

婚后三年，我的病情较为稳定，我先生虽然没有要求我生孩子，但我已看出他的烦躁和绝望——烟越抽越多，话越来越少。我们两人都在回避对方。

这种局面是无法长久的，最终我还是放弃初衷，答应只生一胎。终于在三十岁难产生下现在的儿子——非非。生产时丈夫得到通知，他的一篇作品获得全国奖，需要他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去北京，在阵痛了三夜两日之后，独自生下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

儿子生下来半年，终夜啼哭，消瘦，拒食，到医院一查真是一报还一报，也和我当初一样转氨酶居高不下。病情严重，医生要求立即抢救，连我妈也反复嗟喟：这孩子养不活了，养不活了。

我和先生变成了两尊泥塑，我们都一下子老了十年。

几乎是同时，我们俩脱口而出：不会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们决定把他抱回去治疗，我再一次发挥主观能动性，跑遍全市苦苦求医。有医生说可以打丙球、打胎盘针，我们夫妇俩就到全市药房去“钻营”。当时这些药都很紧张，需要到卫生局或防疫站打条子，我们又东奔西走去跑“条子”，针打下去毫无效果。省血吸虫防治院的一位医生说，你可以试试转移因子。

我奉若神明，跑到各医院去找这一种抢救药。皇天不负有心人，效区医院正好还剩几支，全给我争取过来，一周一支注射到非非的淋巴组织中。

老天有眼，孩子的病终于缓慢地好转。他的食欲越来越好，体重也开始增加。我们计算了一下，他的每一两体重几乎

◎ 安妮投资生涯路

都是用当时纯金的价值换来的，好在我和先生都有稿费收入。

为了治好他的病，我又一次请了长病假，晚上六点到十二点，我负责抱着他来回踱步，深夜十二点到早上六点，我先生负责抱他，这孩子一生病脑袋只要一放到床上就放声大哭，可以连连哭一夜，哭得人心都碎了，我们用轮流值班的办法坚持了一年。

一年以后，当我抱着体质好转的儿子再去工厂上班时，我那会计的位置早已被人占领，没办法只能接受新的安排到设计室去搞成本核算。这工作需要每周去上海二到三天，主要是与外贸公司谈价格，而这些我都平静地接受了，因为它毕竟换回了我的儿子。非非长大后，从感情上讲，这个孩子我很珍惜，但从理性上讲，我觉得更应该让孩子自己珍惜生命，这才是让他健康和自强的惟一途径，也是当父母的最大职责。

在深圳上了两年初中后，我觉得长期让他周末、周日一个人呆在家里不是事儿，我先生的同学正好在广州大家庭集团当老总。他麾下的南洋英文中学是全国第一家贵族学校，他们父子俩去参观之后一致同意转学南洋，于是我和先生各人缴了10万元学费把儿子送到广州（1990年起我和先生在财务上就执行AA制，这一主意还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女人如果要靠男人抚养，我认为是种耻辱）。从此，非非要一个月才回来看我一次，而有时即便回来我也不在家，那样我先生便从海南飞过来与他相聚。我们这个家庭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家庭，三只鸭子四处游，一年才碰几次头。好在儿子已适应了这种生

活。几年后的今天他对我说了真心话：妈妈，你是我最崇拜的人，不为你炒股票能赚钱，只为你伟大的母爱。

我有些诧异，因为我自认为对他的母爱是很不够的。但十七岁的儿子很成熟地说：小时候为了替我治疗，你放弃了一切，你的工作和写作，等我大了为了让我能到深圳你又干了所有这一切，我觉得你比任何母亲都不屈不挠！

听到这个评价，我比赚了多少钱还要高兴。母亲节的时候，非非把我拉到百货公司买了一支国产的永生金笔，送给我作礼物，并且深情地说：妈妈，你养育我十七年，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的回报，你以后要签上亿元的合同就用它！

我的眼睛湿润了，这几年我已经很少流泪，世事沧桑使我的心肠变得坚硬，但儿子的这番话无疑触动了我最软弱的一根神经，我今天能走到这一步，确实要感谢儿子和先生的默默支持，从女人的角度来讲，我是很幸运的了。

在6月份以后的巡回演讲中，只要有可能，我总是把儿子带在身边，希冀能给他多一点关心和影响。也只有在飞机上、旅馆时，我们之间才有空展开一些深层次的谈话。有一次非非很认真地对我讲：妈妈，炒股票其实很容易，只要通读老子的《道德经》便够了！

我惊异儿子的悟性，兴奋地说：“是啊，这是妈妈摸索了多年才得到的心得哎！”

“我看了一遍你写的书便明白了。”儿子得意地歪着头说。从此他一有闲暇就跑到图书馆去看老子、庄子、墨子，这三位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是他最佩服的哲学家，至于文学家，则台湾的李敖为第一人。

当别人问我的儿子，你妈妈在家里做什么事时，他总是十分简要地回答：“读书和喝粥”。确实，在许多人眼里我对生活的要求是非常低的，一不喜欢锦衣玉食，二不喜欢豪车骏马，我一直过着极其简朴和快节奏的生活，甚至被人认为“太清苦”。对于这一点，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你有什么财产，站起来七寸，躺下去七尺，一日三餐不能多占一分一毫。人的物质要求有限，精神食粮则多多益善，我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充实随意的生活方式，如果太讲究排场和程式，那就不免为生活所累，还谈得上什么享受。

现代生活的高质量并不是住豪房、驾豪车、出入酒店娱乐场所，它最大的内容是健康的身体、闲适的交流、良好的教育、阳光、空气和海滩，而非中国刚刚暴富的中产阶级所追求的奢华和挥霍。

这一点男人与女人的看法或许是不同的。男人在个性中喜欢“漂泊”，追求刺激，寻求感官享受，喜欢多变的生活方式；女人在个性中则更倾向于“停泊”，喜欢平淡，从一而终，愿意过稳定的日子；这里面既有心理的原因更有生理的原因。客观地说，几千年来，中国的男人是社会的基础，女人则是家庭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的。这种角色的衡定性反映在投资行为上也形成截然不同的两道风景。男人敢于拼搏，追求短线，坚信“敢拼才会赢”，在牛市中往往有出色的表现；女人乐于守成，醉心长线，坚信“守得云开见月明”，往往能熬过熊市的

漫长岁月。如果男性投资者学一点女人“停泊”的个性，在熊市中也许能减少许多亏损；反过来如果女性投资者学一点男人的“漂泊”，更加潇洒和豁达一点，在牛市中战绩将更加辉煌。消费行为也是如此，女人的淡泊和宁静往往使她们能更好更长久地享受人生，而男人的暴吃暴饮暴玩则使他们如流星一般发出灿烂的光芒即告陨落。证券市场这几年中箭落马的人士中男性居多，女性居少，恐怕也非偶然现象罢？

我深深地觉得炒股的哲理能影响许多人，所以在每次巡回演讲时都把炒股与做人的道理紧密结合。

最令人感动的是，1997年春节我在南京大行宫作演讲，结束时在宾馆的电梯口遇到一位从上海来听课的盲人青年虞滔。这位小伙子才二十岁，是由家里的几位亲人陪伴他来南京听课的，入市才一年已把家中仅有的60000元钱亏损了一半，股民中有人告诉他：你要搏回来就去找安妮！当他从报纸上知道我要去南京讲课后，下定决心要找到我。我们在大行宫的报告会上与在深圳独家举办的“1997 战略投资研讨会”上推荐的股票是一样的，分别为新大洲、蓝星清洗、北京天龙、达尔曼及吉林敖东。当时我们预测，这些股票全年会有80%—100%的回报。

虞滔跟我见面后，我告诉他以上股票可选择一到两种，不见50%的收获决不脱手。结果他在春节后的下跌行情中，买了达尔曼赢利150%，买了吉林敖东赢利50%，短短半年资金翻了一番！从此他拜我为师，做起了长线投资者。

1997年5月份，当我到无锡去讲课时，虞滔又一次在亲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人的搀扶下来到会场，而在台阶上还端坐着来自江浙一带的残疾人多达十二位。这些人有的是前一天就来到，有的是当天清晨赶到。报告会门票售罄，开场前再售加座三百张，因为我有一个要求：一定要满足这些远道而来的投资者，尤其是残疾人。

会议结束时，虞滔捧着鲜花上台送给我并要求发言，全场几千人静悄悄地倾听这位盲人的声音：我是位盲人股票投资者，毕业后一直未找到合适的工作，这种生活上没有保障的状况使我在较长时间里陷入苦恼之中，但以后的股市投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向所有开会者郑重表明，如果你像我一样曾经因投资无门而苦恼，你正为今后无人指点而烦恼的话，请和我一样加入到安妮旗下，它会是你最好的投资理财顾问。

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台下有人抹着眼泪……

那天，他把自己在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的一块跳高金牌送给了我，他的成绩是 1.34 米。作为一个残疾人，又是在失明的情况下助跑、起跳，这成绩来之不易，但他深情地说：安老师，您是资本市场上的冠军，这块金牌应该由您保存！

面对他的真诚和赞誉我无地自容，即便向他推荐了达尔曼和吉林敖东，我们也没有取得翻一番的成绩，充其量是获利 30%。我不无感慨地说：你的眼睛虽然失明了，但你不像我们经常看盘，所以你的投资成绩比我们这些明眼人强多了！看不到盘口是你的劣势，但也正是你的优势啊！

听到这句话，小虞滔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一定能够听你的话，坚守在岗位上。

是的，你不会下岗，许多人都失业了，但虞滔，你这个失明的残疾人永远有自己的岗位。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还有一次令我难忘的是在深圳的演讲会上，结束前有位女青年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一看，原来她是从成都专程乘飞机来深圳听课的，名字叫张影。她写给我的是一封叫做《感谢市场》的长信，一开头只是淡淡地写道：“其实，我也只见过你两次。”

但文章越写情越浓，最后感谢之情简直到了化不开的地步，信中描述了她从第一次听我的成都报告侥幸地买上股票后曲折坎坷的经历及得到的巨大收获。

在信的结尾处，她恭恭敬敬地写道：

安妮小姐：

从写下《感谢市场》那一刻开始，我就希望能够有一天亲手交给您。喜欢您并不仅仅是因为股票，更多的还是您从容不迫的气质。

希望您能够喜欢它，这是我用心写出来的。

再祝您快乐

张 影

1997年6月21日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每当看完这封信，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这女孩子青春而又文雅的面容，以后我从《中国证券报》上看到她的股评文章，最后我从文章里得知现在她已是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

股市，确实改写了她的人生！

其实，类似以上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许多人因此与我成了忘年交，知心朋友，胜似亲人。全国各地除了台湾我没去过，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我都开辟过讲座，一些出租会堂、电影院、剧院的经理说：好多年没有这么火爆过了，香港歌星来唱歌也没这么热闹，真有意思！

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证券市场的扫盲运动，当然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不是我个人有什么力量，而是历史的大潮不可阻挡罢了。

二十八、安妮旗下群英荟萃

1997年9月份，我们公司在全国的操作室已发展到五十家左右，公司员工的队伍也扩大至八十人以上。由于步子太快，所招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影响咨询业务开展的质量，公司经过反复讨论，准备进行全员培训，尤其对各地的客户经理进行一次集训。

员工们雀跃欢呼，平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兄弟这次终于欢聚一堂，颇有“梁山好汉”聚义时的味道。时间就选在10月1日至10月5日的国庆假期之内，公司包了许多客房。大家白天学习，晚上畅谈，五天时间内不少人仅睡了几小时的觉。

看到自己的员工回到总部济济一堂，我和总经理陈宁内心都备感欣慰，多年的努力终于结成正果，安妮的旗下群英荟萃，我们不无自豪。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分布在全国大中城市的五十多个操作室都是我一个个亲自去发展的，每个点平均前往辅导的次数为两次以上，这样计算下来这两年中我至少为操作室出了一百趟差。如果以全年共有五十个星期天计算，这要整整奔波两年，这就是为什么从1996年以来我没有周末休息这一概念的道理了。

一些同行经常向我取经：如何开展操作室业务？这是一种很好的咨询方式，既新颖又赚钱，但只要经过实践的人就会明白这项工作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得来，因为从准确的含义上讲，操作室经理是证券经纪人的雏型。在目前券商普遍返还佣金，又普遍推出本部咨询意见和咨询服务的时候，这项工作就更加难以为继。

好在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推出此项工作的，先是1993年在深圳试点，1996年牛市来临后在上海全面铺开，在上海滩最多时我们有五个操作室，搞到最后能继续工作的实际上只剩一个。1997年我们应邀到武汉开辟操作室，最多时也有六家，维持到最后只剩三家。为什么存活率如此低下，主要关系到操作室经理的素质，他能不能按照公司的指令给予客户如实的辅导？在遇到市场紧急状况时如何应对？在客户严重套牢心情不佳的时候如何化解？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专业知识和心理辅导能力的。我们总结了各地操作室的经验教训之后，决定开展强化培训。

这次会议的口号是纲举目张，“纲”是研究成果和咨询质量，“目”是新的利润增长点，纲举目张才能找到挑战前的出

路。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四条措施：

- 一、抓好惟一的产品——传真。
- 二、健全有效的网络——操作室。
- 三、促进声询电话的全面扩容。
- 四、完善高级会员俱乐部服务。

操作室的许多经理在外地遇到各种难题，本来是抱着一肚子的苦水准备来倾吐的，还有的联名倡议公司做庄，让客户赚一把，自己好交代，当然也有的要求提高待遇。

在提高待遇方面公司早有准备，按提成的方式使客户经理在原有基础上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下子解放了“生产力”。至于做庄，我们坦白地告诉自己的员工：安妮公司从来不做庄，只做投资组合。

第一天，陈宁总经理代表公司发言，向大家倾吐了从1993年开始办操作室以来的一肚子酸甜苦辣——其实员工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我们全部碰到过，而且往往比他们还棘手。

我们是在1993年末至1995年末的深圳办操作室，当时正是熊气弥漫时期，别说没有客户，有了客户也没成交量，但券商与我们订的合同是有指标的，完不成一定的量我们等于白干。

现在全国各地的安妮投资操作室，客户由公司作宣传发展，没有指标没有定量，操作建议由公司每天晨会传达，一天还有三次资料传真，每月又有重点个股推荐，况且从1996年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至1997年还是中国大牛市，这些都是当时我们不敢企求的。两相对比，员工们哑口无言，纷纷把舌头缩了回去：没想到两位老总当初创业那么艰难！

会议从诉苦会变成了经验介绍会，一些工作开展得比较出色的操作室经理纷纷上台传经授宝，其实成功的类型不外两种，一种是理智型的，靠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宏观分析指导客户；一种是感情型的，靠真诚关怀、人格魅力、心理辅导影响客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一般而言，文化水平越高，性格脾气越好的人在这一岗位越称职。

在技术分析及经济因素周期分析方面各人有各人的专长，大家纷纷上台交流，亮出各门各派，只嫌时间过于短促。

在会议过程中，山东的代表以“正确理解安妮品牌的文化内涵”为主题作了精彩的发言。

这位小伙子曾在一家大券商机构内操盘，12月1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他看到我在《大江南》上发表的文章《高位套牢，低位换股》中，深切地检讨了自己政治性不强的错误，深受感动。他觉得在众多股评家中能向市场、向读者公开认错的当时我是第一人。冲着这一条，他拨通电话加入了我们的高级会员投资俱乐部。一听说我们要在山东设点，他自告奋勇地把任务包揽了下来。

他在报告中说道：首先“安妮”这两个字已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同时“安妮”又代表着公司理性投资的理念；第三，“安妮”代表着自强不息、勤恳敬业的奋斗精神。在开发

操作室的过程中，有位曾经因经济纠纷诉诸于法律而离开的客户对该营业部的经理讲：“我不是冲你来的，我是来投奔安妮的，我认可安妮的思想，佩服她的人品。”客户这句话的分量，值得我们每一位员工深思！

同时他提出了一个口号：没有挤压，就没有大山。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公司自强不息，勤恳敬业的精神写照。

他的讲话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我长期为之奋斗的理念能获得全体员工的认同，这才是我们公司最宝贵的财富。

武汉操作室的经理在会上传授了技术分析的系統理论，这位小伙子从北大毕业，曾在深圳期货公司当过培训部经理，他所在的操作室客户稳定，券商满意，一直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客户经理之一。

为了到武汉开辟阵地，他抛家别子，放弃了深圳的房子和待遇，在武汉一家证券部睡了几个月的地铺。那时正是十二月份武汉最寒冷的时候。小伙子无怨无悔，他麾下的经纪人队伍从一个人发展到八个人，使整个武汉地区都知道安妮投资的品牌，最多时同时有十家证券部来邀请我们开操作室，因为不开操作室的证券部股民净提意见。

这小子开讲座也是一把好手，我们曾经应国泰证券湖北分部的邀请在短短的七天时间里跑遍湖北，开了数十个演讲会。那时已是1998年3月份。1998年春节后我已有淡出咨询界的念头，所以在那次湖北省的巡回演讲中，我的最后一句话总是：这是我的告别演讲，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是我的第一次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讲座，也是最后一次讲座。当时台下许多人唏嘘不已，湖北的投资者应该还有印象。

巡回演讲走下来，陪同的工作人员病了，证券公司的经理支持不住了，只有我和小伙子还精神抖擞，只不过嗓音已有点儿嘶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后怕，因为在旅途中我们还走访了至少三家上市公司。

我们在福州的操作室经理也是好样的，这位年轻人本来是大学教师，早年就加入了股市，每年有优异的回报，在福州已小有名气。我是在福建电视台举办的《股市与人生》的现场直播大会上认识他的，当时我们两人均被邀为嘉宾，互坐左右。

在回答观众问题的时候，他的思维方式、投资理念几乎与我如出一辙，因而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券商希望我们在福州也开辟安妮投资操作室，我正为没有合适的人选发愁，福州的券商指指旁边的他说：我帮你说动他出山如何？

我一听，大喜，连连点头。于是大学教师便成为我们在福州的操作室经理。无论是股市暴跌还是暴涨，他所领导的客户都操作得十分稳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公司第一个在异地开辟操作室的经理，这位小伙子曾经是东北哈工大的学生会主席，具有相当的才能和极强的开拓精神，是他首先向我写了建议书，并自告奋勇去上海开辟市场。他放弃了在深圳的住房和小车，在上海滩独打天下。刚去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在操作室内朝摊夜铺，生活很艰苦。当有人问他：你也并非两手空空的穷光蛋，抛弃

了深圳的优越条件来这里值不值得？他嘿嘿一笑说：我这是跟老板学的。

确实，在1996年到1997年大牛市中由于客户太多，场地太小，我在办公室几乎打了一年多的地铺，这一段鲜为人知的事实在我们公司内则是公开的秘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那些想安安稳稳赚钱，稀稀拉拉工作的人很少有成功者。至今谈到我们的往事，还有人嗤之以鼻地讽刺：安妮是卖报纸出身，啥了不起！

对此我也只能付之一笑：如果你卖报纸也能卖出我今天的局面，我会亲自上门取经。

当然，在“英雄莫问出处”的深圳，这种人毕竟还是少数，他把我们最初的咨询工作与卖报纸混为一谈，我并不觉得是什么耻辱，相反我觉得倒是有些同胞对证券咨询这一行太不理解，太缺乏尊重。这也是几十年来对文化和知识竭力贬低的结果。

在深圳我很佩服一位早期的股评家张无忌，他的股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鲁迅的遗风。偶然的一次聚会时我问他：你以前干哪一行？他幽默地回答我：我是卖波鞋出身。我相信这是真话。

证券市场的咨询人士不一定要教授出身、博士学问，我想更需要具备的是市场经验、性格定力，大学文凭足矣。在现实生活中，我所遇到的教授和博士炒股票往往都是输家，他们老是屈躬垂问现在买什么股票才好？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我们公司在选择人才时往往先看德，后重才：先看经历，再看学历：品德不能强求，学问可以进修，在证券市场上，尤其要观察一个人的冷静、理性和耐力。在国内似乎有一张文凭便有了一切，但在知识经济的今天，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如真要考文凭的话，我想一个人的实际知识是最重要的。

在强化训练结束时我作了最后的发言，在这次发言中我从精神、思想、素质等几个方面说了安妮公司对员工的要求。我说：我们的员工要有三种“气”。一是要有“霸气”，能成大业者无霸气不灵，在这一市场我们不成功谁成功？我们不获利谁获利？靠冷静的分析，理性的组合，科学的投资，首先应树立必胜的信念。这样，在股市的大起大合中，才能像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气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二要有“静气”。叶群送给林彪的条幅上曾写道：每临大事有静气。叶群和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是历史的罪人。他们不成功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因为沉不住气，急于求成。相反，毛主席在听到这一消息时表现得静气凌人，喝酒长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轻松！心中没有恐惧的人才会表现得这样平静如水。

第三要有“大气”。能做到这一点确实难乎其难，有了这一条，静气与霸气才有依附，过于强调静气就是消极，过于强调霸气又成主观，大气是静气和霸气的基础和统一。有大气者

必成大器，我们要经得住历史考验，受得起曲折和磨难，放弃坛坛罐罐，唾弃小恩小惠，跟随历史潮流前进。炒股中的顺势而为，在工作中、人生中同样十分适用。

具备“三气”，我们公司及公司员工才能保存实力，稳健发展，提高自己，奉献社会。

我的发言讲完后，会场一片寂静。过了好久大家才回过神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晚上，全公司人员聚餐时，大家在陈总的带领下举杯高吼：“理性投资，长期收益！理性投资，长期收益！”重复长达五次。

第二天，大家带着这句终身难忘的口号分赴各个战场……

二十九、资产重组的先锋

1998年1月13日，香港券商百富勤宣布清盘倒闭，引发香港股市暴跌。一夜之间，香港投资者不是成了“大闸蟹”高位套牢，就是成了“红鲤鱼”跳水无门。昨日的“红筹之父”梁伯韬在新闻发布会上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和泪光。

一月初，我们公司正好有人去香港考察市场，与百富勤的几位董事有过接触，从他们的言谈中已嗅出百富勤财务情况不妙，他们也预感要出事。回来之后我们私下讨论，还是那句老话：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安全第一，先跑为快。

对于香港的局势，当时的券商中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淡，认为香港的股市好不到哪里去了；一种是麻木，认为香港只是香港，与大陆关系不大。投资者们则普遍对即将席卷香

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缺乏警觉，许多人还在等待一年一度的春节行情。

我当时坚持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而全球的一体化在金融方面已愈演愈烈，不可掉以轻心，更不能把赌注押在自己尚未经历、尚未了解的变化中。与其受其波动影响，不如跳出观望，这样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方能掌握主动权。

如此决定之后，我们在香港百富勤事件见报的周一、周二便把股票大体出清，中国深沪两地的股市是在周三、周四才开始暴跌的，总算躲过一劫。从这件事上我也反思：做股票不光要平面思维，更要讲究立体思维、全球性思维。

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国际形势风云多变，香港股市前途难测，不如发起举办绩优上市公司资本营运研讨会，集思广益，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对1998年即将来临的大面积资产重组早作准备。1996年市场崇尚绩优股，1997年市场崇尚成长股，1998年看来非资产重组莫属了，这在我们的意识中非常明确，而且必须是绩优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才真正有戏，有料。

这次会议我们事先作了统计和预测，对每家上市公司进行筛选，最后邀请了1997年年终业绩有可能达到每股盈利0.50元的上市公司三十三家老总或董秘出席会议。对于我们公司而言，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是一次尝试，也是走向资产管理，资本运营的重要一步。事后，证券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还说：没想

◎ 安妮投资生涯路

到你们一下子请到了这么多的老总！

在会议上我们首先请资深的证券市场投资家 H 先生发言，H 先生是我最早结识的深圳老一代股评家。当我 1991 年刚从广州赶到深圳来学习做股票时，他就是鹏城鼎鼎大名的证券分析家了。那时他每周一次在电台里播出的股市看法是我最喜欢听的节目，几乎一次不落，后来他在深圳电视台股市沙龙中的嘉宾访谈也是收视率极高的节目。在深圳，他是最有名望的股评家之一，又是由股评家转为投资家的成功人士，本身的经历就足够写一本传奇。

我觉得 H 先生本身最大的成功就是善于抓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热点，80 年代他由国家干部下海办公司，从贸易转向房地产，90 年代又由房地产转向证券市场，他是第一个在《中国证券报》上开辟专栏的撰稿人，他所写的文章很少谈到技术面，也很少触及指数点位等等，更多的是对宏观经济的思考，对微观经济的独特见解。他曾经向深交所提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与深圳另一位独立股评人士古思平一样，他们的建议往往闪烁着来自市场的真知灼见，因而被管理层重视。

H 先生在国债期货市场也是一位大赢家，凭着经济学的深厚功底，他对当时的多头行情分析得十分透彻。有一次我为国债的一个具体问题请教他，他居然在手机里给讲解了一个多小时，把我的一块手机电池全部打光为止，可见其诲人不倦的精神多么可嘉。正因为这一点，深圳的证券人士提起 H 先生没

有不折服的。

H先生更值得佩服的一点是他“终生拼搏定输赢”的博弈精神，无论是股票、外汇、商品期货，没有一个领域他没有涉足过，而且每个领域都能赚了钱出来，每每带出一套“操盘”的理论。用他的话来说，他非常喜欢把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在资本市场加以论证，最后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在这一点上他很像美国的索罗斯，这也正是他可敬与可怕之处。如果不算我妄下评论：H先生天生是一位投资银行家的料。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在深圳1994年某次股评家的聚会，一些男性股评家因我以一介女性闯入这个男人的世界感到不顺眼，不服气，指责我的做法是“商业股评”，纯粹的商业行为，只为赚钱等等，引来一批人的附和。H先生当场力排众议，告诉他的同胞们：安妮的这种商业股评打破了原来御用股评的一统天下，以后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并认为我的这种做法将引导股评的新潮流。

一时，席间哑口无言。事后，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并说：H先生很维护你，真想不到。

这时，轮到我哑口无言，因为在此之前我与H先生没有说过几句话，只是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确实有过惊人的一致。

对这次1997回归后的行情判断便是如此。

H先生经常去香港，与一些券商和基金有密切的联系，在会上向大家大谈目前的香港经济，用一句话概括：泡沫太大。他认为香港楼市经过这次过度的热炒将会像东京楼市一样一冷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七八年，而股市情形也十分不妙。那时他就预言，红筹股与国企股以后会成为难兄难弟，甚至跌破发行价，跌破面值。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对本土经济太了解了。

他在会上大胆预言：深圳股市要跌到成分指数 3000 点甚至 2800 点（成分指数最高在 6000 点），至少跌去一半；上海指数则要跌到 800 点附近（上海指数最高在 1500 点），可能跌不了一半。记得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上海会跌得少一点，他不假思索地说：深强沪弱，什么叫强，就是炒得比上海高，当然跌起来也厉害！

H 先生的以上预言后来大都兑现，深股在 1998 年 8 月 18 日跌到 3000 点，沪股则在 1998 年 8 月 18 日跌到 1043 点，跌幅分别为 50% 和 33% 左右，使我不得不佩服他透彻的悟性。当时市场仍在沸腾，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深感茫然，觉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简直是天方夜谭。

事后我还跟他开玩笑：依你所说股市要跌到那一步，我们该做什么才好？

他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去全世界旅游。他说：中国受了一百多年欺侮，现在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上等公民，因为人民币很值钱，我们的购买力极强，现在正是周游列国的好时机呀！

现在想起他那时说过的话我还忍俊不禁。H 先生所言不差，到 1998 年 8 月份，因股市一路下滑，我果然去了东南亚四国和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地，直到 10 月中旬才回国。

人民币也果真很坚挺。这是后话。

H先生应邀就1997回归后的中国经济做主题发言,我认为这才是研讨会最精彩的部分。当时全球经济发展还比较平稳,东南亚金融风暴似乎已经过去,但他还是很中肯地提出了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结构性调整,如果上市公司无法生产高技术含量,高科技的产品,那么将会在日益严重的竞争中节节败退。像美国的微软,毕加索的画,索罗斯的理财其垄断壁垒厚到极点,但我们中国的产品还没有垄断性这么强的,几乎都是以削价、低档倾销作为竞争手段,也许马上会被淘汰。对人民币是否贬值的问题,他认为至少这一两年还不会贬,也不必贬。

H先生总是喜欢说一些耸人听闻的惊世警语,每个人听了既不服气又很受用,因为它能引起深刻的反思。

会议上各位上市公司的老总就自己公司的资本运营作了经验介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河北威远、山东阿胶、苏常柴公司资本运营的经验 and 操作过程,特别是河北威远在政府的支持下,每年所进行的资本运营其深度,广度都不断拓展,可以说开创了横向兼并的新路子。

苏常柴则以纵向兼并,直线重组为主,结合主营业务把上游及下游加工单位以各种形式收购,触角渗透到柴油机相关行业,加强核心业务及核心力量,使企业迅速发展,业绩稳步上扬。

山东阿胶在产品系列的开拓上狠下功夫,除了推出传统阿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胶产品系列之外，在生物工程方面步子迈得很大，成为传统保健业向生物制药业进军的典范，引起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

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就中国资本运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探讨，我觉得在理论上的教条非常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来补充与丰富，各位上市公司的老总与董秘帮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

大会结束时，我颇有感触地说：1998年已经来到，我相信这一年是投资家与企业家联姻的一年，也是两家携手共创奇迹的一年，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我们将开展进一步的密切合作。

果真，在1998年的证券市场上资产重组，收购兼并成了重头戏。

安妮公司在资产重组的实践上也迈出了新步子，成为市场的先锋。

三十、从证券咨询到投资管理

当某一个人在某种事业上发展得比较成功、比较顺手的时候，一般都会继续扩大战果，在这一行当中谋求更大发展，这是常理。

但是现代企业的竞争告诉我们，以上方法仅是一种选择，它还可能第二、第三种选择，第二种选择可能是向相关行业进军，譬如海尔在冰箱业成功的基础上向空调、洗衣机相关家电行业发展；第三种选择可能是产生断层，向毫不相关的行业渗透，譬如春兰在空调行业搞得热火朝天时，突然又在摩托车生产线上大展拳脚；企业发展战略之运用可以说是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只突出一个核心业务和核心能力。

1998 年春节前后是我最感彷徨、迷惘的时期，首批证券咨询机构名单和咨询人员的资格审批马上就要进行，我们公司

◎ 安妮投资生涯路

是报还是不报？

对于许多投资咨询公司而言，也许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但对于我们这家公司而言却已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咨询行业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是轻车熟路，钱还有些可赚，但是我觉得它已变得越来越像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大众投资的取向越来越被专业投资及基金投资取代，识时务者方为俊杰，我可不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六出祁山时诸葛亮虽然每次都想好退路，机关算尽，但违背汉民族一统天下的历史潮流，主动进攻不如被动防守，损兵折将，大伤元气，结果大败而归。

如果我们要进入别的行业，是否有把握？是否会获得特许权？在中国还有三个领域是不开放的——出版、通讯和金融。金融管制最严谨。

春节期间，我也专从境外境内邀请同行来为我们这个咨询公司作咨询，我们是否还应该在咨询业干下去？他们的意见均是否定的，理由是风险与盈利不成比例。这倒是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建议公司必须向上发展，向纵深发展，向高层次发展，以适应新的竞争。

公司总经理陈宁一再与我探讨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放弃咨询，专攻投资，这样既省事又省力，效益还会比以前好得多。这两年我主要的精力放在咨询业务和公司发展，投资理财的担子由陈宁一肩挑，也确实够累的。我们都需要好好地休整。高山之下，必有深谷；冲高之后，必有回落。停顿也是必

要的循环。学会放弃，无为而治，成为我们思想的主调。

出于过样的考虑，我比较倾向于陈宁的意见，所以在第一次申报咨询资格的时候，我和他都没有填表申请，只是把公司够格的员工名单送到证管办。

消息传出后许多员工表示不理解，客户们纷纷上门要求我继续担纲，昼思夜想之后仓促决定还是把我的名字填上，陈宁管操盘这一摊坚决不再申报。

根据 1997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人员不得代理投资人从事证券、期货买卖，也不得为自己买卖股票及具有股票性质、功能的证券及期货。

我觉得法律对从业人员有很强的约束作用，所以公司申报咨询人员时，出于对投资与咨询分开的要求，操盘人员与操作室经理一概不申报，惟有平时搞传真，声讯，宣传，咨询的人员够格的才上报。公司内部可以说卡得很严，连我在内仅仅报了七人，其中二位硕士，三位本科，两位大专。

名单公布当天我在重庆讲课，安妮公司落选完全在我意料之外。

不过，我这个人对于许多意料不到的打击向来有适应力，我很快逼迫自己想通这个问题，说服自己这未必是坏事，正可以让我们完完全全地休整、调头，谋求新的发展。中国有句老话：小人知进不知退。在证券市场的道路上既然已走不通了，那么激流勇退是比往前走需要更大勇气的。我从沉重的失落感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中迅速地跳出来，着手处理转轨变型的各项业务。

回到深圳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工作，很快在4月11日注册成立安妮投资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把工作的重点转向投资管理方面。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是投资。

停止业务后遗留问题一大堆，传真退款，专栏停止，声讯关闭，操作室解散，我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将这些一切切断，使自己和员工从咨询业务中彻底解放出来，面向新的行业。

坦白说，损失很大，心态在某一阶段也很失落。不光是我，所有的人都是。这一切都是在常理之中。我自己倒没什么，但大批员工面临失业，这对我是最大的压力。这些我们最后都妥善解决。在这突然而至的转折关头，我再一次意识到，机会正在向我逼近，我将不得不再一次“改写人生”！就像当初放弃记者、作家的身份来深圳创业炒股票，这是我人生又一次转折。

这对我无疑是严峻的挑战，但也充满了诱惑力。时过境迁，回头再看1998年4月1日的急转弯，我对自己果断的选择仍然颇感自豪。

在商业社会，有时一个产品投放市场的失败便意味着一个企业的破产；在证券市场，有时一只股票选择失当便意味着投资的巨大亏损；而我们在这场争取咨询资格的战役中既然败北，那么就只能认输出场，一切从零开始。

白天，我俯瞰大地与太阳；黑夜，我仰望星星与月亮，坚

信天无绝人之路!

为了走出新的创业之路,我决心首先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其次开拓眼界,然后选聘新的人才。

第一件事:我买回了美国 IBM 最新出版的工商管理全套书籍,每天彻夜攻读,把对股票的研究从二级市场的波动转移到对企业深层次的体制、战略、品牌、管理、产品、人才等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上。

第二件事:我让办公室订购了全国所有的行业报和国家部委办所有的内部信息刊物,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信息资料库,要求研究员对主要行业进行深化研究。

第三件事:8月份去东南亚考察,10月份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考察,认识当今世界经济趋势,学习国外同行管理经验,与美国三大证券商——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建立起一定的业务关系。

第四件事:开展全员培训,使用国外最先进的企业管理咨询教材对现有人员进行严格训练,把企业办成“学习型组织”,培养起自由交流,大胆设想,勇于创新的学术气氛,大力提高员工素质。

第五件事:招聘一流人才,包括管理人才、研究人才、财务审计人才,组织新的班底来完成新的投资管理业务。

1999年1月8日至13日,我们成功地与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在海口联合举办《1999年中国资本市场走势分析报告会》,盛况空前。除国家计委、经贸委有关领导亲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临现场讲话外，香港证券联合会前任主席梁定邦先生、北京大学肖灼基教授、清华大学魏杰教授、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中国社科院李茂生教授、南开大学研究所所长冼国明教授、全国人大董辅祁教授等一一上台发言，对中国资本市场发表各自的看法。作为中国民营投资管理公司负责人，我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与这些中国第一流的学者、教授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会上，我们与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研究所商定，今后将在资本运营，资本管理方面进行全新的合作。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安妮投资管理服务公司已经上了一个层次，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的业务重点已变成资本运营、资产重组，变成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战略诊断、企业品牌设计，越来越多地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全中国。我相信通过努力，我们将在中国企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安泰过后，否乱来临。

否乱过后，一种新的局面又将开始。

我这几年的经历仿佛正是以上签语的应验。

1998年4月28日，当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的记者知道我们公司没有获得咨询资格，但在十天内便注册成立了安妮投资管理公司之后，星夜赶到深圳采访。交谈之后，他们被我这种大起大落仍从容的精神感动，花一周时间拍出一部《安妮投资三部曲》。他们把我闯荡深圳八年的历史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个人投资者，即从1991年开始至1995年结束；第二

个阶段是从事证券咨询，从 1995 年成立咨询公司开始至 1998 年 4 月 1 日；第三个阶段从 1998 年 4 月 11 日成立投资管理服务公司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新篇章刚刚开始，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个崭新的领域可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相信自己可以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而在这与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空隙里，我因突发性的脑血管痉挛休养了两个月，公司的同仁非常关心我，不要我操心任何事，只要我静心休养。每当头疼病发作，心烦意乱之际，我才深深感到在艰苦创业的八年中我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健康。

正如有人所言，为了金钱失去健康，但用金钱已买不回健康。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我想到了写作，至少把我们这些难忘的奋斗经历记录下来，不至让它被时间埋没，被历史封尘，因为只有它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始终认为人民币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没有两样，只有精神和个性才称得上是自己的东西。

有人这样评价：炒股积累财富，写作延长生命。是的，人如果一旦死去，一分硬币，一颗铁钉都是带不走的，惟有他的文字，他的精神，他的史迹才能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我现在所能做到的也许仅止于此了，因为我始终认为《安妮投资生涯路》这部书不仅仅是安妮个人生命与事业的记录，它更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人生变化的写照。在这本薄薄的回忆录中，真实地记录了一代中国人的顽强拼搏、自我否定及艰难创

◎ 安妮投资生涯路

业的里程。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尝试了比别人更多的生活内容，获得更多的生活体验，在这漫长而又短促的八年中我无愧于人生！

“改写人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尝试的，但只有用自己的灵与肉去尝试过的人也许才比别人活得更长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是活了“一辈子”，而已经活了“两辈子”，至于今后是否还有“三辈子”，现在还真的不敢说。

精神上，我作好了涅槃的准备，再一次死去，重新复活……

后 记

每当我打开 1991 年以来深沪两地股市的周 K 线图，看到图表上那标志着升跌盘整的红蓝色柱状和起伏延绵的曲线，内心便激荡不已。时间如潮水一般地涌流，市场像海浪一般地推进，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我与这张图表同时开始了投资生涯。1990 年 12 月 1 日深交所宣告成立，1991 年 7 月 3 日深圳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 年 7 月 15 日上交所公布上证指数基期为 1990 年 12 月 19 日，深交所则宣布为 1990 年 4 月 3 日，它们分别从一百点起步，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九个年头，在身后留下了一大串累积的成交量和忽高忽低的脚印。

——这张图表浓缩了九年来我的几乎所有的生活内容，像我这样的人也许还有，但是对于外行人及后来才介入股市的人

◎ 安妮投资生涯路

而言，他们的体会绝对不会这么沛然而深刻，他们也许只会看一眼这张图表，然后表示自己的感叹：中国股市涨得真快！

确实，两地股市从百点起步，现在深股已接近了 400 点，而沪股则已到达 1200 点，闭眼一想：这几年傻子都能赚钱！

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在中国股票市场迅速发展的九年中，我们看到许多朋友倒下了，剩余的同伙更加奋勇地前进，不断有新人加盟，队伍越来越浩浩荡荡，我们付出的不光是金钱，更多的是汗水、心智和对自己无情的判决、不断的折腾。

这几年来，常常有作家及报告文学作者上门来要替我写传记，均被我婉言谢绝。我总是说：到时候我自己会写的，这专利只属于我。从内心深处，我把自己在证券市场上的这份经历看得十分珍贵，它是我尘封的历史，它是我内心的颤栗，他人的手只会使她像含羞草一样地关闭心扉。

现在，是时候了。当我在 1998 年春季从证券咨询业中“解套”出来，我感到了真正的舒展和轻松。但是，另一件更沉重的工作摆在我面前，——实现自己的承诺，把个人的投资生涯坦露于众，这是另一张中国股市的人生曲线图，恰是我开卷提到的指数 K 线图的生动补充。

这本书从我 1991 年踏入深圳一直写到 1998 年，可以说是我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部“初恋史”，至于我与这一市场的蜜月期、磨合期的经历，我想将是《安妮投资生涯路》第二部、第三部的内容了。

从风格而言，这部书既不是小说，又不像纪实文学，书中

后 记 ㊟

人物真名有些已隐去，更多地带有“随笔”的味道，是我每天操盘之余一边看着墙上九年来的深沪股市 K 线图一边思索回忆记录下来的，文字之粗糙及情节数据的疏漏之处还望读者包涵。

最后我要告诉您的是——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保住成果，稳步发展，提高自己，奉献社会，很难，但不算太难。

安 妮

1999 年 1 月